

绞刑架下的报告

SCRITTO SOTTO LA FORCA

【捷克】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彩色插图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名家名译 彩色插图本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Julius Fucik

伏契克(1903—1943)

《绞刑架下的报告》是捷克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伏契克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一部壮丽诗篇，在捷克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品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狱中难友们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深刻揭露了纳粹党徒的残暴行径和叛徒特务的卑劣伎俩，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世界各地千百万读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8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授予伏契克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白狮子勋章；1950年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上，伏契克又被授予“国际和平奖”，以兹纪念。

《绞刑下的报告》于20世纪50年代初被译介到中国，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起，成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品，后被节选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SCRITTO SOTTO LA FORCA

绞刑架下的报告





ISBN 7-80173-488-2
I·053 定价：7.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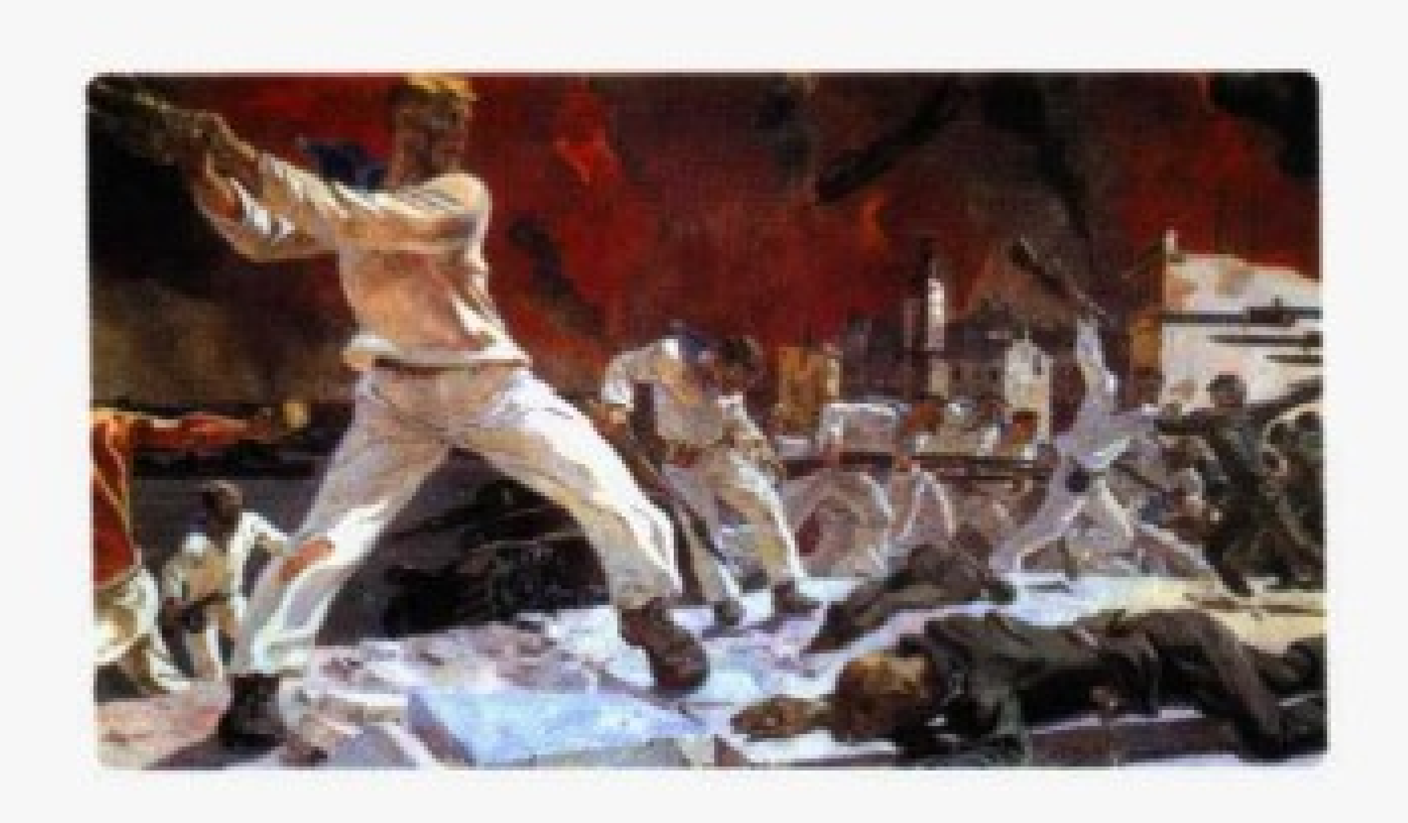


绞刑架下的报告

SCRITTO SOTTO LA FORCA

【捷克】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绞刑架下的报告／〔捷〕伏契克著；蒋承俊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10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ISBN 7-80173-488-2
Ⅰ.绞… Ⅱ.①伏…②蒋… Ⅲ.报告文学—捷克斯洛伐克—现代 Ⅳ.I51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5381 号

绞刑架下的报告

作　　者：〔捷〕伏契克
译　　者：蒋承俊
策划编辑：张福江
责任编辑：韦尔立
执行编委：马　跃　刘　琳　肖玲玲　陈荣赋
　　　　　杨玉萍　段　冶　徐胜华　龚雪莲
封面设计：李庆伟
插图绘制：北京恒艺插图工作室
出　　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发　　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5.875 印张　14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73-488-2/I · 053
定　　价：7.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64271187　64279032
传　　真：010-84257656
电子邮箱：icpc@95777.sina.net

目　录

一九四三年春写于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

规规矩矩地挺直身子坐着，两手扶膝，两眼呆呆地凝望着佩切克宫[①]候审室发黄的墙壁，望得眼睛发花，——说实在的，这不是最便于思索的姿势。可谁能强迫思想也规规矩矩地不动呢？

曾经有人——大概永远也无从知道是什么时候和什么人——把佩切克宫里的这个候审室叫做“电影院”。真是天才的比喻！一间宽敞的房间，放着六排长凳，凳子上直挺挺地坐着受审的人，他们面前是一面光秃秃的墙，犹如电影院的银幕。把全世界所有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加在一起，都远没有从这些等待着新的拷问、新的折磨和死亡的受审者的眼睛里映射在这墙壁上的影片多。这是关于母亲、妻子、孩子和被摧毁的家园、被毁灭的生命的影片，是关于坚贞的同志和叛变的行为、关于把传单传递给某人、关于流血牺牲、关于托付重要事情时紧紧握手的影片，是充满恐怖和决心、憎和爱、苦痛和希望的影片。这里的每个人都和生活绝了缘，每天都有人眼睁睁地死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重获新生。

我在这里成百次地看了关于我自己的影片，成千次地看了这部影片的细节，现在我尝试着把它叙述出来。如果还没等我讲完，绞索就勒紧了的话，那么千百万还留在世上的人，自会续完它那“幸福的结局”[②]。

---

① 佩切克宫是捷克百万富翁佩切克的住宅。在沦陷时期，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② 原文系英文。

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

还差五分钟就要敲十点了。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我急急匆匆地走着——尽我化装成跛脚老头这个角色所能允许的速度快步走着，——要在大门上锁之前赶到叶林涅克家，我的"助手"**克列仓**①在那儿等着我。我知道，这次他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他的，但是不去赴约，很可能会引起惊慌——主要的是，我不想让我们这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他们用一杯茶招待我。克列仓早已在那里等我了，——除了他，还有弗里德夫妇。这可又是一次不谨慎的行动。

"同志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不希望这样大伙儿聚在一起。这样最容易把我们引向监狱和死亡。要是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就得停止工作，因为这样不仅对自己有害，而且还会连累别人。明白吗？"

"明白了。"

"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

"五月号的《红色权利报》。"

"好极了。你怎么样，米列克？"

"老样子，没什么新闻。工作进行得还好……"

"好了，就这样吧。'五一'后咱们再碰头。我会通知你们的。再见！"

"再喝杯茶吧，先生！"

---

① 即米列克的姓。

"不,不了,叶林涅克太太,我们在这里的人太多了。"

"至少再来一小杯吧,我请求您。"

新斟的茶冒着热气。

有人按铃。

现在不是深更半夜吗?这会是谁呢?

来的客人没有耐心,把大门敲得咚咚直响。

"快开门!我们是警察!"

"快到窗口去!快跑!我有手枪,我来掩护你们撤退。"

晚啦!盖世太保已经站在窗下,用手枪瞄准了房间。他们砸开了门,从过道偷偷地涌进了厨房,接着闯入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九个男人。他们没看见我,因为我正站在他们背后,在他们打开的门后边。我能够不慌不忙地射击。但是九支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如果我开枪,他们就会比我先被打死。假如我开枪自杀,枪声也会引起射击,他们仍然不免要成为枪下的牺牲品。倘若我不开枪,他们也许会在监狱里呆上半年或一年,将来革命会把他们当中活着的人解放出来。只有克列仓和我不可能从那里出来,敌人将折磨我们,——从我的嘴里他们是什么也捞不到的,而从克列仓那里呢?这个人在西班牙打过仗,在法国集中营呆过两年,大战期间又秘密地从法国逃回布拉格来的,——不,这种人是不会叛变的。我考虑了两秒钟,也许是三秒钟吧?

如果我开枪,那也于事无补,只有我自己可以免受苦刑,但因此将会有四个同志白白地牺牲生命。不是这样吗?正是这样的!

于是决定了。

我从隐蔽的地方走了出来。

"哈,还有一个!"

照我脸上打了第一拳。这一拳几乎要了我的命。

"举起手来!"[1]

---

① 原文系德文。

接着就是第二拳,第三拳。

这一手我早就料到了。

这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一堆倒翻的家具和各种什物碎片。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走!"[①]

他们把我推上汽车。手枪一直对着我。

途中就开始审问了。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我耸了耸肩。

"坐好,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开枪吧!"

代替枪弹的又是拳打脚踢。

我们从一列电车旁边经过。我觉得电车好像扎着白色的花彩。难道这个时候还有婚礼电车,行驶在这深更半夜里?大概是我开始发烧了。

佩切克宫。我原以为不会活着来到这里了。现在差不多是跑着上到四层楼。啊,原来这里就是有名的Ⅱ—Al反共科!我倒有些好奇了。

那个瘦长个子的负责抓人的头目把手枪放进衣袋里,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了一支香烟。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这时候他手上的表指着十一点。

---

① 原文系德文。

“搜身！”

开始搜查。他们脱掉了我的衣服。

“他有身份证。”

“用的是什么名字？”

“霍拉克教师。”

“查对一下！”

打完了电话。

“当然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

“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

“你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秘密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你！”

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前难分难舍。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说：“一切都弄清楚了，——怎么样，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儿。”

这是个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儿”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给他点厉害尝尝！”

夜，一点钟。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街上空无人迹，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印刷所在哪儿？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到的疼痛,是从那咬烂了的嘴唇上来的。

"把他的鞋脱掉!"

真的,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我仿佛感觉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现在仿佛棍子直打进了脑髓。

两点钟。布拉格在酣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

"说! 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但怎么也数不清。十二颗,十五颗,十七颗? 不,这是现在"审问"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而死神却迟迟不来。

三点钟。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菜贩向集市走来,清道夫们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一个早晨。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

"您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手指尖也在滴血。

"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亲爱的! 她恪守我们的约言,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 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而死神仍不见到来。我应该去迎接他吗? 应该怎样去迎接呢?

谁打了我一下,然后我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

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五点，六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噩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打，又是："说，说，说！"可我还是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

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现在拷打的间歇已经拉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远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

"已经够他受的了！"[1]

然后我坐了起来，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香烟，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试着替我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汽车里，我们就坐车走了。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我觉得好笑。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但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濒临死亡本来是沉重的，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它轻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完结了。

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起来了，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

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倒下了……

---

① 原文系德文。

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①] 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

"呵，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

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到草垫子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

"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还差五分钟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

① 纳粹国社党党卫队队员，或称黑衫队员。

第二章　临死前的痛苦

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
暗淡下去，暗淡下去……

双手交叠在腹前的两个男人，拖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在白色的墓穴里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诗。

……灵魂就离开了肉体
升向天堂，升向天堂……

有人死了。是谁呢？我竭力扭过头来，或许能看到装殓死人的棺材和插在他头旁的蜡烛。

……那里不再有黑夜，
那里永远灿烂辉煌……

我好容易睁开了眼睛。可是没有瞧见另外的人，除了他们俩和我，——这儿没有别人呀！那他们是在给谁做临终祈祷呢？

……这颗永远照耀的星辰，
就是耶稣，就是耶稣。

这是葬礼，毫无疑问，是道道地地的葬礼。他们在给谁送葬呢？谁在这里？只有他们俩和我。呵，是给我送葬？可是人们，你们听

着，这是一场误会！我并没有死。我还活着。你们瞧，我不是正看着你们，还和你们说着话吗！快停止吧！别埋葬我！

如若有谁要我们长逝
永久安息，永久安息……

他们没有听见。难道都是聋子？难道我说话的声音不大？或许我真的死了，所以他们听不见我那不是从肉体里发出来的声音？可是我的肉体就在这里躺着呀，我在亲眼看着自己的葬礼！真是滑稽！

……把自己炽热的目光
转向天堂，转向天堂……

我记起来了。曾经有人费力地把我弄起来，给我穿上衣服，把我放到担架上。穿着钉铁掌靴子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橐橐响过，然后……这就是一切。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也记不得了。

……那儿是永恒光明的故乡……

而这一切却是那么无聊。我活着。我感到隐隐的疼痛和口渴。死人毕竟是不会口渴的。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想做个手势，一种陌生而不自然的声音终于从我嘴里冲了出来：

"喝水！"

到底成功了。两个人停止了转圈。他们向我弯下身来，其中的一个扶起了我的头，把一罐水送到我嘴边。

"孩子，你也该吃点东西呀！已经两天了，你就一个劲地喝水，喝水……"

他跟我说什么？已经两天了！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一。”

星期一。我是星期五被捕的。脑袋是多么沉重啊！这水却是那样的清凉！睡吧！有一滴水滴进了山泉，明净的水面泛起了涟漪。这是山中草地上的那股泉水，我知道，它流过罗克兰山下守林人茅屋的附近……连绵不断的蒙蒙细雨簌簌地洒落在松树针叶上……睡眠是多么香甜啊……

……当我重新醒来时，已是星期二的晚上了。一条狗站在我跟前。这是一条警犬。它用美丽而聪慧的眼睛探询似的盯着我问道：

“你住在哪儿？”

呵，不对！这不是一条狗。这是一个人的声音。是的，还有个人站在我跟前，我看见了一双高筒靴，还有另外一双和制服裤子。再往上就看不见了，如果我要看，头就要发晕。嗐！管它干什么，还是让我睡吧……

星期三。

那两个唱过圣诗的男人现在坐在桌子旁，用陶制的盘子吃着东西。我已经能够认出他们来了。一个年轻些，一个老一点，他们并不像僧侣。那墓穴也并不是什么墓穴，而是所有监狱里常见的一间普通的牢房，地板顺着我的眼睛伸展开去，直到尽头，是一扇沉重的黑门……

钥匙开锁发出了声响，那两个人立刻跳起来，规规矩矩地站着。两名穿着制服的党卫队队员走进来，吩咐给我穿上衣服，——真没想到，在每条裤腿、每只袖筒里隐藏着多少痛苦啊。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下楼梯，钉着铁掌的靴子在长长的走廊里发出沉闷的声响……这条走廊他们曾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抬着我走过一次了。这条走廊通到哪里去呢？它通到哪个地狱去呢？

他们把我抬到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一间昏暗而阴森的接待室里，把担架放在地上。一个捷克人装出一种和善的声音翻译德国人咆哮的问话。

“你认识她吗？”

我用手支撑着下巴。在我的担架前，站着一位年轻的、宽脸蛋的姑娘。她高傲地昂着头，挺直了身子站着，不是固执而是很庄重，只是眼睛微微低垂到刚好能够看见我、用它来向我问候的程度。

"我不认识她。"

我想起来了，在佩切克宫那个疯狂的夜里，我好像见过她一眼。现在是第二次见面。可惜，永远不会再有第三次见面了——我本想为了她在这里傲然挺立的崇高英姿而握一握她的手，向她致敬。她是阿诺什塔·洛伦泽的妻子。一九四二年戒严[1]刚开始的几天，她就被处决了。

"可是这个人你一定认识。"

安妮奇卡[2]·伊拉斯科娃吗？天呀，安妮奇卡，您怎么会落到这儿来了？我没有说出您的名字，您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得您，您懂吗？我们是不相识的。

"我不认识她。"

"你放明白点，老家伙！"

"我不认识她。"

"尤拉[3]，已经没有用了，"安妮奇卡说，只有她那捏紧了手绢的指头微微打战，表现出她内心的激动，"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被人出卖了。"

"谁？"

"住嘴！"有人打断了她的回答，当她弯下腰来把手伸给我的时候，他们使劲地把她推开。

安妮奇卡！

我再也听不见其余的问话了。仿佛离得远远的、没有痛苦地旁观着，模模糊糊地觉得有两名党卫队队员把我抬回牢房里。他们猛

---

① 1942年5月27日，掌管捷克和摩拉维亚的纳粹头子亨德里希被刺，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宣布戒严。

② 安妮奇卡是安娜的爱称。

③ 尤拉是尤利乌斯的爱称。

烈地颠簸着担架，还笑着问我是不是愿意让绞索套着我的脖子打秋千。

星期四。

我对周围的环境已经有些认识。难友中那个比较年轻的叫卡雷尔，他管另一个年长的叫“老爹”。他们给我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但在我脑子里全给弄乱了，有一个什么矿井啦，什么孩子们坐在凳子上啦，我听见敲钟，大概是什么地方失火了。据说，医生和党卫队的护士每天都来看我，还说，我的情况并不怎么严重，很快又会成为一条汉子。这是“老爹”说的，他坚持他的说法，而卡尔利克[1] 也热烈地附和，因而使我即使处于这种情况，也感觉得到他们是想用好话来安慰我。真是些好人啊！可惜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下午。

牢房的门开了，一条狗悄悄地蹑着脚尖走了进来。它停在我的头边，仔仔细细地审视我。又是两双高筒靴——现在我知道了：一双是狗的主人的——庞克拉茨监狱的监狱长的，另一双是那天晚上审问过我的盖世太保反共科科长的。随后我又看见了一条便服裤子。我顺着这条裤子朝上看，对啦，我认识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他往椅子上一坐，开始审问：

“你已经输了。至少你得替自己想一想。快招吧！”

他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不想抽，也捏不住它。

“你在巴克斯家住了多久？”

在巴克斯家！连这也知道了！谁告诉他们的呢？

“你瞧，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交代吧！”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还用我交代干什么？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有意义，到临死的时候我怎么能玷污自己的清白呢？

审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咆哮，而是耐心地反复盘问。一个问题还没得到回答，就提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

---

① 卡尔利克是卡雷尔的爱称。

“难道你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懂吗？你们完全输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你还相信公社会胜利吗？”

“那当然。”

“他还相信——他还相信俄国会胜利吗？”——科长用德语问，瘦长个子的头目给他翻译。

“那当然。不会有别的结局。”

我十分疲倦。我集中了全部精力来对付，可是现在我的知觉消失得很快，就像血从深深的伤口里往外流似的。我还感觉到，他们怎么样向我伸出手来，——也许他们在我的额头上看到了死亡的印记。真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刽子手在行刑之前要和被处决的人接吻。

晚上。

双手交叠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诗：

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
暗淡下去，暗淡下去……

唉呀，人们啊，人们，你们停停吧！这也许是一支美丽的歌，但今天，今天是五一节的前夕呀；是人类最美丽、最欢乐的节日的前夕呀！我试着唱一首快乐的歌，但这歌声也许更凄凉，因为卡尔利克转过身去了，“老爹”在揩着眼睛。随它去吧，我不管，我继续唱我的。他们渐渐地也和我一同唱了起来。我满意地入睡了。

五一节清晨。

监狱小钟楼的钟敲了三下。这是我到这里以后第一次清楚地听见钟声。也是我被捕以来第一次完全神智清醒。我感到空气清新，风从敞开的窗户轻轻地吹拂着铺在地板上的草垫，我感觉稻茬刺着了我的胸口和肚皮，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感到疼

痛，使我连呼吸都很困难。突然，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那样，我明白了：这就是终结。我要死了。

死神啊，你真是姗姗来迟。我当然希望许多年之后才同你见面。我还想过自由人的生活，还想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歌唱和遨游世界。要知道我正当壮年，还有很多很多力量。而现在我却没有力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我爱生活，为了生活得美好，我投入了战斗。人们，我爱你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报我时，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时，我是痛苦的。如果我曾得罪过谁，那就请原谅我吧！如果我曾安慰过谁，那就请忘却我吧！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爸爸、妈妈、妹妹们；这是我给你的遗嘱，我的古斯蒂娜[①]；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我的同志们；这是我给所有我曾爱过的人的遗嘱。如果你们觉得，眼泪能洗去悲哀的思念，那你们就哭一会儿吧。但你们不要难过。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如果你们在我的墓前放上悲怆的天使，那对我是不公道的。

五月一日！往年这个时刻，我们早就到城郊集合，预备好了我们的旗帜。在这个时刻，莫斯科街道上参加五一节检阅的先头部队已经在行进。而现在，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万人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中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啊！

但临死前的痛苦却不是那么壮丽的。我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听见，我喉咙里怎么样呼呼作响。这样会把同狱的难友吵醒的，也许有点水润润喉咙就好了……可是罐子里的水全喝光了，在那边，离我仅有六步远的牢房墙角的小便池里有足够的水。我难道还有力气爬到那里去吗？

我匍匐在地上，轻轻地、很轻很轻地爬行，好像临死时最要紧的

---

① 古斯蒂娜是伏契克的妻子古斯塔的爱称。

事就是不吵醒任何人，我终于爬到了，贪婪地喝着便池里的水。

我不知道在那里呆了多久，也不知道爬回来用了多长时间。我的知觉又在消失。我摸了摸自己手上的脉搏，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心涌到喉咙，又急剧地落下去。我也随着它一起落下去了。落下去很长时间。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了卡尔利克的声音：

“老爹，老爹，你听，这可怜的人，他死啦！”

上午医生来了。

以上的这一切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医生来了，给我检查了一下，摇了摇头。后来他回到医务室，把昨夜已经填好我的名字的死亡证撕掉了，他以内行的口气说：

“简直是一匹马！”

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这我知道。

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竭力维护苏台德地区**[①] **德国人的自治权以及**看穿了捷克资产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②]，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族钉上十字架，从苏台德地区来的看守们在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绩叛卖的线[③]。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吗？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啊，聂鲁达的耶稣圣婴[④]！"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类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

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块暗褐色的搁板，上面放着陶制的碗盆。是的，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现在这里稍加机械化了：装上了暖气管，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见打开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的直挺挺地站着，门一开，看守长就一口气

---

① 捷克北部和德国接壤的地区，当时这里大部分居民是日耳曼人。

② 1931 年夏，伏契克秘密组织工人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被捕，关进庞克拉茨监狱。

③ 古希腊神话传说，有三个老妇人掌管着人的生死的命运：克洛拉纺绩生命的线，拉海西斯决定它的长度，阿特里波斯随时把它剪断。当生命的线剪断时，人就死了。

④ 捷克著名诗人扬·聂鲁达(1834—1891)曾于 1881 年写了《圣诞节的摇篮曲》，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睡吧，圣婴，睡吧！你在睡梦中积蓄力量。你面前的道路漫长，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睡吧，圣婴，睡吧！"

地叫喊："注意！二六七号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1]

二六七号就是我们的牢房。不过这间牢房里的自动机器运转得并不那么灵活。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在那段时间里，我还在窗下面的草垫子上，直挺挺地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头已经能够转动，手已经可以抬起来，两肘已经能够支撑起身子，我甚至已经试着翻身仰卧……毫无疑问，描写这事比起经历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门上原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了两个人的牌子，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诗的比较年轻的卡尔利克已经走了，只留下我对他那善良的心的回忆。说实在的，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他讲述的时候却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他的全名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曾经从那里运出过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入狱差不多有两年了，现在大概是去柏林受审，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知道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爱他们，非常爱他们。然而他说："要知道，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我却吃不下去。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他采取了最强硬的措施：向监狱医务官报告说，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点东西也没吃过。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成天绷着脸，穿一身党卫队制服，不经他的许可，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这类药方都不能开。这个医务官竟亲自给我端来一碗病号稀饭，站在我的身边，看我咽完最后一口。这时卡尔利克非常满意自己干预的成功。第二天，他亲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才能喝到的汤。

---

[1] 原文系用捷克语字母拼成的德文。

但后来还是不行。我那被打烂的牙龈，连星期日那土豆烧牛肉里煮烂的土豆都不能咀嚼，肿胀的咽喉咽不下哪怕是小块的食物。

“他连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都不想吃。”卡尔利克站在我身旁忧郁地摇着头，埋怨地说。

随后，他就狼吞虎咽地和“老爹”分享了我那一份。

唉，你们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庞克拉茨监狱里呆过的人，就不会懂得，也不可能懂得这“红烧牛肉”是什么东西！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囚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的时候，当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着人皮的活骷髅清晰可见的时候，当每个囚犯用贪馋的目光盯着他的同伴的几口食物的时候，当那令人作呕的干菜粥上浇点蕃茄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这简直就开胃极了。是的，问题还不在于开胃，而是这东西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了人的生活。在这个残酷而又违反常情的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它是某种正常的、带有人间生活滋味的东西。人们一提起“红烧肉汁”，连声调都变得柔和优美了。——啊！有谁能理解这一汤匙“红烧肉汁”对于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是何等珍贵啊！

两个月以后，我才明白了卡尔利克的惊奇。“连红烧牛肉都不想吃”，——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我当时是怎样地接近了死亡。

就在当天夜里两点钟，卡尔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钟内收拾停当，仿佛他只是出去溜达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监狱、集中营或刑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谁知道他要上哪儿去呢！他在我的草垫旁边跪下，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看守的一声粗暴的吆喝，说明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是不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的，——卡尔利克跨出门槛，咔嚓一声，门又锁上了……

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

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吗，朋友？我们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将在什么

时候分别？我们俩谁会先走？到哪儿去？又是谁来传唤他？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那个没有穿制服的死神？

现在我只写出了初次离别时令人激动的情思。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一年了，然而送别这个朋友时所引起的那种情思，还不断地、有时甚至还是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挂在牢房门上的“二人”牌子又换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二人”，然后又出现“三人”，“二人”，“三人”，“二人”。新的难友来了又去了——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号牢房里的两个人，依然忠实地住在一起。

这就是“老爹”和我。

“老爹”名叫约瑟夫·佩舍克，是个六十岁的老教员，教师委员会主席，他比我早被捕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拟一项关于改革自由捷克学校的建议中“阴谋反对德意志帝国”。

“老爹”是一个……

可是，朋友，怎样来描写他呢？这是件很难的事。两个人，一间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这个称号上的引号渐渐消失了；在这一年中，两个不同年龄的囚犯成了真正的父与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彼此吸收了对方的习惯、口头禅，甚至是说话的声调。现在你不妨来试试，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带到牢房来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

他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地擦洗从我的伤口中流出的脓血，对于我的草垫四周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从来没流露出过厌恶的神情。他替我洗补那件可怜的破衬衫，这是我第一次受审时的牺牲品，当这件衬衣实在没有办法再穿时，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我。他还趁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冒险替我采摘雏菊和草茎。每当我去受审的时候，他总是以一种爱抚的目光送我；回来后又用新的绷带包扎我的新伤口。每逢夜里我被带去受审时，他总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来，把我扶上草垫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盖上



他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

毯子,然后他才去睡觉。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在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友谊,甚至当我能用两条腿站立起来,能尽到做儿子的义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改变。

朋友,我一口气是写不完这一切的。二六七号牢房内那一年的生活是丰富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老爹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一切都是应该写到的。不过我的叙述还没有结束呢(看来还有希望写完)。

二六七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的。看守差不多每小时都打开一次门来检查。这也许是按规定对一个案情重大的共产党罪犯的严格监视,但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这里常常死去一些不该死去的人。然而大家确信必然会死去的人又活下来的事,却很少发生。别的走廊上的看守常到我们的牢房里来聊天,他们有时悄悄地掀开我的毯子,带着内行的神气察看我的伤口。然后按照各自的脾气,说上几句无聊的俏皮话,或者伪善地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其中有一个——我们最初给他起的绰号叫“牛皮大王”——比别人来得都勤,他满脸堆笑地探问我这个“赤魔”需要不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不需要。过了几天,牛皮大王终于看出我这个“赤魔”需要点什么了,那就是刮脸。于是他领来了一个理发师。

这个理发师是我最早认识的别的牢房里的囚犯:包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热心帮了倒忙。老爹托着我的脑袋,包切克同志跪在草垫子的旁边,用一把钝了的刮脸刀努力在我那杂草般的胡须中开出一条道来。他的手在颤抖,两眼噙着泪水。他相信他是在替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刮脸。我竭力安慰他说:

“大胆点吧,朋友,既然我经受得住佩切克宫的拷打,也就经受得住你的刮脸刀。”

但我的力气到底不行,因此我们俩只得不时地停下来喘一口气。

过了两天，我又认识了两个囚犯。佩切克宫的头目们失去耐性了。他们派人来传我去，尽管医务官每天都在我的传票上批着："不能移动"，但他们却不管，下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抬去。于是两名穿着杂役[1]制服的囚犯，扛来一副担架，搁在我的牢房门前。老爹费力地给我穿上衣服，同志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后来在整个走廊里当上了服务周到的"大叔"[2]，另外一个是……[3] 下楼梯时，我从倾斜的担架上往下滑，一个抬着我的人向我说：

"扶住了！"

紧接着又放低声音加了一句：

"要坚持！"[4]

这次我们没有在接待室停留。他们把我抬得更远，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向出口处走去。走廊里挤满了人——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们的家属来取换洗的衣服的日子——他们都望着我们这个凄惨的行列，人们眼里流露出哀怜，我可不大喜欢这个。于是我把手握成拳头举到头上挥动。也许他们看见了会懂得我在向他们致意，或者没有看清这个幼稚的动作，但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没有更多的力气。

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人们把担架放到大卡车上，两名党卫队队员坐在司机旁边，另两名紧握着打开了枪套的手枪站在我的头的旁边。车开走了。道路实在太不理想：一个坑，两个坑，没开出二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样乘着汽车在布拉格街道上走，实在有些可笑：一辆可以容纳三十个犯人的五吨大卡车，现在却仅仅为了一个囚犯耗费汽油，并且前后各站着两名党卫队队员，手里还

---

① 杂役是由盖世太保指定一些案情较轻的犯人充当，他们负责料理狱中犯人生活上的杂务。

② "大叔"是伏契克对斯科舍帕的尊称。他当上杂役后，成了监狱集体里最可靠而又最机敏的侦察员。

③ 原手稿上未指出名字。

④ 双关语，即手要扶住，思想上也要坚持斗争的意思。

握着枪,怒目盯着一个失去了知觉的躯体,唯恐他会逃走。

第二天,这个滑稽剧又重演了一遍。这次我一直支持到佩切克宫。审讯没有多久。反共科的弗里德里希科员毫不客气地"碰了碰"我的身子,于是我又在昏迷状态中被运了回来。

我还活着,这一点现在已确定无疑了。疼痛是生命的孪生姐妹,它十分清楚地唤起了我对生命的感觉。几乎整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囚犯都知道我还侥幸地活着:从厚实的墙壁传来的敲击声中,从送饭时杂役的眼神里,他们送来了最早的祝贺。

只有我的妻子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她被单独关在我楼下的一间牢房里,相距只有三四间牢房远。她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希望之中,直到有一天,在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时候,隔壁一个女囚犯对她耳语,说我已经完了,说我在审讯时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死在牢房里了。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在院子里四下乱闯,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连女看守怎样朝她脸上打了一拳表示"安慰",并把她赶回行列里去,以维护监狱的秩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那无泪的、善良的大眼睛茫然凝视着牢房的白墙,但她能望见什么呢?第二天又传给她另一个消息,说我没有被打死,而是受不了那种折磨,在牢房里上吊了。

那个时期我一直在那可怜的草垫子上扭动着。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尽量侧着身子睡,为了给我的妻子古斯蒂娜唱她最心爱的歌。她怎能听不见我的歌声呢?我在那歌声里倾注了我多少热情啊!

现在她已经知道了我的消息,听见了我的歌声,尽管她现在比过去离我更远了。现在连看守们都听惯了二六七号牢房里的歌声,他们已经不再敲门命令我们安静了。

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我不明白,在这临终之前,当我对生命感受特别强烈时,为什么要停止歌唱。至于老爹佩舍克呢?啊,没想到,他也是非常爱唱歌的。他既没有音乐的听觉,

嗓子也不好，还缺乏记忆音乐的能力，但是他却如此善良而诚挚地迷恋着歌唱，他在歌唱中找到那么多的欢乐，使我几乎听不出来他是怎样从这个调子滑到另一个调子的，该唱“拉”的地方他却固执地唱成了“索”。我们就这样歌唱着，在满怀愁闷的时候我们歌唱，在明朗愉快的日子里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迎接来自东方战线上的捷报。我们就像人们一向所做的那样，欢欣地歌唱，永远地歌唱，生命不息，歌声不止。

没有歌声便没有生活，犹如没有太阳便没有生命一样。如今我们更是加倍地需要歌唱，因为阳光照不到我们这儿。二六七号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在夏季，落日的余晖才有很短一段时间把栅栏的影子斜射在东墙上。这时老爹总是扶着床站起来，凝视着那转瞬即逝的光辉……他的目光是这里能见到的最忧郁的目光了。

太阳！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如此慷慨地普照着大地，你在人们的眼前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是这么少。是的，太阳一定要照耀下去，人们也一定要在它的光辉中生活。知道这个真理是多么美好的事啊！但你毕竟还想知道一件远比这还重要的事：太阳还能照到我们身上来吗？

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偶尔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才能看到几回落日。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啊！

第四章　“四〇〇号”

死而复生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奇怪得难以言传。当你在美丽的白昼从酣睡中醒来的时候,世界是迷人的。但死而复生时,白昼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你仿佛睡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好觉。你觉得自己很熟悉人生的舞台。但在死而复生醒来的时候,那就好像是照明师拧开了所有明亮的弧光灯,霎时一个通明透亮的舞台呈现在你的面前。你会觉得你能看见一切,仿佛在你眼前安放着一架望远镜,上面再加一副显微镜。死而复生完全是一种春天的景象,好像春天正在显示出一种你在最熟悉的环境里都感觉不到的意外的魅力。

尽管你明明知道,这种景象只是瞬息即逝的,尽管你处在像庞克拉茨监狱这样一个如此令人“愉快”、如此“丰富多彩”的环境里。

他们把你带出去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他们传你去审问,不是用担架,而是自己走着去,尽管好像这是不可能的。扶着楼梯的栏杆和走廊的墙,与其说是用两只脚在走,还不如说是用四只脚在爬。难友们在楼下等着,他们把你扶进囚车。以后你就坐在那个装着十个至十二个人的阴暗的流动牢笼里。一些陌生的面孔朝你微笑,你也向他们笑笑;有人跟你耳语,但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你握了一个人的手,又不知道是握了谁的……然后车子突然一晃,开进了佩切克宫的通道,朋友们把你扶下车,走进一个四壁光秃秃的敞亮的房间里,五排[①] 长凳整齐地排列着,人们挺直身子坐在上面,两手扶着膝盖,两眼呆呆地凝望着面前的一面空墙……朋友,这就是你的新世界的一角——所谓的“电影院”。

---

① 原文如此。本书开头写的是六排长凳。

一九四三年五月的插曲

今天是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碰巧是可以让我写作的那个人值班。多幸运啊，我又可以暂时做一个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报导这个新世界的战斗力量的五一节检阅了！

不用期待我讲述那飘扬的旗帜。完全没有那么回事。我甚至不能讲述你们乐于听的那些动人的故事。今天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平常。既没有像往年我所听到的通向布拉格街道的几万人所组成的洪涛巨浪，**也没有响彻柏林大街上那成千上万人的坚定步伐发出的雷鸣轰响声**，更没有像我曾在莫斯科红场上见到的壮阔的人海。这儿你见不到几百万人，哪怕几百人都没有。你只能在这里看到几个男女同志。然而你会感觉到，这已经不少了。是的，不少了，因为这是一种力量的检阅，这力量正在烈火中冶炼，它不会化为灰烬，而会变成钢铁。这是战斗时候在战壕里的一种检阅。不过在战壕里人们往往是穿着灰绿色的野战军服的。

你也许觉得这都是些小事，当你有一天读到我所报导的你未曾亲身经历过的这一切时，谁知道你能不能完全理解它。努力理解吧。你要相信，力量就在这里。

隔壁牢房的早晨问候，通常是用敲打两拍节的贝多芬乐曲送过来的，今天比平时敲得更庄严、更坚毅，而墙壁也用高昂的音调来传达它。

我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所有的牢房都是这样。

我们全都装束好了，才吃早餐。在敞开的牢房门前，杂役们端着面包、黑咖啡和水列队走过。斯科舍帕同志发给我们三个大圆面包，往常只有两个。这是他对五一节的祝贺——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的实际的祝贺。发给面包时，他在面包下面捏了捏我的手指。说话是不允许的，他们甚至还监视你的眼色——可是难道哑巴就不会用手指头来清楚地说话吗？

女犯们跑出来在我们牢房窗下的院子里“放风”。我爬到桌子上,隔着栅栏朝下望,也许她们能看见我。她们真的瞧见我了。她们举起拳头向我致意。我也照样还礼。在院子里,今天十分欢快而活跃,与往常完全两样。女看守一点没有发觉,也许是故意不去注意吧。这也同今天的五一节检阅有关。

现在轮到我们“放风”了。我指挥早操。今天是五一节,朋友们,咱们用点别的操法开始,就让看守们去惊奇吧。第一节:一——二,一——二,抡大锤。第二节:割麦子。锤子和镰刀。稍加想象同志们都会明白锤子和镰刀的意思。我朝四下里张望。大家都微笑着,怀着极大的热情反复操练。他们全明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五一节检阅呀,这个哑剧也就是我们的五一节宣誓:赴汤蹈火,至死不渝。

我们返回牢房。九点整。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着十点,[1] 红场上开始检阅。父亲[2] 啊,我们跟您一道前进!现在那里正唱起《国际歌》,歌声响彻全球,让这歌声也在我们牢房里响起来吧。我们唱起来了。接着又唱了一支支革命歌曲,我们不愿意孤单,而且我们也不孤单,我们是和那些现在自由地纵情歌唱的人们在一起的,是和那些同我们一样在战斗着的人们在一起的……

同志们在牢狱,
在阴冷的拷问室,
你们同我们在一起呵,在一起,
尽管你们没有在这个行列里……[3]

是的,我们是同你们在一起的。

我们二六七号牢房就准备用歌唱来庄严结束一九四三年的五

---

① 布拉格时间比莫斯科晚一小时。
② 指斯大林。
③ 这几行诗是伏契克用俄文写的。

一节检阅。是真的结束了吗？为什么女牢的那个杂役下午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用口哨吹着《红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和别的苏联歌曲，难道不是在鼓励男牢的同志们吗？为什么那个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男人，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此刻正在走廊里警卫着，难道他不是在防止有人出其不意地抓住我吗？另外那个人不是竭力鼓励我写这个报告，并把写好的稿子带出狱外，把它小心地藏起来，让它在适当的时候问世吗？为了这一小片纸，他们是可能掉脑袋的。他们之所以冒这种危险，是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他们正在战斗，坚贞无畏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机动灵活地用他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手段参加战斗。他们是普通一兵，默默无闻地工作，谁也想象不到，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是胜利，就是牺牲。

你大概十次、二十次地见到过革命队伍怎样进行五一节的检阅。那当然是雄壮的。但是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评价出这支队伍的真正力量，认识到它是不可战胜的。死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英雄行为是没有灿烂的圣光环绕的。而斗争则比你想象的要残酷得多，要坚持斗争并把它引向胜利需要无比的力量。你每天都能见到这种力量在活动，但却不是常常都能意识到它，因为这一切都显得那样简单而自然。

今天，在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检阅中，你又重新意识到了这种力量。

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使这个报告中断了一段时间。这也好，因为在这个光辉的节日里，回忆会有些变样的，今天欢乐占了优势，也许会把回忆加以渲染。

但在回忆中，佩切克宫的“电影院”完全没有欢乐可言。这是拷问室的前厅，你可以听到从拷问室传来别人的呻吟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你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你看到一些身强力壮

而又精神抖擞的人从这儿出去，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拷问，弄得身体残废、半死不活，又回来了。你会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答应着呼唤，——可是经过一个小时以后，回来时，听到的却是由于疼痛和战栗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窒闷的声音。但还有一种更坏的：在这里你也会见到这样一种人，他们离去时，目光是坦荡而明朗的，回来时，却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也许是在楼上侦讯处的某个地方，仅仅由于一时的软弱、一瞬间的动摇、一刹那的恐惧，或者起了想保护一下自己的念头——结果使得今天或明天就会有些新的犯人来到这里，这是一些被过去的战友出卖了的人，他们将重新经历这一切可怕的事情。

看见丧失了良心的人，比看见遍体鳞伤的人更可怕。假如你有被身边走过的死神洗涤过的眼睛，假如你有被死而复生所唤醒的感官，不言而喻，你就会觉察出谁动摇了，谁或许已经叛变了，谁正在灵魂的某个角落考虑着这样的事情：如果出卖战友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使自己轻松一点，也许不会太坏吧。你这可怜的懦夫！用牺牲朋友的生命来保全的生命，还算什么生命呢？

我头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后来它却反复出现。这个想法的产生，恰恰是在那天早上，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另一种环境里，在人们最能相互了解的那个地方：“四〇〇号”。

我在“电影院”里没坐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许是一个半小时以后，有人在我背后叫我。两个穿便衣的、说捷克语的人搀扶着我走进了电梯，开到四楼，把我带进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门上写着：

四〇〇号

在他们的监视下，我独自坐在后边靠墙的一把孤零零的椅子上，我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觉环顾了一下四周，我觉得眼前的情景好像见到过。难道我来过这里吗？不，没有来过。但我仍然知道这间屋子。我认识这个地方，梦见过它，在一个可怕的、热病似的梦中见过它，这个梦把它扭歪了，可怕地改变了它的模样，但却没有把它变

得不能辨认。现在它是可爱的，充满白昼的光辉和鲜明的色彩，隔着装有细栅栏的大窗户，可以看到梯恩教堂[1]、绿色的列塔纳山冈和赫拉德恰尼古堡[2]。在梦中这间屋子是阴森森的，没有窗户，一道污黄的光照亮了它，人们就像影子似的在光线中移动。是的，那时这里有些人。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六排长凳紧挨着，好像一块由蒲公英和毛茛组成的有趣的草坪。在梦里，好像这儿挤满了人，一个挨着一个地坐在长凳上，面孔苍白，血淋淋的。那边，紧挨着门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的、眼光痛苦的男人，他要求喝口水，喝口水，然后就像徐徐放下的帷幕，慢慢地、慢慢地倒在地上了……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曾发生过，如今我才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梦。现实本身就是如此残酷而疯狂。

这是我被捕和第一次受审的那天夜里的事。他们曾经把我带到这里来过三次，也许是十次。我记得，只有当他们需要休息一会儿或干别的什么事情的时候，才把我带出去。我还记得，那时我赤着脚，冰冷的方砖曾经怎样舒服地浸凉过我那被打伤的脚掌。

当时那些长凳上坐满了容克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成了盖世太保夜间的捕获物。那个站在门边的、穿着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就是容克工厂党支部的巴尔托尼同志，他是我被捕的间接原因。我这样说，是不想为我的不幸命运去怪罪任何人。我的被捕倒不是因为同志中有谁叛变或者是怯懦，而仅仅是因为不慎和倒霉。巴尔托尼同志为他自己的支部寻找领导关系。他的朋友叶林涅克同志对秘密工作规定有点疏忽，告诉了他应当同谁取得联系。本来叶林涅克同志应当事先同我商量，这样便可以不通过他也能把事情办妥。这是一个错误。另一个更为严重的更带关键性的错误就是有一个姓德沃夏克的奸细骗取了巴尔托尼同志的信任。巴尔托尼同

---

① 梯恩教堂是布拉格一座雄伟的哥特式建筑物，建于 14 世纪末。
② 赫拉德恰尼古堡位于布拉格市中心，地势稍高。现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府所在地。

志把叶林涅克的名字告诉了他，——这样盖世太保就开始注意叶林涅克一家了。这并不是由于这些同志在两年内胜利完成的主要任务，而是由于一件琐碎的小事，由于完全忽略了秘密工作的规定。于是佩切克宫决定逮捕叶林涅克夫妇，正好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里聚会，盖世太保出动了不少——这一切完全出于偶然。这件事本来不在盖世太保的计划之内，他们本来打算第二天才逮捕叶林涅克夫妇，可是那一天晚上在顺利破获了容克工厂的地下党支部以后，他们劲头上来了，就开车出来"兜兜风"。他们的突然袭击固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在这里发现了我，却使他们更觉得意外。他们甚至不知道抓住的是什么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假如和我一起被捕的不是……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我才对"四〇〇号"有了这些认识。那一回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长凳上和墙旁边都挤满了人。审讯在进行，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意外：一种是我不明白的奇怪的意外，一种是我很明白的坏的意外。

然而我的第一个意外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那是一件愉快的小事，不值得一提——**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的。那个看守我的盖世太保的爪牙——我认识他，他就是在我被捕后将我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个底朝天——他扔给我半支已点燃的香烟。这是三周以来我见到的第一支香烟，这是给一个第二次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的第一支香烟啊！我该接住它吗？他不要以为这样会收买我，但是伴随这支烟的目光全然不那么阴险，不，这个人不想收买我。同样我也未把烟吸完。新生儿是没有强烈的烟瘾的。**

第二个意外：四个人鱼贯地进到屋子里，用捷克语向穿便衣的看守问好，——又向我问好，然后坐在桌子后边，摊开公文纸，抽起香烟来，态度完全怡然自得，好像他们就是这里的官吏似的。可是我明明认得他们，至少认得其中的三个人，他们为盖世太保服务吗？不可能！或许是的，他们真的在这里服务！这明明是**特林格或者雷列克，我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早先是党和工会的书记，虽然他的性

情有些粗暴,但为人厚道——不,这不可能!这是安卡·维科娃,尽管头发斑白,但仍不失为一个端庄美丽的、坚强不屈的战士——不,这不可能。而那个**雷泽克家**的瓦舍克,曾在捷克北部一个矿井里当过泥瓦匠,后来就任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我哪能不认识他呢?我们在北方一同参加过那样多的战斗![①] 盖世太保能使他屈服吗?不,不可能!但是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呢?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找到答案,新的问题又发生了。他们带进来**克列仓**、叶林涅克夫妇和弗里德夫妇。是呵,我知道这些人,不幸得很,他们是同我一道被捕的。但是为什么艺术史家巴维尔·克罗巴切克也在这里呢?这个人曾经帮助克列仓在知识分子中间做些工作。除了我和米列克-**克列仓**,又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那个被打肿了脸的细长个子的青年人向我示意,我们互不相识呢?我倒真是不认得他。这到底是谁呢?什基赫?什基赫医生吗?兹登涅克?唉,上帝呀,这么说,一大批医生也遭了殃!除了我和米列克-**克列仓**,有谁知道他们呢?[②] 他们怎么会发现我的工作同知识分子工作有关系呢?除了我和米列克-**克列仓**以外,有谁知道呢?

答案不难找到,然而这个回答却是严重的、残酷的:米列克叛变了,米列克招认了。最初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也许他还没有全部供出来,等他们把另一批囚犯带上楼来的时候,我看见了:

弗拉迪·万楚拉[③],费伯尔教授和他的儿子,被打得变了样的、叫人难以认出的贝德日赫·瓦茨拉维克[④],鲍日娜·布尔帕诺娃,英德日赫·埃尔勃尔,雕塑家德伏沙克,凡是参加过或应邀参加捷克知识分

---

① 指1932年捷克北方矿工的总罢工,伏契克曾积极参加。

② 在以往的版本里还有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在牢房审讯我的时候,问起了捷克知识分子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事呢?

③ 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1891—1942),捷克进步作家、共产党员、反法西斯战士,遭德国法西斯杀害。

④ 贝德日赫·瓦茨拉维克(1897—1943),捷克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共产党员、反法西斯战士,遭德国法西斯杀害。

子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在这儿了。**克列仓**把知识分子的工作全部供出来了。

我在佩切克宫的最初几天是难熬的。但这件事却是我在这里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期待的是死而不是叛变。无论我怎样想宽大地评判、无论我怎样寻找可以原谅的各种情况,无论我怎样想**克列仓**不致于出卖,我都找不出别的说法,这就是叛变。瞬息间的动摇也罢,怯懦也罢,或者是被折磨得要死以致处于昏迷和狂乱中寻求解脱也罢,这一切都不能使人饶恕。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盖世太保在第一个晚上就知道了我的名字。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也到这里来了,原来我曾在她那儿同**克列仓**碰过几次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有克罗巴切克,会有什基赫医生。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得来"四〇〇号",每天都会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一些可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哼,这个人,这个曾经有骨气的人,在西班牙前线冒过枪林弹雨,在法国集中营的严酷考验中没有屈服过,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下吓得面无人色,为苟且偷生而出卖别人。他的勇气是那样的差,只是为了少挨几鞭子!他的信仰也同样不坚定。在集体里,在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他曾经是坚强的。他之所以坚强,是因为他想着他们。现在,当他被孤立,被敌人包围的时候,在拷问下,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他失去了一切,因为他开始只想自己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躯壳,他不惜牺牲朋友。他屈从于怯懦,由于怯懦而叛变了。

当他们在他身上搜到文件的时候,他没有暗下决心:宁死也不译出密码。他译出了。他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供出了一些秘密工作的联络点。他把盖世太保的密探领去同什基赫会面。让盖世太保去瓦茨拉维克和克罗巴切克会晤的德伏沙克家。他供出了安妮奇卡,甚至还供出了丽达,那个曾经爱他的坚强勇敢的姑娘。几鞭子他就吃不消了,就能使他供出他所知道的事情的一半,而当他确信,我已经死了,没有人会来对质的时候,他就把其余的一半也供了

出来。

他的这种行为对我倒没有什么伤害,我反正是在盖世太保的手里了,还能怎么样呢?相反,他的供词只是侦讯所依赖的初步线索,可以说是交出了锁链的一端,以下的环节却握在我的手里,而他们又是非常需要解开这些环节的。正因为这样,我和我们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能活到戒严期以后。在这个案子里,如果他忠于自己的职责,就不会牵连一大批人。我们俩人也许早已死了,但另一些人可能活着;我们倒下去了,可另一些人却会继续工作。

懦夫失去了比自己生命更多的东西。米列克就是这样。他从光荣的队伍中逃跑了,连最卑鄙的敌人都瞧不起他。他虽生犹死,因为他被集体所摒弃。后来他也力求弥补一下自己的罪过,但他再也不能回到集体中来了。在监狱里被唾弃,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可怕。

囚徒和孤独——这两个概念通常被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囚徒并不孤独。监狱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即使用最严厉的隔离手段也不能使人脱离这个集体,如果这个人自己不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话。在这里,那些受压迫者的兄弟般的友爱具有一种坚强的力量,它把人们凝结成一个整体,锻炼他们,使他们的感觉更加敏锐。它能够穿透那个活着的、能说话和传递消息的高墙,把整个一层楼的牢房联结起来,这些牢房是由其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哨兵"、共同的杂役以及在新鲜空气里共同的半个小时"放风"联结在一起的;利用"放风"时说一句话或做一个动作,就能够探听到消息或者保住一个人的生命。在囚犯们一同去受审、一块儿坐在"电影院"或一同回来的时候,这种兄弟般的友爱将整个监狱都连在一起了。这种友爱很少是用语言而是用巨大的行动来表现的,只要简单地捏一捏手或偷递一根烟,就足以打破那关住你的牢笼,把你从毁灭性的孤寂中解救出来。监狱里有手;当你受刑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些手在怎样支撑着你,使之不致于倒下去;当敌人竭力用

饥饿把你赶到死亡的边缘时,你会从这些手里得到食物。监狱里有眼睛;它们在你赴刑场时看着你,使你知道,你必须昂首阔步走去,因为你是他们的兄弟,你不应该用不坚定的步伐来削弱他们的兄弟友爱。如果没有这种友爱的支持,你就连命运中所遭受到的十分之一的痛苦都忍受不了。无论是你或者任何别人都忍受不了。

如果我能继续写下去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去),在这个报告里,将要常常出现作为这一章的标题的几个字:"四〇〇号"。一开始我只把它当成一个房间,我在那里的最初几个钟头,印象是不愉快的。但这不是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集体,一个愉快的、战斗的集体。

"四〇〇号"产生于一九四〇年,正是盖世太保反共科加强活动的时候。它是候审室——"电影院"的分院,也就是一间犯人的候审室,是专为共产党人设立的,免得为了每一个问题都把犯人从一楼拖到四楼来。犯人们应当经常在侦讯官旁边,这样审问起来才方便。这就是他们设立"四〇〇号"的目的。

只要有两个犯人——尤其是两个共产党员聚在一起,不出五分钟就会形成一个能破坏盖世太保的一切计划的集体。一九四二年,"四〇〇号"简直就叫做"共产党中央"了。它经过了许多变迁:数千名男女同志曾经在这些长凳上轮流坐过,但其中有一点却是不变的,那就是集体主义的精神、对斗争的忠诚和对胜利的信心。

"四〇〇号"——这是一个远远突出在前沿的堑壕,被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成了敌人的火力目标,但是从来没闪现过投降的念头。红旗在它上面飘扬。这里表现出了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

在楼下,在"电影院"里,穿着高筒靴的党卫队队员来回巡逻,你的眼睛眨一眨都要被他们喝斥。而在"四〇〇号"里,监视我们的是捷克警官和警察局的密探,他们是以翻译的身份为盖世太保服务

的，有的出于自愿，有的是反动当局派来的，有的作为盖世太保的帮凶，有的作为捷克人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也有的介于这两者之间。在“四〇〇号”里，可以不用两手扶膝、两眼直瞪、挺直了身子坐着。在这里，你可以比较自由地坐着，你能够东张西望，打个手势——有时甚至可以更加随便些，但要看情况，要看是这三种人中哪一种人值班。

“四〇〇号”——是最能够深刻认识被称为“人”的这种动物的地方。在这里，由于死亡的逼近，赤裸裸地暴露着每一个人——那些左臂上缠着红布条的共产党犯人或共产党的嫌疑犯，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看守和在不远的房间里参加审问的人。在审问中，言语可以成为一种盾牌或一种武器。但在“四〇〇号”里却不能用言语来掩饰。这里重要的不是你的言语，而是你内心的一切。在你内心里只剩下最本质的东西了。一切次要的东西，一切能掩盖、缓和或者粉饰你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的那些东西，都被临死前的旋风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最简单的主语和谓语：忠实者坚定，叛徒出卖，庸人绝望，英雄们斗争。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力量和软弱、勇敢和胆怯、坚定和动摇、纯洁和肮脏。而在这里，只能够存在其中的一种，非此即彼。假如有人想不露声色地游离于这两者之间，那他就会比一个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手里拿着铙钹、在出殡的行列里跳起舞来的人更惹人注目。

这种人在犯人中间有，在捷克警官和密探当中也有。审讯的时候，他给纳粹帝国上帝烧香，而在“四〇〇号”里，他也给布尔什维克“赤魔”烧香。在德国警官那里，他可以为了迫使你供出联络员的名字，打掉你的牙齿，而在“四〇〇号”里，他可以装出友善的样子，递给你一块面包表示关心，使你不至挨饿。在搜查时，他把你的住宅抢劫一空，而在“四〇〇号”里，他却可以塞给你半支抢来的烟卷，表示对你的同情。还有另一种人——可以说是这类人的变种，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地害过谁，但也没有帮助过谁。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性

命，因此他们很敏感，这使他们成为明显的政治气压表。他们很凶或者打官腔吗？那准是德寇在向斯大林格勒进攻了。他们和颜悦色，还同犯人聊天吗？那就是形势好转：德寇准是在斯大林格勒吃了败仗。他们如果开始说自己原是捷克人的后裔，谈他们是怎样被迫地给盖世太保服务时，那就好极了：准是苏联红军已经推进到罗斯托夫了。——他们中间还有这样一些人：当你快淹死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而当你自己爬上岸时，他们却欣然地向你伸出手来。

这种人感觉到了“四〇〇号”这个集体，并且想竭力接近它，因为他们意识到它的力量。但他们从来不属于它。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集体的存在，我想把他们叫做刽子手，但即使是刽子手，也还是属于人的一类呀。而这些满口说着捷克话、手里拿着木棍和铁棒的猛兽，折磨起捷克犯人来，却残酷得连很多盖世太保都不敢看。他们甚至用不着伪善地借口说这是为了本民族或者帝国的利益，他们折磨和杀人完全是为了取乐，他们打掉你的牙齿、刺破你的耳膜、挖掉你的眼睛、割掉你的生殖器、敲碎受刑者的脑袋，一直把你残酷折磨致死。这种残忍找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完全是兽性的发作。每天你都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你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折磨，他们在场使整个空气都充满了血腥味和惨叫声，他们在场能帮助你增强信念：即使他们把罪行的见证人统统杀死，也还是逃不脱正义的审判。

但是就在他们的旁边，就在同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着另一些人，看上去仿佛也是属于相同职务的人，这些人用大写的“人”字来称呼倒是极其正确的。他们把监禁犯人的机构变成了犯人自己的机构，他们帮助建立了“四〇〇号”这个集体，他们把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勇气都献给了它。他们不是共产党员，这更显出他们精神的伟大。恰恰相反，他们从前在警察局工作的时候，还干过反共的事，可是后来他们看到共产党人在跟德国占领者作斗争，便意识到了共产党的力量，明白了共产党人对于整个民族的意义，从此他们便忠实地为这一共同的事业服务，并且帮助每一个坐在牢狱中的长凳上却

依然忠于这一事业的人。狱外的许多战士，如果想到自己一旦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将会经历怎样的恐怖遭遇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踌躇吧。但这一切恐怖情景却每日每时都出现在这些战士的眼前，每日每时他们都可能被列入犯人的行列，很可能遭到比别人更痛苦的磨难。但是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努力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人的生命，减轻了一些无法援救的人的悲惨命运。英雄的称号应当属于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四〇〇号”永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像数千个共产党人所看到的那样：它是那座黑暗的房子里的光明的地方，是敌后根据地，是直接在占领者的虎穴中为自由而斗争的中心。

第五章　雕像与木偶(一)

我向那些经历过这个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既不要忘记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请你们耐心地收集一下那些为着自己也为着你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材料吧。今天终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伟大的时代和那些创造了历史的无名英雄们。我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伟人。希望所有这些人都能使你们感到像自己的熟人，像自己的亲人，像自己那样亲切。

整整一代的英雄惨遭屠杀。爱他们吧，哪怕热爱其中的一个，就像热爱亲生儿女一样地热爱他吧，为他是一个为着未来而生活过的伟大的人而骄傲吧。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头刻的雕像。而每一个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带着金色的肩章，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但也需要看看这些活木偶是多么卑鄙而可怜，看看他们是多么残暴而可笑，因为这些都是将来有用的材料。

我下面所要讲的，仅仅是些原始材料，是见证人的供词。这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因为我能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不可能有广阔的眼界的。然而这些片断却具有真实情况的本质特点：伟大与渺小，雕像与木偶。

叶林涅克夫妇

约瑟夫和玛丽亚，丈夫是电车工人，妻子是女仆。有必要看一看他们的住宅。朴素大方、光滑而时新的家具，小书架，小塑像，墙

上挂着一些相片，房间非常洁净，洁净得难以置信。你也许会说，女主人把整个心灵放在这间屋子里了，对外界一无所知。那才不是呢！她很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实现那梦寐以求的正义的理想。夫妇俩都忠实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在沦陷时期，面对艰巨的任务，他们从来没有退却过。

三年以后，盖世太保闯进了他们的住宅。他们俩并肩站着，昂着头，把手高高地举起。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夜里他们要把我的古斯蒂娜送到波兰去“做工”。送去服苦役，送到那伤寒病的死亡区去。也许她还能活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我的案子据说已经移交法院了。这就是说，我在庞克拉茨监狱还有一个月的拘留期，以后再过不长的时间就完结了。这些日子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继续写下去。不过今天是不行了。今天我的整个脑子和心都被古斯蒂娜占去了。她品格高尚，热情诚挚，她是我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

每天晚上我给她唱她心爱的歌：歌唱那草原上的绿草，歌唱那光荣的游击战争，歌唱那为自由而同男子并肩作战的哥萨克姑娘，歌唱她那刚毅的英雄气概，歌唱她怎样在一次战斗中“倒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①

这就是我的战友！②在这个面貌端庄、有一双脉脉含情的孩子般的大眼睛的小个子女人身上，蕴藏着多少力量啊！斗争和经常的离别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止一次而是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哀伤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融合在一起。

---

①② 这两句话是伏契克用俄文写的。

多年来我们一块工作,完全像朋友似的互相帮助。多年来她都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批评者。如果没有她那爱抚的目光督促着,我便很难写下去。多年来我们并肩参加过无数次斗争,多年来我们携手游逛过使我们着迷的城郊。我们经常陷入贫困,但我们也感到过极大的快乐,因为我们拥有穷人的财富:那就是内心的一切。

你要问古斯蒂娜吗?古斯蒂娜是这样的人:

那是去年六月中旬戒严时候的事。她在我们被捕六个星期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在那痛苦的六个星期里,她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苦苦地思索着人们传给她的关于我死去的消息。她是被叫来"软化"我的。

"您劝劝他吧,"当她同我对质时,反共科的科长对她说,"劝劝他,让他放聪明点。不为自己着想,至少也应该替您想想呀。给你们一小时的时间考虑。如果他还是这样顽固,今天晚上就把你们两个人都给枪毙了。"

她用爱抚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简洁地回答:

"科长先生,这对于我不是恐吓,倒正是我的最后请求。你们如果要处决他,把我也一起枪毙好啦!"

这就是古斯蒂娜!这就是爱情和坚贞。

他们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蒂娜?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

呵,人们呀,你们能够想象出我们将会怎样生活吗,假如我们度过了这番苦难而又相逢在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在闪耀着自由和创造的美好生活里又重逢的话?假如我们在如此渴望并为之努力的、而今要为它赴汤蹈火的美好生活一旦实现之后又相聚在一起的话?呵,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也仍将分享你们巨大幸福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欢乐所在,虽然人世间的分别是悲哀的。

她在我们被捕六个星期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她是被叫来『软化』我的。

他们不允许我俩告别，也不让我们拥抱和握手。只有把查理广场[1] 同庞克拉茨监狱联系在一起的监狱集体，给我们俩传递彼此命运的信息。

古斯蒂娜呵，你知道，而我也明白，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我依然听到你从远处传来的喊声：再见吧，我亲爱的！

别了，我的古斯蒂娜！

我的遗嘱

我除了书橱以外，别的一无所有。但是盖世太保把它捣毁了。

我写过许多文学评论、政论文章、报告文学作品、文艺短论、戏剧评论和发言稿。其中有许多是关于某个时期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们整理出来。不过现在这个希望也难于实现了。因此我请求我忠实的朋友拉佳·什托尔[2] 把它们收集和整理成五个集子：[3]

一、政论和论战集；

二、国内报告文学选集；

三、苏联报告文学选集；

四和五、文艺和戏剧的评论和专论集。

这些作品大部分可以在《创造》杂志和《红色权利报》上找到，有些发表在《树干》、《泉源》、《无产阶级文化》、《时代》、《社会主义者》、《先锋队》及其他杂志上。

---

① 查理广场位于布拉格市中心区，当时古斯塔被囚禁在广场的一所监狱里。

② 拉迪斯拉夫·什托尔(1902—1981)，捷克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批评家。

③ 伏契克的遗作后来由他的夫人古斯塔和什托尔编成《尤利乌斯·伏契克文集》，布拉格自由出版社出版，共 12 卷。

在出版家吉尔加尔(我爱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气,敢于在沦陷时期出版我写的《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①]》)那里,有我写的论尤利乌斯·泽耶尔[②] 的论文。另外一部分关于沙宾纳[③] 的专论和关于扬·聂鲁达的札记,藏在叶林涅克夫妇、维苏希尔和苏哈涅克夫妇住过的房子里。现在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了。

我还着手写了一部关于我们这代人的长篇小说[④]。有两章在我的父母那里,其余的大概已经散失了。我在盖世太保的卷宗里看见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草稿。

我嘱咐未来的文学史家要爱护扬·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眼光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而看到了未来。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研究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绩的。需要向读者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人们总把他同小城区[⑤] 那种庸俗的田园诗联系在一起,却看不到,对于这个有“田园诗情调”的古旧的小城区说来,聂鲁达是个“逆子”;他们看不到,聂鲁达出生在小城区和斯米霍夫区[⑥] 的边界上,在工人住宅区里长大;他们看不到,他为了写《墓地之花》[⑦] 而到小城区的墓地去,必须经过林霍夫尔工厂。看不到这些,你就无从了解从写《墓地之花》到《一八九〇年五一节》[⑧]的聂鲁达。有些批评家,甚至像沙尔达[⑨] 这样有眼光的批评家,竟然认为聂鲁达的新闻工作妨碍他的诗歌创作。这真是无稽之谈! 相反,正因为他是新闻记者,他才能写出像《谣曲与故事

---

① 聂姆曹娃(1820—1862),捷克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外祖母》享誉国内外。

② 泽耶尔(1841—1901),捷克诗人、作家。

③ 卡雷尔·沙宾纳(1813—1877),捷克文学批评家和歌剧的词作者。

④ 伏契克未写完的长篇小说题为《彼得的上一代》。

⑤ “小城”捷克文为“马拉斯特兰那”,是布拉格的一个区。那里名胜古迹较多,有布拉格“珍珠”之称。小城区的居民大多为小资产阶级。聂鲁达写过一本《小城故事》,描写这些人的生活。

⑥ 斯米霍夫区是布拉格的一个工人区。这里伏契克的意思是说:扬·聂鲁达的立场介于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并向工人阶级转变。

⑦ ⑧ 《墓地之花》(1857)是聂鲁达的第一部诗集,带有1848年革命失败后笼罩着欧洲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悲观情绪。《一八九〇年五一节》(1890)是一篇战斗的杂文,充满了希望,是诗人最后的著作。

⑨ 弗朗基谢克·沙维尔·沙尔达(1867—1937),捷克现代文艺批评的奠基人。

诗》、《星期五之歌》以及大部分《平凡的主题》这样壮丽的诗篇。新闻记者的工作也许使人疲惫，耗费精力，但却使聂鲁达同读者接近，对他写诗有帮助，特别是对聂鲁达这样一个正直的记者来说。聂鲁达如果离开了仅有一天生命力的报纸，或许能写出许多诗集来，但却不能写出一本像他现在创作的超越本世纪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也许有人能够完成我对沙宾纳的论述。这是值得做的。

我想用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来保障我的父母安度晚年，以报答他们的爱和他们平凡而高贵的品质。当然，我的全部劳动并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目的。希望他们不要因我不在他们身边而感到忧郁。“劳动者死了，但劳动果实却长存。”在围绕着他们的温暖和光明中，我将永远在他们身旁。

我请求妹妹莉芭和维尔卡，用自己的歌声来帮助父母忘却我们家中的损失。她俩从家里来佩切克宫探望我们的时候，已经流了不少眼泪，但欢乐却活在她们心中，为了这个我爱她们，为了这个我们彼此相爱。她们是欢乐的传播者——愿她们永远是欢乐的传播者吧！

经历过这次最后的斗争而活下来的同志们，以及继我们之后参加斗争的同志们，我紧紧地握你们的手。我替我自己，也替古斯蒂娜握你们的手。我们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尤·伏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案子已经结束并签了字，我在法院侦查员那儿的事昨天就结束

了。一切进行得比我预料的更快。他们似乎在抓紧办理。同我一起被起诉的还有丽达·普拉哈和**克列仓**。**克列仓**的叛变行为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便宜"。

在侦查员那里是那样的严厉而冷酷,单是那副样子就叫人寒心。在盖世太保那里还可以感觉到有点生活,虽然是可怕的,但毕竟还算是生活。那里甚至有热情,一边是战士的热情,另一边是猎人的、掠夺者的、或者简直就是强盗的热情。另一边的这种热情中甚至还有人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可是在侦查员那里,却只是个例行公事的衙门。外衣翻领处的那个大卐字章表明了他内心并没有信仰。它不过是一种盾牌,在它后面躲着一个可怜的小官吏,他总想苟且偷安地度过这个时代。他对被告既不好也不坏,既不笑也不愁。他只是例行公事。他没有血,只有一种稀薄的液体。

他们写了报告,签了字,分条列目都弄好了。理出了我的六大罪状:阴谋颠覆德意志帝国、准备武装暴动……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其实只要其中随便哪一条就足够了。

十三个月来,我就在这里为同志们和我自己的生命斗争。我斗争得既大胆又狡黠。他们把"北方人的狡黠"列入他们的惩办条款中。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承认的。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除了狡黠之外,手里还有斧头。

这次较量算结束了。现在只需要等待。大约再有两三个星期起诉书就可编造出来,然后启程到帝国去等候审问和判决,最后还有一百天等着处死。前景就是这样。这么一来,我还有四个月或者五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可能有很多变化。一切都可能改变。可能的。在监狱里我很难判断这个。而监狱外面一些事情的迅速发展也可能加快我们的死亡。因此,情况还是一样。

这就是希望和战争在赛跑。死和死在竞赛。是谁的死来的快:是法西斯的死或是我的死?这难道只是我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吗?不是的,几十万囚犯,几百万士兵,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亿万人民都

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的人希望大一点，有的人希望小一点。但这都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用恐怖统治着整个世界，致命的灾难威胁着每一个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能够说："我活过了法西斯时代。"而在说这话之前，几十万人——而且是些怎样的人啊！——却正在倒下去。

决定性的时刻只剩下几个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几天了。正是这些日子显得特别残酷。我常常在想，做最后的一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里，被最后的一粒子弹射入他的胸膛，这该是多么懊丧的事啊！但总得有人当这最后的一个呀。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后的一个就是我的话，我情愿马上就去赴死。

我在庞克拉茨监狱里逗留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已经不允许我把这个报告写成我希望的那样。我必须写得更简短些。这个报告与其说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毋宁说是对一些人的见证。我想这点是更为重要的。

我从叶林涅克这对夫妇开始写我的人物——这是两个普通人，平时谁也看不出他们是英雄。在被捕的那会儿，他俩并肩站着，他面色苍白，她的双颊带有肺结核患者的红晕。当她看到盖世太保在五分钟内就把那陈设整齐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她的眼睛显得有些惊恐。随后她慢慢地转过头来问自己的丈夫：

"佩巴[①]，现在怎么办？"

向来寡言少语、词不达意、一说话就激动不安的约瑟夫，这时却平静而毫不紧张地答道：

"我们去死，玛丽亚。"

她没有喊叫，也没有摇晃，只用一种优美的姿态把手放了下来，就在枪口对准他们的情况下，把手递给了他。为此她同她丈夫的脸上都挨了第一拳。她擦了擦脸，惊奇地看着这几个不速之客，带着

---

① 佩巴是约瑟夫的爱称。

几分幽默的口气说：

"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她的声音逐渐强硬起来，"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蛮人。"

她说得很对。几个钟头之后，她被打得不省人事，被带出了"审讯官"办公室。但他们并没有能够从她嘴里掏出一点东西，不仅这一次，后来也永远没有。

我不知道，在我躺在牢房里不能受审的那些日子里他俩的情况怎么样。但我知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俩什么也没有说。他们等待着我。后来佩巴还有很多次被他们捆绑起来，打了又打，但他没有吭一声，直到我能悄悄地告诉他，或者至少跟他递个眼色，暗示他哪些可以说，或者应该怎么说，以便搅乱他们的审问时为止。

我在被捕之前，就知道玛丽亚是一个富于感情的、爱哭的女人。但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整个期间，我却从来没见到过她眼里含有泪水。她很爱自己的家，但当狱外同志为了安慰她，让人转告她说，他们知道谁偷走了她家的家具，并且正在密切监视盗窃者的时候，她却回答说：

"家具随它去吧。请他们不要在这事上面费心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办。现在他们必须代替我们工作。首先应当把最主要的事料理好。如果我能活下来，我自己会把家料理好的。"

有一天，他们把这对夫妇分头押走了。我打听过他俩的下落，但是徒劳。在盖世太保那里，人们无影无踪地死去，却在千百座不同的墓地里播下了种子。唉，这可怕的播种，将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玛丽亚最后的嘱托是：

"上级，请转告外面的同志，不要为我难过，也不要被这件事吓住。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将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仆"。她没有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也不知道从前有人曾经说过：

"过路人，请告诉拉刻代蒙的人们，我们依照他们的嘱托，倒在

这里牺牲了。"[1]

维苏希尔夫妇

他们和叶林涅克夫妇住在同一幢楼里，两家紧挨着。他们也叫约瑟夫和玛丽亚。这是一个下层小职员的家庭，他们两个都比邻居的年岁稍大些。约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时，还是努斯列区[2]里的一个十七岁的高个子青年。几个星期以后，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已经打碎了一个膝盖，后来一直没有治好。他同玛丽亚是在布尔诺一个野战医院里认识的，那时她是护士。她比他大八岁，玛丽亚同她的前夫生活得很不幸，于是便离开了他。战争结束后，她就同约瑟夫结了婚。她对他的态度始终像护士，又像母亲。他们两个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也没形成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他们通向党的道路是比较艰难复杂的，——但他们终于找到了党。像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这条路是通过苏联达到的。早在德寇占领以前，他们就明白了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他们曾经在家里掩护过一些德国同志。

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苏联遭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严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就在他们家开过会。经常在他们家借宿的有洪扎·齐卡和洪扎·切尔尼，而以我的次数为最多。《红色权利报》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里写的，许多决议也是在这里通过的，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卡雷尔"——切尔尼。

他们夫妇俩都非常谨慎小心，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时——在地下工作中是经常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的——他俩总是知道该怎样处理。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内行。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好心肠

---

① 拉刻代蒙是古希腊的一个地区。公元前480年，在希腊波斯战争中，拉刻代蒙王李奥尼达斯亲自率领300名战士固守希腊东部的温泉关。拉刻代蒙的壮士们在敌人四面包围下英勇奋战，直至最后一人。后人在这里给他们立了一座碑，上面刻着古希腊诗人凯奥斯的西蒙尼德斯所写的这段碑文。

② 努斯列是布拉格东南郊的一个工业区。

的高个子铁路小职员维苏希尔和他的太太会参与这种犯禁的事情。

然而他在我之后不久竟被捕了。我在狱中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感到惶恐不安。万一他供出来，那一切就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啊！但他却沉默不语。他被抓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把几张传单给了一位朋友。——关于他，盖世太保除了知道几张传单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几个月以后，由于扬·波科尔尼和皮克索瓦严重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①]，奸细告密，盖世太保知道了洪扎·切尔尼曾经住在维苏希洛娃的妹妹家里，于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把佩彼克[②]"审问"了两天，想从他那里探听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③]的踪迹。第三天，佩彼克来到了"四〇〇号"，小心翼翼地坐到一个位子上，因为新的伤口使他非常难于坐下。我用带着疑问的但同时也是鼓励的目光不安地望着他。他用努斯列区人那种简明的语句愉快地回答说：

"只要脑袋不肯，那么嘴或屁股都不会说出来的。"

我很熟悉这个小家庭，我知道他们俩是怎样地相亲相爱，当他们俩不得不分别哪怕是一两天的时候，他们都是多么闷闷不乐啊。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在那个米赫列区舒适的住宅里，这些日子对于那个已经到了觉得孤独比死更为可怕的年龄的女人说来，该是多么沉重啊！她做梦也在想怎么样营救自己的丈夫，幻想他怎样回到这个小小的充满着田园乐趣的家庭里来，回到他们有点可笑地相互称呼"小妈妈"和"小爸爸"的家里来！她终于重新找到了唯一的道路：继续工作，为了自己，也为了他。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她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把丈夫的照片摆

① 这句话在以往的版本里被删去。可是在新的版本里却又不是用黑体字来标明的，不知何故。

② 佩彼克是约瑟夫的爱称。

③ 美国作家詹姆士·库柏(1789—1851)写过一部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小说以北美殖民时期印第安人的生活为题材，描写一个印第安部落酋长因本部落在战争中被灭绝，剩下他孑然一身，成为"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在他平常坐的那个地方。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她和丈夫的酒杯碰了碰杯,祝他健康,愿他早日归来,希望他活到解放。

一个月后,她也被捕了。这个消息使“四〇〇号”里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她是狱外联络员之一。

可是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他们没有拷打她,因为她病得很厉害,经不起他们的拳打脚踢。可是他们用了更为可怕的手段:用想象来折磨她。

在她被捕前几天,他们就把她的丈夫送到波兰去做苦工了。审问时,他们对她说:

“您瞧,那边的生活多苦呀。即使十分健康的人也都够呛,何况您丈夫还是个残废。他会受不了的,很难熬下去。他会在那边什么地方死去的,那您就再也见不到他啦。像您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到谁呢? 如果您放聪明点,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那我们立刻就可以把他给您放回来。”

他被流放到那边的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佩彼克! 可怜的人啊! 谁知道他会怎样死去呢? 他们杀了我的妹妹,又要杀我的丈夫,留下我独自一个人,完全孤独的一个人。是的,我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谁呢? ……我将要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我能保住他,能让他们把他还给我……但是,要用这样的代价吗? 如果这样做,我就不再是我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小爸爸”了……

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最后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在盖世太保设立的无数流放组中的一个组里消失了。紧接着又传来了佩彼克在波兰死去的消息。

丽　　达

我头一次到巴克斯家里去是在一个晚上。家里只有约什卡和一个目光灵活的女孩子,大家都叫她“丽达”。可以说她还是个孩子,一直好奇地注视着我的大胡子,显然她很满意,因为屋子里增添

了一位能同她闲谈一会儿的有趣的生客。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原来已经十九岁了，是约什卡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她姓普拉哈[1]，但她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姓的特征，她常在业余剧团演戏，非常喜欢舞台生活。

我成了她所信赖的人，根据这一点我意识到自己在她眼中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她把自己那些青年人的痛苦和梦想都告诉了我，并且经常跑到我这里来，把我当作她同姐姐、姐夫吵嘴时评判是非的仲裁者。她像许多少女一样是急性的，也像最小的孩子一样是被娇惯了的。

我在隐居了半年之后，头一次上街散步就是她陪着去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跛脚老头同自己的女儿一道散步，比自己一个人走路会更不惹人注意，因为路上的人多半是看她而不看跛脚老头的。因此，第二次又是她陪我散步，还陪我去进行第一次秘密接头，陪我去秘密联络点。这样一来——正如起诉书中所说的——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联络员。

她喜欢做这种工作。但是她并不关心这种工作的意义和好处。她只觉得这是一种新奇的、有趣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带有几分冒险味道的工作。这对她就够了。

我一直让她做一些零碎的小事，我不想告诉她太多。假如她一旦被捕，一无所知比意识到“有罪”对她是更好的保护。

但是丽达越来越熟悉这个工作了。她能够担负起比只是去叶林涅克家跑跑、送个通知这类事情更为重要的事了。她已经到了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的时候了。我开始给她上课。这是一门课程，是完全正规的课程。丽达勤奋而又愉快地学习着。表面上她仍是一个快乐、轻率、甚至还有点淘气的少女，但内心已经不一样了。她在思索，她在成长。

在工作中她认识了**克列仓**。他曾经担负过一部分工作，但他善

① “普拉哈”在捷克语里意为“羞怯”或“胆小”。

于自吹自擂。这使丽达对他产生了好感。她也许没看透他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我也没有看透。主要的是由于他所担负的工作和他那表面的信仰，使丽达和他比和别的青年人更接近起来。

对事业的忠诚在丽达的心里迅速地生长，并扎下了根。

一九四二年初，她开始结结巴巴地谈到她想入共产党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忸怩不安。也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我还拿不定主意，还想再教育教育她，需要再考验考验她。

一九四二年二月，她被中央委员会直接吸收入党了。在一个严寒的深夜，我们一同回家。平时爱说话的丽达今天却沉默着。走到离家不远的田野里，她突然停了下来，用轻得能使你同时听到每一片雪花飘落在地上的声音说：

"我知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从现在起，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变节。"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她果然没有变节。

她担任中央委员之间最忠实的联络员。她经常接受最危险的任务：重新接上断了的关系，营救处境危险的同志。当我们的秘密联络点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丽达就会像鳗鱼似的游到那里去巡视一番。她像以前一样做着这一切，自然、快乐而无忧无虑，然而内心却隐藏着坚定的责任感。

在我们被捕后的一个月，她也被捕了。**克列仓**的招供，使盖世太保注意到了她，他们没费多大劲就查清楚了，丽达曾经帮助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转移并转入地下。她摇头，发脾气，装成一个轻浮的少女，仿佛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做这些越轨的事情和它所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她知道很多，但一点也没供出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她在狱中也不停顿地工作。环境变了，工作方式变了，甚至任务也变了。但对于她来说，尽党员的义务却没有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袖手旁观。她仍然那样忘我地、迅速而准确地完成所有的嘱托。如

果需要有人去为外面的同志打掩护，丽达就会带着一副天真的模样，把某种“罪过”承担下来。她当上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几十个素不相识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逮捕。约摸一年以后，他们在她的身上搜到一张纸条，她的这个“肥缺”因此就断送了。

现在她同我们一道去帝国受审。她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有希望活到解放的人。她还年轻。要是我们不在人间，请你们千万别让她掉了队。她需要多多学习。应该教育她，不允许她停滞不前。要给她指引前进的道路，不允许她骄傲或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她在最困难的时刻经受住了考验。她经过了烈火的冶炼，证明她是用一种优质的金属制造成的。

主管我的警官

这不在雕像之列。他是一个木偶，是一个有趣的、比较重要的木偶。

如果你十年前坐在葡萄街“弗洛拉”[1] 咖啡馆里，用钱在桌子上敲敲或叫一声：“领班的，收钱！”突然就会在你身旁出现一个穿着黑礼服的瘦高个子，像条蜥蜴似的在桌椅之间弯弯曲曲地迅速而无声地穿过来，立刻将账单交给你。他有野兽那种敏捷而轻巧的动作，一双锐利的兽眼什么都不会放过。你甚至无须说出自己的愿望，他就会给你指挥侍者：“第三桌，要一大瓶白丁香。”“右边靠窗那桌，一碟点心和一份《国民新闻》。”对于顾客说来，他是一个好的领班，对于其他雇员说来，他是一个好同事。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是在很久以后，在叶林涅克家里。这时他的手里已经握着手枪而不是铅笔了。他指着我说：

“……我对这个人最感兴趣。”

---

① 罗马神话中的花神。

说实在的,我们两人彼此都感到兴趣。

他天生机智,同其他盖世太保相比另有一种特长:善于辨认各式各样的人。因此,他在刑事警察中无疑能获得成功。小偷、杀人犯、社会渣滓,大概都会在他面前毫不迟疑地坦白交代,因为这种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性命。但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性命的人落到政治警察的手中却是很少的。在这里,警察的奸计不仅要对付被捕者的反奸计,而且还要对付远比这个大得多的力量:他的信念和他所属的那个集体的智慧。对付这些,就不是奸计甚至殴打所能奏效的了。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得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一场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残暴,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Al 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凶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

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爱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要弄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有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来说是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者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财，不害命）

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①，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走进他办公室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或者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

"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人。

他还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

① 指1918年10月28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捷克资产阶级共和国。

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餐厅”的招待员，贝兰[①]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处死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②]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而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把其中一百五十个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

博姆经常处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是意义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里的，这是一个例外。

“你是我办过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对我说，他感到骄傲的是我被列入了最重大的案件中。这或许是我生命得以延长的原因吧。

我们相互尽力地、不断地说谎，但也不是毫无选择的。我总知道他在撒谎，而他却只有某些时候才知道我在撒谎。当谎言十分明

---

① 贝兰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动头子之一，法西斯“国民统一党”的首领。在慕尼黑会议以后，当了捷克反动政府的总理。

② 赫罗斯特拉托斯是居住在小亚细亚境内的以弗所人。他为了出名，于公元前 356 年烧毁了自己家乡的宏伟的阿耳忒弥斯月神和狩猎女神庙。后来人们便把那种不惜代价，甚至通过犯罪的手段来谋取个人荣誉的人称为“赫罗斯特拉托斯”。

显的时候，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停止谈下去，而谈别的什么问题。我想，对他说来，重要的并不是确定真凭实据，而是不要给这个“重大案件”留下什么阴影。

他并不认为棍棒和铁链是审讯的唯一手段。他还比较喜欢针对“自己的”对象的情况采取劝诱或恫吓的办法。他倒是从来没打过我，除了头一天晚上以外。但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借别人的手来打我的。

的确，他比别的盖世太保有趣得多，也狡黠得多。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而且善于运用它。我们常常乘车去布拉尼克[①] 进行荒唐的对话，也常常坐在花园的一个小饭馆里，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们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说，“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照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吗？”

还有一次，在审问了我一整天之后，他把我塞进汽车，领我去逛暮色苍茫的布拉格，经过聂鲁达街来到赫拉德恰尼：

“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啊！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

他很会扮演诱惑者的角色。夏天的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我愿意看着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说：

“……等到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这个笑与其说是狠毒的，倒不如说是有点凄惨，他说：

---

① 布拉尼克是布拉格郊区的地名。

"你真是个玩世派。"

后来他还常常回到这天晚上的话题来:

"等到我们不在这里了……这就是说,你仍然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吗?"

他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们会胜利。我向他讲起苏联的力量和它不可战胜的道理时,他注意倾听着。这是我最后几次"审讯"中的一次。

"你们每杀死一个捷克共产党员,也就是毁灭德国民族未来希望的一部分,"我不止一次对博姆说,"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德国民族的未来。"

他摆了摆手。

"如果我们失败了,谁也救不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你瞧,这最后三颗子弹我将为自己保留着。"

……这不仅是对这个木偶的刻画,而且也是在刻画那个日薄西山的时代了。

吊裤带插曲

对面牢房的门旁挂着一副吊裤带,是男人用的十分普通的吊裤带。我素来就不喜欢用这种东西。可是现在,每当有人打开我们牢门的时候,我总是高兴地望着它:我在那上面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们把你抓来关进牢房,也许很快就会把你处死,但他们首先得把你的领带、皮带或吊裤带之类的东西拿去,免得你上吊(其实用床单也可以很方便地上吊)。这些寻死的危险工具一直搁在监狱的办公室里,直到盖世太保中的惩罚女神决定了把你押解到别处去做苦工、去集中营或赴刑场的时候。这时他们把你叫去,郑重其事地将这些东西发还给你。但是不许带进牢房里去,只能挂在门的旁边或者门前的栏杆上,一直挂到你离开为止。因此它就成了这个牢房的一个居住者即将被迫旅行的明显标记。

对面那副吊裤带正出现在我得知古斯蒂娜的命运被确定的那一天。对面牢房里的一个朋友将跟她同坐一辆囚车去做苦工。车还没开,突然决定延期了,据说准备去做苦工的地方被炸了。(又是一个好的预兆)车什么时候再开,谁也不知道。也许今天晚上或许明天,说不定过一个星期或过半个月。对门的吊裤带一直挂在那儿,我见到它,就知道古斯蒂娜还在布拉格。因此我常常带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像瞧见古斯蒂娜的朋友似的看着这副吊裤带。她赢得了一天、两天、三天……谁知道,说不定会有好结果。也许她多留一天,就有得救的希望。

我们每个人在这儿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今天,一个月以前,甚至一年以前,我们就眼巴巴地想望着明天,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一个人的命运已经被决定,后天就要被枪决。——可是,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只要活到明天,明天一切都可能改变,一切都是那么不稳定,谁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明天过去了,几千个人倒下了,对于这几千个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明天了,而活着的人却继续怀着原来的希望活下去:明天,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种情绪产生着最令人置信的传闻,每个星期都出现关于战争结束的乐观的预测,每个人都乐意传播这种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着。每个星期庞克拉茨监狱都在窃窃私语,传播着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大伙儿都很乐意去听信这类东西。应当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摒弃这些没有根据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不仅不能增强人们的斗志,相反地却削弱了斗争性。因为乐观主义不需要、也不应该寄托在谎言上,而应该靠真理,靠对胜利的坚定不移的预见。应该在内心抱着这么一个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成为决定性的日子,希望自己能获得这么一天:能闯过生死关头,从威胁着自己的死亡中走回到不愿离弃的生活中来。

人生是这么短促。而在这里却希望日子过得快些,更快些,越快越好。那迅速流逝的、一去不复返的、不可遏制的迫使我们接近

衰老的时光,在这里却成了我们的朋友。这是多么奇怪啊!

明天很快变成了昨天。后来又即将成为今天。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着。

对面牢房门旁的吊裤带仍旧挂在那儿。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里说的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了。

受审后，他们把我带到下面的“电影院”里。在“四〇〇号”，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中午下到一楼去吃从庞克拉茨监狱送来的午饭，下午又返回四楼。但是那天我们却没再回到楼上去。

我们坐下来吃饭。长凳上坐满了犯人，他们忙着用羹匙往嘴里送饭。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近乎正常。如果明天就要死去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骷髅，那么羹匙碰着陶制的盘子发出的叮当声，就会立即淹没在骨头的脆响和下巴单调的咯咯吱吱的声音里了。然而谁也没有预感到这个。每一个犯人都极其贪馋地吃着，尽量保养好身体，争取再活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

几乎可以说，天气很好。但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接着又平静下来。只有从看守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迹象就更为明显：把我们叫出去整队回庞克拉茨去。在中午回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想想看，当你被一些你不能回答的问题弄得疲惫不堪时，让你有半天的时间不去受审，——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典啊。我们就是这样感觉的。可是事实上并不然。

在走廊上我们碰到了埃利亚什将军[①]。他的眼睛惊恐不安，瞧了我一眼，尽管周围有看守，他却悄悄地说道：

“戒严了。”

犯人只能有几秒钟的时间来传递最重要的消息。埃利亚什已经来不及回答我的无声的询问了。

---

① 埃利亚什将军是1939年纳粹头子亨德里希统治捷克时期的总理，1941年秋根据亨德里希的命令被逮捕。

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对我们提前回来表示惊奇。我觉得带我回牢房的那个看守比别的看守更可靠些。我虽然还没有弄清楚他是谁,但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表示他一点都不知道。也许是我听错了,是的,这是可能的。这倒使我安心了。

但是晚上他又来了,他朝牢房里看了看说:

"您说对了。暗杀亨德里希。重伤。布拉格戒严。"

第二天,我们在楼下走廊里整队出发去受审。维克托·西涅克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是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党中央委员,是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捕的。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高个儿的管钥匙的人,把一张白色的纸片在维克托面前晃了晃,只见纸上写着几个大字:

"释放令!"[1]

那个管钥匙的人嘿嘿地笑着说:

"瞧见吗,犹太人,你总算等到了。释放令!嚓……"

他把手指头横放在脖颈上,表示维克托的脑袋将从这儿飞出去。维克托的哥哥奥托·西涅克是一九四一年戒严期间第一个被处决的。而维克托自己则是一九四二年戒严期间的第一个牺牲者。他被带到毛特豪森[2]去了。按他们漂亮的说法,是去当靶子了。

从庞克拉茨监狱到佩切克宫往返的路上,现在成了千百个犯人的刑场。在囚车里警戒的党卫队队员要"为亨德里希报仇"。没等汽车开出一公里,十来个犯人就被枪托打得头破血流。我坐在车上,倒对其他犯人有好处,因为我下巴上蓬松的胡须能吸引党卫队队员的注意力,他们老想玩弄我的胡子。他们像汽车摇晃时抓吊环似的抓住我的胡子玩耍,这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娱乐之一。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不坏的受审训练。每次审问看起来是根据总的形势进行的,而结束时总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话:

---

① 原文系德文。

② 1938年德国法西斯占领奥地利后,在多瑙河北岸林茨附近的毛特豪森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同奥斯维辛、贝尔赛克、特莱勃林卡等地的集中营一样,纳粹在这里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

“要是你明天再不放聪明点，那就要枪毙你了。”

这话一点也吓唬不了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楼下走廊里喊犯人的名字。五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一会儿这一批带着手铐脚镣的人就像被赶去屠宰的牲口似的装上了大卡车，运到科贝里斯[①]去集体枪决。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罪。他们被捕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事件，对他们没有什么可审问的。可是既然逮捕了，只好处决完事。在暗杀事件发生前两个月，有一个同志对其他九个人读了一首讽刺短诗，于是他们一下子全都给抓了起来，以赞扬暗杀事件的罪名统统给运去枪毙了。半年前，一位妇女因有散发传单的嫌疑而被捕。她不承认这事。于是就把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姐妹们的丈夫和兄弟们的妻子全都抓来枪毙，因为杀尽全家是这次戒严时期的口号。一个错抓来的邮电职工正站在楼下墙边等待释放，听见喊他的名字，他便随声应到。但是他们却把他排列到判处死刑的那一队人里，拉出去枪毙了。第二天才弄清楚应该枪毙的是另一个同名的犯人，又把那一个人也拉出去毙了，这件事才算完结。还犯得上费功夫去核对人们的档案材料，使人的生命有所保障吗？有谁能坚持这点呢？当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了的时候，这又有什么用呢？

那天晚上我从受审的地方回来很迟。楼下墙边站着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他的脚旁放了一个小包袱。我很清楚，他也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互相握了握手。上楼以后，我从走廊朝下再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儿，安详地微倾着头，眼睛凝视着远方，那目光穿越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半小时后就听到传唤他的名字……

几天以后，还是在这个墙边，又站着米洛什·克拉斯尼，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他是去年十月被捕的。酷刑和隔离都没有使他屈服。他侧过头去，给站在背后的看守平心静气地解释着什么。他瞧见了我，笑了笑，点点头向我告别，又继续同那个看守说：

---

① 科贝里斯是布拉格东北的一个远郊区。

"这对你们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还会有很多人牺牲,但失败的终将是你们……"

后来,有一天中午,我们站在佩切克宫的楼下等吃午饭,埃利亚什被带了进来。他腋下夹着一张报纸,微笑地指着报纸对人们说,刚才在报上读到了他与暗杀策划者有牵连的消息。

"真是胡说八道!"他简短地说了一句就开始吃饭了。

晚上他和其他一些犯人返回庞克拉茨监狱的时候,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件事。一个小时后,他从牢房里被押走送到科贝里斯去了。

死尸越堆越高。已经不是几十、几百,而是几千了。不断流出的鲜血的腥味刺激着杀人的猛兽们的鼻孔。他们直到深夜还在"办公",甚至星期天也"办公"。现在他们全都穿上了党卫队队员制服,因为这是他们欢庆屠杀的节日。他们弄死一些工人、教师、农民、作家和职员,屠杀男人、妇女甚至儿童,诛灭全家,屠杀并焚毁整个村子①。枪弹下的死亡像黑死病一般在全国蔓延。它是不择对象的。

而人在这恐怖中怎么办呢?

活下去。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人活着,人在吃饭,睡觉,恋爱,工作,并且思索着成千上万桩与死亡毫不相干的事情。在他的脑子里压着一个可怕的重担,但他承受着,不屈服,也不灰心丧气。

在戒严期间,"主管我的警官"又把我带到布拉尼克去了一趟。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在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

---

① 指捷克克拉德诺城附近的利迪泽村。德国法西斯借口为亨德里希"报仇",将该村男人和少年杀尽,将妇女和小孩全部送往集中营。

家兔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家兔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是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欢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

我从那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突然来到这引人入胜的人流里，起初见到它那甜蜜的幸福，倒真有点痛苦之感。

我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完全不对。

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却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这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而我们——直接生活在这恐怖牢笼里的人，难道是用另一种材料做成的吗？

有时我坐着囚车去受审，当看管得比较松懈的时候，我就从车窗里朝街上望，瞧瞧百货商店的橱窗，看看卖花亭，瞧瞧成群的行人，看看妇女们。有一次，我对自己说，假如我能数得出九双漂亮的腿，那就意味着我今天不会被处死。于是我就数着，观察着，比较着，认真地研究它们的线条。我以极大的兴趣来评判它们是否漂亮，但是并没有去想这样评判的结果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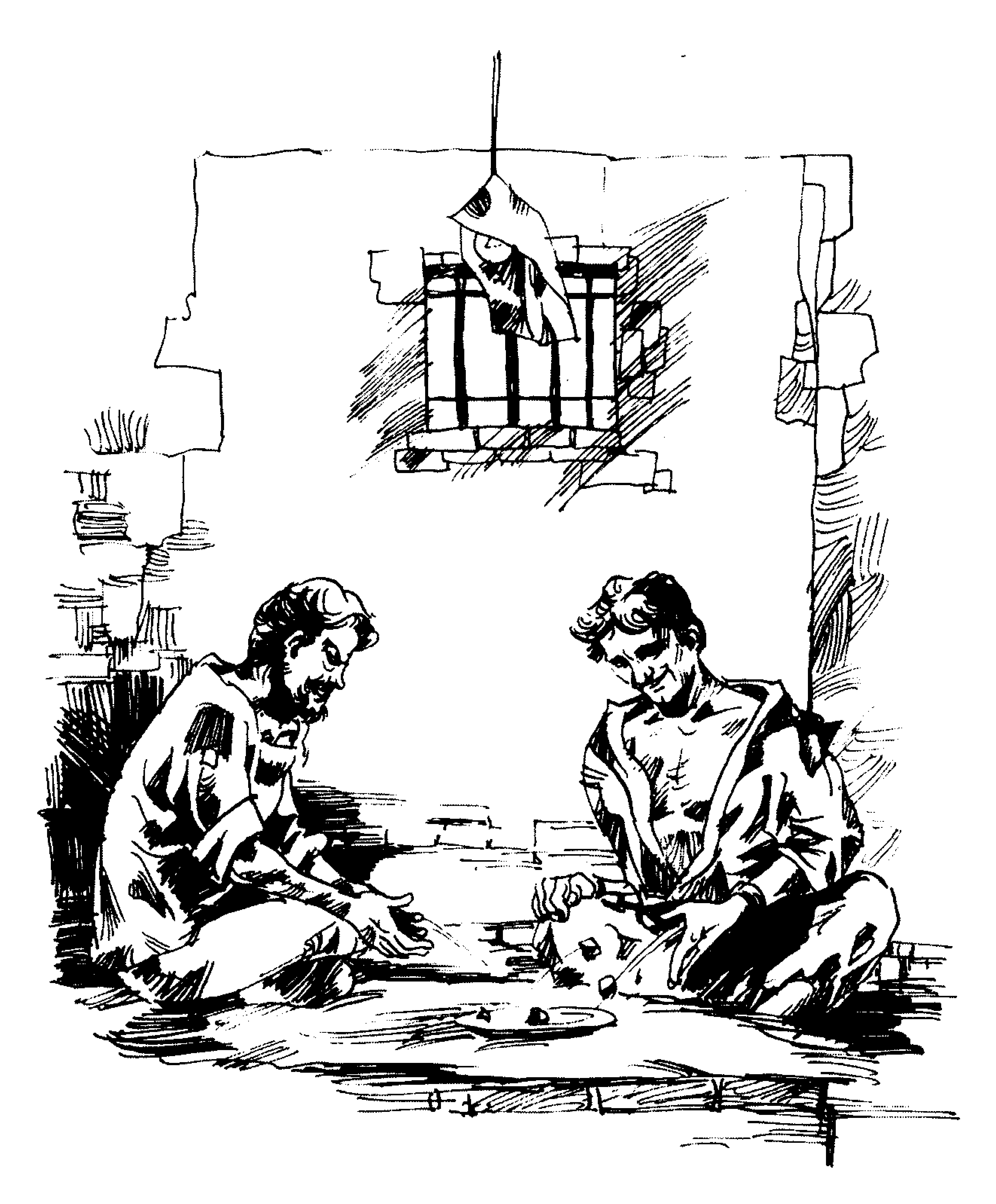
我一般都比较晚才回到牢房。佩舍克老爹总在担心我还会不会回来。他拥抱我，我简单地告诉他一些新消息：昨天又有谁在科贝里斯牺牲了，——然后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些令人作呕的菜干，吃完以后，唱几首快乐的歌，或者痛痛快快地玩一种愚蠢的掷骰子游戏，这种游戏最能使我们忘记一切。晚上，我们牢房的门随时都可能被打开，死神会降临，会传唤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

“你或者你，下楼去！把东西都带上！快！”

但没有来叫我们。我们总算活过了这个恐怖时期。现在每当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情景，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人的构造是多么的奇妙啊，它能忍受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当然，这些日子不可能不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它像卷紧了的电影拷贝似的存放在我们的脑海里。总会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它会在现实生活里以疯狂的速度展现开来。然而我们也许在银幕上见到的是一座巨大的坟墓，那是葱绿的花园，人们在那里播下了珍贵的种子。

这是些十分珍贵的种子，它们将发芽和生长！



我一般都比较晚才回到牢房。……唱几首快乐的歌，或者痛痛快快地玩一种愚蠢的掷骰子游戏，这种游戏最能使我们忘记一切。

第七章　雕像与木偶(二)

庞克拉茨

监狱里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紧锁在牢房里,完全与世隔绝的,但只要有政治犯的地方,它又同外面的世界最紧密地联系着。另一种生活是在牢房前长长的走廊上,在那忧郁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它与外面世界完全隔绝,紧裹在制服里,它比锁在牢房里的生活更为孤立。这是个木偶多于雕像的世界。我想来讲一讲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面貌,有它自己的历史。不然我是不会把它认识得这样深刻的。那就只能看到面向我们的那个侧面,只能看到它那似乎完整而牢固的表面,这表面用铁一般的重担压在牢房的居住者的身上。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还是这个样子。而今这个表面已经布满了裂缝,透过这些裂缝可以看到许多面孔:可怜的、和蔼的、忧虑的、可笑的、各式各样的,不过总还属于人类的面孔。反动统治的危机,也在这个灰色世界的每一个人身上加上了压力,把他们内部所属的人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有的时候人性很少,有的时候在你熟悉了它之后,便看得比较真切。他们具有人性的多少使他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典型。当然你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几个完美的人。他们为了帮助另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不顾自己也会陷入不幸之中。

监狱本来不是一个使人快乐的机构,但是牢房外面的这个世界却比牢房里要凄凉得多了。在牢房里人们生活在友爱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友爱啊!这种友爱是在战场上产生的,战场上人们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今天我救了你的命,而明天我又可能被你挽救。

可是这样一种友爱在德国看守之间却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他们被包围在相互告密的气氛之中，这一个人监视和告发那一个人，每个人都提防着那些冠冕堂皇地互称为“朋友”的人。他们中间最好的人，如果不能也不愿意孤寂无友的话，就只好到牢房里来找朋友了。

我们长期以来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用绰号来区分他们，这些绰号有的是我们起的，有的是我们以前的人起的，随后就在牢房里沿用下来了。有些人绰号之多竟和牢房的数目一样；这都是些庸碌之辈，非驴非马，他们在这里给人添一点饭，转过来又在那里打人的耳光，也许他们只和犯人交往几秒钟，但却长久地在牢房里留下印象，造成了片面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一个片面的绰号。但有些人在所有的牢房里有着一致的绰号，这些人的性格比较突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好，就是坏。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典型吧！看一看这些木偶！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地聚合在一起的。他们是纳粹主义的政治军队的一部分，是精选出来的。[①] 是它的社会栋梁……

“善心人”[②]

一个高个儿的胖子，有副男高音的嗓门，他是“党卫队预备队员”劳斯，曾经在莱茵河畔科伦地方做过校工。他像所有德国学校的校工一样，也在紧急救护训练班受过训，所以他有的时候代替监狱里的助理医生。他是我到这里以后最早接触到的一个人。他把我拖进牢房，安置在草垫子上，检查了伤势，给我缠上绷带。也许真是他救了我的命。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人？或是那个救护训练班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我不知道。但是当他打掉被捕的犹太人的牙齿，强迫他们吞下满满一勺盐或沙子当作万应灵药的时

① 原版本此处尚有一句：他们是反动制度的支柱。新版本则没有。

② 原文为“撒玛利亚人”，出自《新约·路加福音》，是用油和酒为人治伤的善心人。

候，却显出了他那地地道道的纳粹本色。

“牛皮大王”

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马车夫法宾扬，是一个好心肠的爱说话的人。他到牢房里来，总是满脸笑容地给犯人送饭，从不侮辱人。但你却想不到，他会整小时整小时地躲在门后边偷听牢房里的谈话，然后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报告上司。

科克拉尔

他也是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工人。那里有许多从苏台德区来的德国工人。“问题不在于个别工人怎样想或怎样做，”马克思有一次这样写道，“而在于整个工人阶级，为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必须做些什么。”那里的一些工人真是一点都不明白自己的阶级使命。他们是从本阶级中分离出来的、站到了它的对立面的人，他们的思想悬在空中。确切地说，他们自己大概也将要悬在空中了。

科克拉尔为了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而参加了纳粹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从那时起，他就失去了笑容。他把赌注押在纳粹主义的胜利上。事实证明，他把赌注押到了一匹死马身上。从那个时候起，他甚至失去了自制力。他穿着一双软拖鞋整夜在监狱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他无意中把自己那忧郁的思绪的痕迹留在尘封的灯罩上：

“一切都完了。”他写下了富有诗意的句子，还想自杀。

白天，他驱赶犯人甚至看守，还尖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号叫，使自己不觉得那么害怕。

勒斯列尔

瘦高个儿，说话带着粗重的男低音，他是这里少有的几个很会

由衷大笑的人之一。他做过亚布洛涅茨城的纺织工人。他常到牢房里来同我们辩论。一辩论就是几个钟头。

“要问我是怎么干起这行来的吗？十年来我总没有正常的工作。每个星期只能挣到二十个克郎[①] 养活全家，——你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而后他们来了，他们对我说：‘我们给你工作，跟我们来吧。’我就来了，——他们给了我这个工作。我和别人都有了工作。有吃的，有住的，可以活下去了。社会主义吗？唉，算了吧，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本来的想象完全不是这样的。然而现在毕竟比过去好一些。

“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战争？我可不希望有战争。我不希望别人死去。我只希望我能活下去。

“你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在帮他们的忙吗？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这里伤害过谁吗？我走了，换别的人来，也许还会更糟些。我走了，又会对谁有好处呢？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工厂去……

“你想这个战争谁会打赢？不是我们？那就是你们？我们将会怎么样呢？

“完蛋？那太可悲了。我想不会这样的。”

于是他跨着那漫不经心的大步子，离开了牢房。

半小时后，他又回来问我们苏联的一切到底怎么样。

“它”

一天早晨，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楼下最主要的一个走廊里，等着押送去佩切克宫受审。每天我们都这样前额紧贴着墙壁站着，不让我们看见背后发生的事情。可是这天早晨在我们背后响起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声音：

---

① 捷克货币名称。

“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你们将来会认得我的！”

我笑起来了。在这里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引用《好兵帅克》[1]中那个可怜的蠢货杜布中尉的话，倒真是恰到好处。可是一向没有人有勇气在这里大声讲出这句俏皮话。我旁边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轻轻碰了碰我，提醒我不要笑，说我也许是弄错了，这并不是什么俏皮话。原来的确不是。

在我背后说这话的是一个穿着党卫队制服的小东西，显然“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帅克不帅克的。但“它”能说出像杜布中尉那样的话来，是因为“它”同他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它”姓维坦，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里当过超期服役下士。“它”倒说对了：后来我们果真彻底认得了“它”，每当我们谈起他时总用中性的“它”称呼。说老实话，我们绞尽了脑汁才给这个集渺小、愚蠢、顽固、卑鄙于一身的小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合适的绰号。他是庞克拉茨监狱的主要骨干之一。

“只有小猪尾巴一般高”，这句民间谚语是形容那些渺小而又妄自尊大的钻营家们的，它正好击中了这种人的要害。一个人为了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他的灵魂又该是何其渺小啊！而维坦就因为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万分，并且因此对所有那些在体格上和心灵上都比他高大的人进行报复。

“它”不打人，“它”没有这个胆量。但“它”告密。多少犯人由于“它”的告密而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啊！为什么把你从庞克拉茨监狱送到集中营去，这同材料上怎么介绍你，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它”十分可笑。常常独自一个人在走廊上神气活现地摇来晃去，仿佛觉得自己是个显贵的人物。可是一当“它”碰见人，便感到

---

① 《好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1921—1923 年，一译《好兵帅克》；又译《好兵帅克历险记》)是捷克著名讽刺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1883—1923)的代表作。哈谢克笔下的杜布中尉是个典型的冷漠无情、尖酸刻薄、却又可怜的蠢货。

有必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使自己的个子长高一些。假如"它"要问你什么,"它"就坐到栏杆上,因为这样就比你高出一头,"它"可以在这个不怎么舒服的地方坐上个把小时。当"它"在旁边监视你刮脸时,"它"就跳到台阶上去,或者爬到一条长凳上去,走来走去,并且老是重复那几句颇为玄妙的话:

"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

在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时候,"它"总要走在草坪上,这样就比周围要高出十厘米。"它"神气活现,像个国王似的走进牢房,立刻爬到椅子上,这样便可以居高临下地点名。

"它"十分可笑,但正像每个傻瓜一样,一旦居于操生杀予夺大权的地位时,"它"也是十分危险的。在"它"那有限的躯壳里还藏着一种本领:把蚊子说成骆驼。"它"除了警犬的职务外,别的一无所知,因此"它"把每一件违反监狱规则的无关紧要的事,都看成属于"它"的重要使命范围内的、应该加以干涉的、了不起的大事。"它"捏造了一大堆违反狱规的过失和罪名,以显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反正在这种地方还会有谁去查证"它"的告密有多少真实性呢?

斯麦唐兹

这个木偶身体粗壮面孔呆板,两眼无神,活像格罗斯[①] 画的纳粹党徒的漫画。他曾在立陶宛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当过挤奶工人,然而说也奇怪,这种善良牲口的高贵品质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影响。在上司面前,他是"德意志道德"的化身:坚决、果断、严厉、不受贿赂(他是少有的几个不向杂役勒索食物的人之一),但是……

有一个德国学者,不记得是哪一个了,他曾经按照动物能懂的

① 格罗斯(1893—1959),德国画家,以版画和漫画知名。

"词"的数目来测定动物的智力。我记得他好像证明家猫的智力最差,它只能理解一百二十八个词。呵,它比起斯麦唐兹来却算得上是一个天才。因为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里从斯麦唐兹嘴里只听到过这四个字:

"你要当心!"①

每周有两三次轮到他值班,每周也就有两三次他费尽苦心,结果却总是弄不好。有一回我见到监狱长责备他没有把窗户打开,于是这个小肉山似的家伙立即惶惑不安起来,两条短腿来回地交替着,脑袋笨拙地垂在胸前,越垂越低,嘴角痉挛地扭动着,紧张而吃力地复诵着刚才耳朵里听到的话……突然间这堆肉像汽笛似的大叫起来,整个走廊里起了一阵慌乱,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所有的窗子依旧关着,只见离斯麦唐兹最近的两名犯人的鼻子在流血。他找到出气的地方了。

他总是用这种办法来出气。打,碰到谁就打谁;打,如果需要的话,就打死——这点他倒是懂得的。他也只懂得这个。有一次他闯到集体牢房里去打一个犯人——一个有病的犯人,直打得这个人倒在地上抽搐起来。其余的犯人也被命令按照这个人抽搐的节奏一起一坐,直至这个病人精疲力尽不能再动弹为止。而斯麦唐兹两手叉腰,带着傻笑欣赏着,很满意自己如此成功地处理了这一复杂的形势。

这个原始动物,在他所学会的一切当中,只记住了一点:打人。

但就是在这个动物身上,也有某种东西在瓦解着。这大约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他和K两个人坐在监狱的接待室里,K在给他讲当前的形势。讲了很久很久,直到斯麦唐兹稍微明白了一些为止。他站起来,打开了接待室的门,小心翼翼地环顾了一下走廊:到处是深夜的寂静,监狱沉睡着。他关上门,小心地上了锁,然后慢慢地蜷缩在椅子上说:

---

① 原文系德文。

“那你是这样想的吗？……”

他用手撑着头。一个可怕的重负紧压住了这个大个子的渺小灵魂。他就这样蜷缩着坐了很久。然后抬起了头，绝望地说：

“你说得对。我们再也不会打赢了……”

庞克拉茨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斯麦唐兹耀武扬威的号叫了。而新来的犯人也就不会知道他那打人的手是多么狠毒了。

监狱长

个子比较小，不论穿便服或穿冲锋队小头目的制服都很讲究，阔绰，自满，喜欢狗、打猎和女人，——这是同我们没有关系的一面。

另一面在庞克拉茨监狱是人所共知的：粗暴，野蛮，不学无术，为了保存自己可以不惜牺牲任何人的一个典型的纳粹狂妄分子。他叫索帕，——如果名字一般说来还有某种作用的话，出生在波兰。据说他是科班出身的铁匠，然而这样一种可敬的手艺却没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很久以前他就为希特勒匪徒们效劳，由于竞选游说有功而捞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他用尽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所有的人，不管是犯人还是监狱职员，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都表现出绝对不带感情，而且残酷、残忍、无情。庞克拉茨监狱里的纳粹同僚之间没有友情可言，但还没有人像索帕这样连点友情的影子都没有。他在这里好像还瞧得上眼的、常常交谈的只有监狱的医务官魏斯涅尔。但看来魏斯涅尔对他并不怎么样。

他只知道他自己。他为自己捞到了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为了自己，他至死都要效忠纳粹政权。大概不打算找活路的只有他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是逃不脱的。纳粹的垮台就是他的垮台，就是他阔绰生活的完结，就是他漂亮住宅和讲究衣服的完结（顺便说一下，他甚至不嫌弃穿被处死的捷克人的衣服）。

是的，这一切就要完结了。

监狱医务官

医务官魏斯涅尔，在庞克拉茨监狱这个环境里是一个特殊的木偶。有时你会觉得他不属于庞克拉茨，有时你又会觉得庞克拉茨没有他是不可想象的。他不在医务室就在走廊上，拖着他那缓慢的步子，摇摇晃晃地来回踱着，老是自言自语，不断地东张西望，总在那儿观察着什么。他像是一个仅仅到这里来逗留片刻的、想从这儿尽量多摄取一些印象的客人。但是他也会像最机灵的看守一样，迅速而无声地将钥匙插在锁眼里，一下子把牢门打开。他有一种索然无味的幽默，他谈起一些隐秘的事情，但谈得不清楚不透彻，甚至使你抓不住他说话的意思。他接近人，但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虽然他看到了许多事情，但是他却不声张，也不向上汇报。当他走进一间烟雾弥漫的牢房时，他总是用鼻子深深地吸一下说：

"嗯，"他把两片嘴唇啧了一下说，"在牢房里抽烟，"他第二次又用嘴唇啧了一下说，"是严格禁止的。"

但是他不去告发。他总是深锁双眉，满面愁容，好像有一种莫大的隐痛在折磨他。他为纳粹制度服务，每天也为这个制度的牺牲者治疗，他显然不想同这个制度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不相信这个制度，怀疑它的永久性，以前他也没有相信过。因此他没有把家眷从弗拉斯罗弗[①] 迁到布拉格来，虽然帝国官员中很少有人肯放弃把被占领国吃光的机会。但他也不会同反对这个制度的人有丝毫联系，他同他们也是无缘的。

他对我的治疗态度是积极认真的。他对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并且还坚持不允许提审受刑过重的犯人。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有时特别需要他的帮忙，他却不给任何帮助，也许是因为害怕的缘故。

---

① 弗拉斯罗弗在波兰西南部，靠近捷克边境。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典型。他孤独地生活在两种恐惧中：即对现在主宰着他的纳粹制度的恐惧和对今后即将到来的新的恐惧之间。他在寻求出路，但是没有找到。他不是一只大老鼠，而只是一只落入陷阱的小耗子。

一只毫无希望逃脱的小耗子。

“机灵鬼”

这样的人已不完全是个木偶。但他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雕像。他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过渡。他还缺少作一个雕像的明确的意识。

像这样的人在这里实际上有两个。他们都是普通的、有感情的人，开始时他们是被动的，完全被他们所陷入的环境吓坏了，后来竭力想从这一深渊里挣脱出来。他们是不由自主的，因此也想寻找能够把他们引到正道上来的支援和领导，但这与其说是出于认识，毋宁说是出于本能；他们帮助你，是想从你那儿得到帮助。当然是应该给他们帮助的，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

在庞克拉茨监狱所有的德国职员中，只有他们两个到过前线。

哈瑙尔是兹诺伊莫城[1] 的裁缝，他故意把脚冻坏，不久前才从东线回来。“战争不是人干的事，”他有些像帅克似的谈起哲理来，“我在那边无事可做。”

赫费尔是拔佳鞋厂[2] 的一位快乐的鞋匠，到法国去打过仗。尽管人家答应提升他，但是他仍旧从军队里开了小差。“唉，无聊！”[3] 他自言自语，像每天对待许多无关紧要的小事那样挥了挥手。

这两个人的命运和情绪有些相似，不过赫费尔更大胆，更突出，更全面。“机灵鬼”，——几乎是所有牢房一致给他起的绰号。

---

① 兹诺伊莫是捷克南部的一个小城。

② 拔佳鞋厂是 1894 年捷克资本家托马斯·拔佳在兹利纳城（哥特瓦尔德市）建立的有两千名职工的制鞋厂。1945 年国有化后，改名为光明鞋厂。

③ 原文系德文。

他值班的时候，是牢房安静的日子。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他大声叫骂起来，他就跟你眨眨眼，让你知道，这跟你无关，不过是骂给楼下的上司听，表明他在严格执行任务罢了。然而他的努力白费了，上司并不信任他，没有一个星期他不挨罚的。

"唉，无聊！"他挥了挥手，照旧干自己的。与其说他是个看守，还不如说他仍是个轻松愉快的青年鞋匠。你能够碰见他同牢房里的年轻犯人兴高采烈地、起劲地玩牌。有时他又把犯人从牢房赶到走廊上，独自一个人在牢房里进行"搜查"。这"搜查"持续很久。假如你感到好奇，向牢房里瞧一眼的话，你准会看见他坐在桌子旁，头支在胳膊上睡着了。他睡得很香；在这里睡觉是瞒过长官的好法子，因为有犯人在走廊里替他站岗放哨，一有危险就会马上通知他的。如果他在休息的时候为了心爱的姑娘没有睡够觉的话，那在值班的时候就非睡不可了。

纳粹会失败还是会胜利呢？"唉，无聊！[①] 这个马戏团到底还能支撑多久呢？"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个马戏团里的一个角色，虽然他为此而受人注意。不仅如此，他甚至不想属于它。他的确也不是那里面的人。你需要递一个秘密字条给别的牢房吗？"机灵鬼"会替你传递。你想送个消息到外面去吗？"机灵鬼"会替你转送。你想同某人交换意见，想通过个别谈话使某人增强斗争的信心或营救别的一些人吗？"机灵鬼"会把你领到这个人的牢房里，并替你放哨。一旦事情办妥了，他就会像顽皮的孩子做成了一场恶作剧那样快乐高兴。你常常得提醒他小心。他很少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也不懂得他所成全的这些好事的全部意义。这帮助了他做更多的事情，但同时也妨碍了他的进步。

他还不是一个雕像。但他却在向雕像过渡。

---

① 原文系德文。

“科林”

那是戒严时期的一个夜晚。那个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看守把我关进牢房的时候,为了装样子而搜了搜我的衣袋。

“您的事情怎么样了?”他悄声问道。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告诉我说,明天就要把我拉去毙了。”

“这把您给吓住了吧!”

“我早就料到这一手了。”

他机械地搜查了一会儿我的外衣的褶缝。

“他们可能这样做。也许不是明天,也许再过些时候,也许根本不会。但是在这个时候……最好是作个准备……”

随后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您想给什么人送个信吧?或者您想写点什么吧?不是为了现在,您懂吗?而是为了将来,譬如写您是怎样落到这里来的,是不是有人出卖了您,某某人的态度怎么样……使您知道的一切不至于随您一起消失……”

我是不是想写点东西?他还真猜中了我这个最强烈的愿望。

不一会儿他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我小心地将这些东西藏起来,以免在搜查的时候被发现。

可是我一直没敢动用它。

这太好了,简直叫我不敢相信。这真太好了:在这里,在这座黑暗的监牢里,在被捕几个星期之后,在那样一群整天对你叫喊和打骂的穿着制服的人中间,居然能找到一个人,一个朋友,他愿向你伸出手来,使你不至于无踪无影地从人间消失,使你能够留个音信给未来的人们,使你至少能够有片刻时间同那些将要活过这个时代的、活到解放的人们谈话。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走廊里传唤着即将被处决的人的名字,喝人血喝得醉醺醺的那些法西斯野兽正在疯狂地吼叫,被恐怖勒紧了喉咙的人们却叫不出声来。尤其在现在这

种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不，这简直不能相信，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一定是个圈套。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主动地向你伸出手来，得具有怎么样的毅力，怎么样的胆量啊！

大约过了一个月。戒严解除了，号叫声也沉静下去了，残酷的时刻变成了回忆。又是一个晚上，又是我受审归来，又是那个看守站在我的牢房前面。

“您好像度过了这一关。”他用一种探询的目光打量着我。“没有出问题吧？”①

我懂得这句问话的意思，它深深地刺痛了我。但这句话比别的话更使我相信他的真诚。只能是这种有内在的权利的人才敢于这样提出问题。从这个时候起，我才相信了他。他是我们的人。

乍看上去，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他常常独自在走廊里踱步，镇静、稳重、谨慎而机警。谁也没有听见过他骂人。谁也没有看见过他打人。

“请您在斯麦唐兹巡视时打我一个耳光吧，”隔壁牢房里的同志请求他，“让他至少有一次看见您在执行任务。”

他摇了摇头：

“没有必要。”

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用别种语言说话，他只用捷克语。他的一切都向你表明，他同别人不一样。但你很难说清楚这是为什么。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哪儿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哪儿发生了惊慌，他就把镇静带到哪里；哪儿有人垂头丧气，他就到哪儿去鼓舞人心；哪儿由于断了关系而威胁到狱外一些同志的安全，他便去把关系接上。他不沉溺在无谓的琐事中，而总是有条不紊地、大刀阔斧地工作着。

不单是现在，一开始他就是这样。他到纳粹这里来服务，目的是明确的。

---

① 问伏契克是否叛变。

这个来自摩拉维亚的捷克看守名叫**阿多尔夫·科林斯基**，他是一个出身在捷克老式家庭的捷克人，却自称是德国人，为了到赫拉德茨·克拉洛维的捷克监狱，然后转到庞克拉茨监狱来当看守。这大概引起了他的一些熟人对他的愤恨和不满。可是四年后，有一次在他报告工作时，德国监狱长在他眼前挥动拳头——然而已经太晚了——威吓他说：

"我要打掉你身上那种捷克精神！"

这位监狱长错了。那种精神是打不掉的。除非消灭掉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斗争和有利于斗争，他自觉自愿地担当起艰巨的任务。不断的危险只能使他经受锻炼。

我们的人

如果说，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早晨给我们送来的早饭，不是通常那种谁也不知道掺了些什么的黑水，而是一杯可可的话，我们对这一奇迹并不觉得奇怪。因为那天早晨，在我们牢房附近闪过了一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人。

仅仅是一闪而过。塞在高筒皮靴里的黑色制服裤向前跨了一步，深蓝色衣袖里的手抬起来，用力把门关上，人影也就不见了。这是一瞬间的事，过了一刻钟，我们已经不打算相信这回事了。

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有捷克警察！从这件事里我们可以得出怎样意味深长的结论啊！

两个小时后我们得出了结论。牢房的门重新被推开，捷克警察的帽子伸了进来，看见我们惊奇的表情，他愉快地咧开了嘴，高兴地通知我们：

"稍息！"[1]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弄错了。在走廊上看守们的党卫队的

---

① 原文系德文。

灰绿色制服中间，出现了几个使我们感到醒目的黑色斑点：捷克警察。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将表现得怎么样呢？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在这里了，他们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如果法西斯反动统治竟不得不让受它压迫的那个民族里的一些人进入最敏感的要害部门，进入作为它的唯一支柱的、奴役和压迫人的机构，可见它是多么缺乏人手啊！为了弄到几个人，它不惜削弱自己最后希望的堡垒，那么这个统治还能支持多久呢？

当然，这些人是经过一番挑选的，说不定比那些被习惯势力腐蚀和对胜利缺乏信心的德国看守更坏，但是捷克人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却是敌人就要完蛋的明证。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但这件事的实际意义却远比我们最初想到的要大得多。因为这个纳粹统治制度已经挑选不出自己的人，而且已经没有人可挑选了。

二月十一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捷克警察制服。

第二天我们就和那些人认识了。

第一个人来了，他朝牢房里瞧了瞧，还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在门边犹豫了一下，然后——仿佛一只憋足了劲用四只蹄子猛一下跳起来的小山羊——他忽然鼓足勇气说：

“喂，过得怎么样，先生们？”

我们回答了他一个微笑。他也笑了笑，然后又露出窘迫的样子说：

“别生我们的气。请相信我说的话：我们情愿去逛马路，也比呆在这儿监视你们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也许……也许这样并不坏……”

当我们把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他们的看法向他谈了之后，他高

兴起来。这样,我们一见面就成了朋友。他叫维特克,是一个朴实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那天早上在我们牢房门口一闪而过的就是他。

第二个叫图马,一个地地道道的捷克老狱卒。他有点粗鲁,喜欢大喊大叫,但是本质好,就像我们从前在共和国监狱里常称作"大叔"的那种人。他没有感到自己处境特殊,相反,他很快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干起来了。他说话总带点辛辣的戏谑意味,他维持秩序和破坏秩序一般多:悄悄往这个牢房里塞块面包,往那个牢房里递支香烟,然后又在别的牢房里扯扯闲话(只是避而不谈政治)。他干这一切都极其自然,他对看守的职务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不隐瞒这一点。他为这些活动受到了第一次申斥,于是谨慎了一些,但并没有多大改变,仍旧不失为一个"狱卒大叔"。你别要求他做什么重大的事情。但是在他跟前能舒畅地呼吸。

第三个人常常带着忧郁而冷漠的神情,沉默地沿着牢房踱步。我们小心地试图同他拉上关系,但他却毫无反应。

"别对这家伙抱多大希望,"老爹观察了他一个星期之后说,"这是他们中间最不怎么样的一个。"

"也许是最机灵的一个。"我故意提出相反的看法,因为在一些小事情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见而互相争辩,会调剂一下牢房的生活。

两个星期以后,有一次我仿佛觉得这个沉默的人在向我眨眼睛。我也向他做了一下这个在狱中具有千百种含义的动作。但是他再也没有什么反应。也许是我弄错了。

一个月后,一切都弄明白了。一切是那样意外,就像蛹忽然变成了蛾子一般。这个阴郁的"茧壳"裂开了,露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不是蛾子,而是一个人。

"你在立纪念碑吧。"老爹见到我在写这些人物时常常这样说。

是的,我愿意立这些纪念碑,使狱内外那些曾忠诚地、勇敢地战

斗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至于被遗忘。我愿意立这样的纪念碑，使那些还活着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以极大的忠诚和勇气帮助我们的人不至于被忘掉。但愿像科林斯基和这个捷克警察这样的人物，能够从庞克拉茨监狱的阴暗的走廊走向光明的生活。不是为了颂扬他们，而是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因为做人的义务并不随着这次战争而告终，在人们还没有完全变成人以前，要想做一个人就得需要有一颗英雄的心。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篇简短的传记，是捷克警察雅罗斯拉夫·霍拉的传记。但是你能够从这里找到一个人的全部历史。

他出生在拉德尼茨科。那是我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是秀丽、凄凉而贫瘠的边区。父亲是个玻璃厂的工人。生活艰难。有工作的时候，是疲劳；失业的时候，是贫困；而失业在这里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生活如果不是使你屈膝，就会使你抬起头来，去追求那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信仰它，为实现它而奋斗。父亲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少年的亚尔达[①] 参加了五一节示威游行的自行车队，在他车子的轮子上系了一根红布条。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这根红布条。在当学徒、车工以及在什科达工厂[②] 工作的时候，他都不知不觉地把红布条保存在自己的心里。

后来来了经济危机，失业，战争，找工作，于是他当上了警察。我不知道在这个期间他心上的那根红布条怎么样了。也许被卷起来搁在了一边，或许忘掉了一半，但是没有被丢掉。有一天，他被派到庞克拉茨监狱来服务。他不像科林斯基那样带着预定的任务自愿来到这里，但是当他头一次到牢房里看了一眼时，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红布条展开了。

他侦察自己的战场，估计自己的力量。他的脸紧绷着，深沉地

① 雅罗斯拉夫的爱称。

② 当时捷克的著名军火工厂。近年发展为军工、重型机械及汽车制造业的联合企业。

思索着从什么地方着手,怎样开始工作。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他仅仅是人民的一个普通的儿子。但是他吸取了父亲的经验。他本质好,意志坚强,这个意志在他心中日益增强他的坚定性。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一个阴郁的蛹蜕变成了人。

这是一个内心优美而纯洁的人。他敏锐、谨慎而又勇敢,敢于去做这里所需要他做的一切。不论事情大小,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工作起来不露锋芒,稳稳当当,深思熟虑,但是毫不胆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心里有一道绝对的命令:一切都应当这样,——那还用得着说吗!

说实在的,一切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现在几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都要归功于他。这些人在狱外活着,工作着,就因为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个人尽到了自己做人的义务。他不认识他所拯救的人,他们也不认识他。就像他们不认识科林斯基一样。我希望人们至少能认识他们俩。这两个人很快就在这里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加倍地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把他们当作榜样记住吧。当作人的榜样记住吧。他们的头脑长得正。当然首先是他们的心长得正。

斯科舍帕大叔

看守科林斯基穿灰绿色党卫队制服,捷克警察霍拉穿黑色制服,监狱杂役斯科舍帕大叔穿颜色鲜明但并不怎么悦目的制服,当你偶然看到他们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兄弟友爱的生动画面。但很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这样做是合适的。

按照监狱的规定,走廊上的杂事:扫地、打饭等,只能由"特别可靠、严守纪律并和其余的人绝无牵连的犯人"来担当。这仅仅是字面上的规定。仅仅是死条文。要知道这样的杂役是没有的,从来就没有。相反,这里的杂役却是从牢房的"监狱集体"伸出去的"触须",是为了去接近自由的世界,使集体能生存,相互通气,彼此了

解。有多少杂役由于执行任务或传递一张字条被抓住而送了性命啊！但监狱集体的纪律无情地要求那些来接替牺牲者的人们，继续做这种危险的工作。你去干吧，不管你是勇敢承担或是胆小怕事，反正你是回避不了的。胆怯只能坏事，就像每一件地下工作一样，胆怯会使一切都毁灭。

而在这里做地下工作是加倍的危险：你直接被捏在那些一心想消灭地下工作的人们手里，只能在看守们的眼皮底下，在他们所规定的范围内，在他们所指定的时间里，在他们所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你在外面学会的一套本领在这里不够用。而要求你的却不见得少。

狱外有一批地下工作的能手。在杂役中也有做这种工作的能手。斯科舍帕大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谦虚，朴实，看上去挺沉静，实际上却像鱼一样的灵活。看守们都夸奖他："瞧，这个人多勤快，多可靠，只想着自己的职责，什么犯禁的事都不沾边。杂役们都应该学习他的榜样！"

是的，杂役们都应该学习他的榜样！他确是犯人们心目中的那种杂役的典范。他是我们监狱集体里最坚定、最机敏的"触须"。

他了解所有牢房的居住者，每来一个新犯人，他都能够立刻弄清楚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为什么被捕，谁是他的同案人，他的态度怎么样，他们的态度又怎么样。他研究许多"案件"，并极力弄清楚这些案件。这样做很重要，只有这样他才能去劝告别人，才能正确地执行任务。

他也了解敌人。他谨慎地考察每一个看守，研究他的习惯，研究他坚强的一面和软弱的一面，要特别提防他什么，怎样利用他，怎样麻痹他，怎样愚弄他。我在这里所描写的许多人的特性，都是斯科舍帕大叔告诉我的。他熟悉所有的看守，还能详尽地描述他们每一个人。假如他想在走廊上自由活动并确保工作顺利进行，这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他明白自己的责任。他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知道，

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放弃党员的责任而袖手旁观或“停止活动”。我甚至于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这里，在极端危险的、极其残酷地受迫害的环境里，他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岗位。他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他灵活机智。每天每小时都会发生新的情况，都要求采取新的方法来解决。他能够敏捷地找到新的方法。他所能支配的只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他轻轻地敲牢房的门，倾听预先准备好的委托，趁新来换班的人还没有踏上二楼楼梯之前，他已经简明地将这个口信传递到走廊那头的牢房去了。他谨慎而机智。几百张字条经过他的手而没有一次被抓住，——甚至没引起任何怀疑。

他知道哪儿有痛苦，哪儿需要鼓舞，哪儿需要得到外面准确的情报，哪儿需要他那真正慈父般的目光，它能给滋长失望情绪的人以力量；他知道哪儿需要多添一个小面包或一勺汤，就能帮助新来的犯人挨过那不习惯“狱中饥饿”的难关。这一切他都知道，都是凭他那细致的感觉和实际的体验得来的，而他也就根据这一切去行动。

一位顽强无畏的战士，一个纯粹的人，这就是斯科舍帕大叔。

我希望，将来你们读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从他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杂役”的优秀典范，他善于把压迫者要他干的事情，变成为被压迫者服务。斯科舍帕大叔只是这类人中间的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外貌各不相同而执行着同样重大任务的人们。在庞克拉茨监狱和佩切克宫都有这种人。我愿意一一描绘出他们的形象，然而遗憾得很，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甚至连“快快地歌唱出生活中缓慢地形成的事儿”也来不及了。

但这里至少总算有了一些名字，一些榜样，虽然还不是所有不该被忘却的人的名字：

“雷列克”——约瑟夫·特林格，一个坚毅刚强、肯自我牺牲、性情有些急躁的人，我们在佩切克宫的一段斗争史是与他分不开的。同样，也跟他的一位亲密战友、贝尔维德家那善良的佩彼克有关。

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一个英俊而高尚的青年，他每天都帮助被监禁的同志们，最后自己也在奥斯维辛[1] 牺牲了。

阿诺什塔·洛伦泽因为拒绝出卖同志，他的妻子被处死了。一年后，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同志们，拯救“四〇〇号”的杂役们和整个监狱集体，也被处死了。

聪明的、永远充满机智的**雷泽克家**的瓦舍克；在戒严时期被处决的沉静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安卡·维科娃；精力充沛的……[2]；永远快乐、敏捷而不断创新的“图书馆员”斯普林盖尔；腼腆的青年比列克……

仅仅是一些榜样，一些榜样。一些大大小小的雕像。但他们永远是雕像，而绝不是木偶。

---

① 波兰地名，1939年德国法西斯在这里建立了一座被称为“杀人工厂”的集中营。

② 这个名字在伏契克的手稿上是空着的。

第八章　一小段历史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

在我的牢房门前挂着一根吊裤带。那是我的吊裤带。这是押解的标记。今天夜里他们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国法庭去听候判决了……事情就是这样。在我生命的边缘上，时光正在贪婪地啃嚼着最后的几口。在庞克拉茨监狱度过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思议。还剩下多少天呢？我将在什么地方度过这些日子呢？又将怎样度过呢？

在这些日子里，我将很难再有写作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最后的叙述了。对于这一小段历史，我显然是最后一个活的见证。

一九四一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全部中央委员，以及准备万一出事时接替他们的领导人，全都被捕了。党为什么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打击，现在还没有得到准确的证据。关于这件事，有一天盖世太保的头头们在受审时也许会供出来的。我也像佩切克宫的杂役一样，想仔细弄明白这事的真相，但是白费工夫。当然这事少不了有奸细的破坏，但多半是由于不谨慎。两年来地下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些同志的警惕性多少有些放松。地下组织扩大了，经常有新同志参加到工作中来，有些人本来应该暂时作为候补人员在一边等待一下的。机构扩大了，庞大得难以控制。敌人对党中央的袭击显然蓄谋已久，在他们快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就向我们下手了。

开始我不知道逮捕的范围有多大。我还等着我平日的联络员，但他没有来。一个月后，我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不允许这样傻等下去。我只好独自去寻找关系，别的同志也这样做。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维斯科奇尔，他是捷克中部地区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出版《红色权利报》，党没有中央机关报是不行的。我写了一篇社论，但是我们俩又决定把全部材料（我还没有看过这些材料）印成五一节的传单，而不出版《红色权利报》，因为另外一些同志已经在别处出版了《红色权利报》，尽管印得相当简陋。

我们进行了几个月游击式的工作。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不能置它于死地。几百个新同志决心接替牺牲了的领导人的岗位，担负起他们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使这个组织的基础不致被瓦解或陷于瘫痪。但仍然没有中央的领导，游击式的工作中蕴藏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德寇准备进攻苏联时——我们的步调可能会不一致。

在我所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手笔。而别的一些同志也从我们出版的、可惜并不十分成功的五一节传单上，看出有可信赖的人存在。于是我们开始相互寻找。

这好像在密林里相互寻找一样。我们一听到声音就跟踪追去，但却从另一边传来了呼唤声。沉重的损失使得全党更加谨慎、更加警惕，如果党中央机关的两个同志要碰头，就必须通过他们双方以及其他负责联系的人所设下的试探或暗号的重重障碍。这一回就更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那“另一边”的人是谁，而他也同我一样，不知道对方是谁。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联系人。那就是优秀的青年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个联络员。这事也有偶然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我病倒了，打发丽达去请他来给我看病。他立即来到巴克斯家里，我们就在那儿把事情谈妥了。原来他就是受了委托来找寻“另一边”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那“另一边”就是我。相反，他也像那一边所有的人一样，以为我被捕了，并且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苏联进犯。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还同洪扎·维斯科奇尔一起印发了一份传单，阐明这次进攻对我们说来意味着什么。六月三十日，我和寻找了这么久的那个人会面了。他来到我约定的联络点，因为他已经知道将同谁会面。而我那时还不知道将同谁会面。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从敞开的窗口飘进来槐花的清香，这正是情人幽会的美妙时刻。而我们却拉下窗幔，打开灯，互相拥抱起来。原来他就是洪扎·齐卡。

原来一九四一年二月里，并不是全部中央委员都被捕了。中央委员之一的齐卡得以幸免。我早就认识他，并且早就爱戴他了。但只是现在，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他。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像个慈祥的大伯，而在党的工作中却表现出坚决果断，毫不妥协，有信心，有决心。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愿知道，还有比党交给他的任务更重要的事。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他可以放弃一切。他爱人们，人们也爱他，但他从来不以无原则的宽大博取别人的爱。

只用几分钟我们就把事情商量好了。过了几天我认识了第三个新的领导成员，这就是洪扎·切尔尼，他早在五月间就同齐卡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小伙子，同群众关系很融洽。他在西班牙打过仗，大战开始后，他带着一叶被打穿了的肺，经过纳粹德国回到了祖国，还留着几分军人的气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个有才干、有首创精神的人。

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纯洁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这三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相互补充的。齐卡是一个干练的组织家，认真而精细，办事严谨，不会被任何一句圆滑的话弄糊涂。他深究每一则消息，刨根问底，从多方面分析研究每一个建议，热诚却又铁面无私地监督每一项决议的执行。领导怠工和准备武装斗争的切尔尼，用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机敏而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总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众。而我呢，是一个宣传鼓动者，一个新闻记者，会凭自己的嗅觉工作，有点幻想家的气

质，为了平衡，也兼有点批评家的气质。

职务的划分与其说是分工，倒不如说是分头负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全部工作，哪儿需要就分头上哪儿去。工作是不轻的。党在二月份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复原。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有些地方的组织全部被破坏了，有的虽然保存了下来，但接不上关系。一些组织、一些工厂、甚至整个地区几个月都跟中央断了关系。在关系接上之前，我们只好依靠中央的机关报，希望它能到达他们手中来代替领导。我们没有联络点，也不能利用过去的联络点，怕有人监视着这些地方。最初我们还缺少活动经费，粮食给养也十分困难，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切恰恰出现在党已经不能只做恢复和准备工作的时期。在德寇进攻苏联的日子里，党应该直接参加战斗，组织反对占领者的后方战线，在敌后发动小规模的战斗，这不仅要靠党组织本身的力量，而且要动员起全民的力量来进行。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准备时期，党不仅对德国警察，就是对于人民，也是极其隐秘的。现在党受到创伤，它在占领者面前应该更加隐秘，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却应当从隐秘转向公开，应当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应该向全国人民和每一个决心为自由而战的人敞开门，同他们结成同盟，用直接的行动把那些还犹豫的人引向斗争。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我们初步能够这样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把严重破坏的组织恢复起来——我们离这点还远着呢，但是我们却有了一个组织得牢固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已经能够，至少部分地能够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党的活动明显地恢复了。各个工厂的怠工和罢工的次数在增加，——九月底，他们派来了亨德里希来对付我们。

第一次戒严并没有摧毁那正在增长起来的积极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党受到了新的打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的宝贵的干部——扬·克雷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别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可以看到党是多么不可摧毁。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三个人站到他的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的组织,虽然它还没有包括所有的部门,也远没有达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规模,但是它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完成党的任务了。虽然我们大家都分担了这项工作,但主要应归功于洪扎·齐卡。

关于我们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将来可以从同志们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阁楼上的文献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的报纸传播得很广,不仅党内的同志读,而且党外人士也读。它大部分是在许多各自独立而相互严格隔离的秘密"印刷所"里用复印机印出来的。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出版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给苏联军队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经传到第一批读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员出色地工作着,如医生组,特别是"富克斯——洛伦兹"这个组,他们除了出版报纸,还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况报导。为了节省人力,其余的工作都由我亲自承担。还准备了一个万一我出事时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后,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建立了极其简单的机构,这样在执行任务时,就可以尽量少用人。我们缩减了一长串的联络点,因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经验证明,过多的联络点不但不能保护党的机构,反而会使它受到威胁。对我们个人来说,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增加了,但对于整个党,却安全得多。像二月的那种打击就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在我被捕后,中央委员会只要补上一个新的成员,就可以安然地继续自己的工作。至于候补的人是谁,连我最亲近的战友都一点也不知道。

洪扎·齐卡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里被捕的。这又是一次不幸的偶然机会造成的。那是在亨德里希被刺的当天晚上,占领者的全部机构都开动起来,在布拉格全城进行搜捕。他们也闯进

了斯特舍肖维采的住宅,恰好齐卡那天晚上正躲在那里。他的证件齐全,显然是可以逃脱他们注意的。但他不愿连累这个善良的家庭,就试图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逃走,但他摔倒了,脊椎受了致命的伤,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盖世太保对落到他们手里的这个人一无所知。十八天以后,才在对照片的时候认出了他,于是就把这个生命垂危的人送到了佩切克宫受审。我被传去对质时,在那里同他见了最后一面。我们紧紧握手,他面带亲切的微笑对我说:

"祝你健康,尤拉!"

这就是他们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句话。此后他就再也没说过一个字了。他脸上挨了几下,失去了知觉,没过几小时就死了。

五月二十九日我就知道他被捕的事。我们的"触须"的工作做得很好。经过他们的协助,我和他商定了今后工作的大体步骤,后来又做了些补充修改,洪扎·切尔尼也同意按这个步骤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们这届中委的最后一个决议了。

洪扎·切尔尼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被捕的。这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于同切尔尼联系的扬·波科尔尼严重地违反了纪律。波科尔尼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场。他在被拷问几个小时后(的确是够受的,但他还能期待别的什么呢?)供出了他和切尔尼碰头的联络点。这就使洪扎被跟踪上了,几天以后他便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

他们把他抓来后,立刻叫我去对质。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们的回答是一致的。之后他就完全拒绝开口。他的旧伤使他经不住长时间的折磨。他很快就昏厥过去了。还没等到第二次提审,他就知道了详情,于是就照着我们的决定行事。

他们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把他牢牢地禁闭起来,长时间地等待,企图用别人的新口供来逼他说话,但是没有结果。

监狱没有能改变他。他仍然生气勃勃、快乐而勇敢,他还继续



他们把他抓来后，立刻叫我去对质。
“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给活着的人指出生活的前景，而他自己却只有死。

一九四三年四月底，他们突然把他从庞克拉茨监狱押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送到哪里去。不过在这里，突然被送走的人照例是凶多吉少的。当然，也可能猜得不对。但是我想，我们俩是不会再见面了。

我们对死亡有足够的估计。我们都知道：一旦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在这里我们还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

现在也许需要作出解释，为什么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采取与以往有所不同的做法呢。

七个星期以来，我只字未供。我很清楚，说什么都救不了自己，而且还可能危及狱外的同志们。沉默使我掌握主动。

可是克列仓交代了。知识分子队伍中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抓到这里来了。现在又实行了戒严。有大批人被捕，无须多长的审讯他们就会遭到屠杀。

盖世太保那儿肯定会产生联想：既然万楚拉是，那别的人为何不是呢？为什么斯·科·诺伊曼①、哈拉斯②、奥勃拉赫特③ 不是呢？在我面前，这三个人都被直接称作《红色权利报》的撰稿人。他们是否会被逮捕尚在两可之间。而一旦被捕，就意味着必死无疑。另一些人也在计划之列：奈兹瓦尔④、塞弗尔特⑤、两个维德拉⑥、多斯塔尔，我完全不知道为何还有弗雷依卡⑦ 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应付自如的波尔⑧。

假如我在盖世太保面前一下子道出心声，那也不会伤害他们中

---

① 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诺伊曼（1875—1947），捷克进步诗人、共产党员。
② 弗朗基塞克·哈拉斯（1901—1949），捷克著名的抒情诗人。
③ 伊万·奥勃拉赫特（1882—1952），捷克作家、共产党员。
④ 维捷兹斯拉夫·奈兹瓦尔（1900—1958），捷克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共产党员。
⑤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01—1986），捷克著名诗人、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⑥ 维德拉父子俩均是捷克著名演员。
⑦⑧ 弗雷依卡和波尔均是捷克著名导演。

的大多数人。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我持沉默态度能保护住他们吗？我沉默不语还能是积极主动的吗？这是否有些消极了？

对此问题我必须作出回答。我自己找到了答案。我并非一个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留心也不明白自己在同谁打交道的人。七个星期以来，我在盖世太保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看透了这里的那些握有万般权势的人，深知他们的手法，了解他们的水平。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在此也有参加战斗的机会，是用一种与外面完全不同的斗争手段，但其目的和意义是同样的。而继续沉默则意味着放弃斗争的时机。现在需要有所作为，以便我能够说，不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是需要开始演一出高妙的戏剧了。不是为了自己——为自己那准会惨败的——而是为了他人：

他们一直期待从我这儿获得轰动的事情。那我就奉献给他们嘛。他们不是对我的交代寄予很大的希望吗，那我就来“交代”好啦。至于怎样交代的，你们会在我交代的档案材料中找到。

结果甚至比我预料的要好。我把他们的视线完全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了。他们忘记了诺伊曼、哈拉斯、奥勃拉赫特们。他们没再打扰捷克知识分子的安宁。我还达到了这一目的：使被捕的鲍日娜·布尔帕诺娃和因德日赫·埃尔勃尔获释，他们的证词可为我作证。不仅仅是这些。我还取得了信任，并继续干下去。好几个月来他们都忙于追捕幻影，这个幻影像所有的幻影那样比现实要大，比现实更具诱惑力。而现实是，外面暂可进行工作，壮大自己，以使现实能超越一切幻影。后来我还直接干预了一些落到这里的案子，而这些干预“不是未留后果”的。这就是我作为佩切克宫内的一名“打杂者”诚心完成的唯一工作。

这样一来，推迟了我的死亡，赢得了也许对我有所帮助的时间，这种奖赏是我未曾考虑过的。

一年来我同他们一起写下了这出戏剧，并使自己担当了剧中的

主要角色。有时演得滑稽可笑，有时令人精疲力尽，但始终使人绷紧心弦。每一出戏都要结束。每出戏都有它的高潮，有它的转折和收尾。帷幕落下。鼓掌。观众们，回家睡觉去吧！

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我已经写不完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已经不是戏。这是生活。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幕已经揭起。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

（全文完）

列金卡和刑吏

《列金卡和刑吏》反映了本世纪三十年代[1] 欧洲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如何波及到捷克农村，致使大批小商人破产、农民受剥削和贫困的情景。

有那么几天，军训遇到了困难。我们几乎是逆流而行。军旗已在对岸寻找我们了。河水要能冻成冰就好了，那我们就不会感到它又宽又长，像离圣诞节还有两年似的。完全没有冬天的景象，只有弥漫的浓雾，完全像是从水里升腾起来的一股瘴气，它会使人全身酸疼，引起伤风感冒。要说老天爷也是长了眼睛的，他大慈大悲，知道人们已经没有取暖的东西了，要是他还送来严寒，那岂不是这里冻死一个，那里冻死一双吗。干吗要引起人们这么多的不满和怒喊呢。何况这种浓雾对痨病还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让你一个劲地咳，咳呀、咳呀，咳得你不能再咳了，那大伙儿也就会非常高兴，因为安宁有了。只不过你个人算是倒了霉，但谁也不会去为一个痨病者的死亡大喊大叫的。

我们队伍也就这么稀稀拉拉地朝前赶，汗湿透了全身。好不容易才进到一个村子，那里全是些黄色、蓝色的矮平房。村里的人像是死绝了，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我们，谁也不理我们。大姑娘对丘八微笑送秋波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了啊，只是在歌曲里还能听到，而在现实生活中连孩子们都不屑于瞧我们一眼。

---

① 此指20世纪30年代。

我们在村里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扎营，恰好在一个小饭铺的前面。这倒是个好机会，我说，咱们干吗要把钱留在口袋里呀，它不会给我们变出个火炉来的，倒不如去饭铺里暖和暖和。于是我们去了。真倒霉，门钉得死死的，我们捶了几下也没个回音，真想把它砸开。一想，何必呢，外面都这么潮湿阴冷，里面也不会暖和到哪里去。

咳，反正已经发了稍息令，用不着急忙赶回去，呆在广场上干瞪眼，去挨饿受冻？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小饭铺的旁边不远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店，门上写着：

概不赊账！

真是，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任何时候也没有人给我们赊账，何况我们本身就是债主，我们还等待分期付款呢。可我们还得卖苦力，还得忍饥挨饿。现在我们就饿着。我们只是要点面包、咸肉之类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去开小店的门，响起了铃铛声。一些商店的老板通常都喜欢到工厂去定做自己铺子要挂的铃铛，从不把定做的铃铛转卖给别人——如果我是个瞎子，像刚才这种响声，那我准知道，我是来到了一个杂货铺，那我也可能像奶奶和父亲他们那个时候一样，只买一个铜板的块糖。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铃铛声，好像只响了一半，而不是它的全部响声，像是谁偷走了它的半个芯，它没有使出自己全部的能耐，它的那个实芯像是丢了，不管怎么说，听起来它是缺少了点什么。

“大娘，”我说，“我们来要点咸肉。”

我没瞧见她人，可是我知道，她准是坐在那边黑洞洞的某个地方，灰白的头发，动作敏捷，眼睛机灵，在柜台后面来回不停地打转，能照管到整个店堂。果然不错，她是坐在那边，可她的头发却更加灰白，脸色发青，很不灵活，她发话了：

“咸肉？我们没有。”

“那么香肠，大娘，”我说得更加委婉。

“香肠？我们没有。”

“喏，大娘，”我说，“大批的可能没有，品种也不会那么齐全，哪能同饭馆的菜单相比呢，吃完了正餐，还来点甜点心。只给我们来半个长面包就够了。”

我这个人总喜欢开个玩笑或弄个恶作剧之类的事，可一想，过一会儿就得出发，肚子还饿得咕噜咕噜作响。

“这样吧，大娘，我们还要赶路，空着肚子怎好行军呢，您是不是让我们进厨房里去看看？”

“你们去吧，”她说，并随手将门推开，“去吧，那里也不会有的。”

我去了。看来是没有。

门被一条粗汉带上了。

“我们想来要点面包，”我解释说。

“赊账不行，”那条大汉斩钉截铁地提高了嗓门说。

“我们不赊帐，我们有现钱。”

“可我们没有。”

“那我们可以给你们。”

“我们又拿什么呢？”

“拿杂货铺的某些东西，拿……”

拿什么？拿什么？我环视了一下整个店堂，这就明白了，刚才杂货铺的铃铛为什么响起来好像是缺了半个芯似的，原来盛着琳琅满目、香味扑鼻的各种杂货的货架、口袋以及一格一格的抽屉全都空出来了。现在这间屋子显得倒不算太黑，我的眼睛能见量又大了些，一眼望去，这店堂空荡荡的。

“大娘，”我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娘不语，倒是那条粗汉答话了。他说人们唱着一首可怕的歌子，还说人们总想骂人。村里的情况糟糕得很。已经有两年没活干了，树林的灌木丛也已有两年不见长出什么新树来，饥饿的樵夫只

好改行去给他人刻墓碑，得点钱还不够偿还新近的债务；信贷失灵，苛捐杂税加重。而我们还想在这里买些什么，还说给他们钞票，这不是找上门来挨骂嘛。

只见一些空麻袋奇怪地拖曳着，货架也是七歪八倒的，只在靠近柜台的一个货架上还有两打蜡烛、几包磨刀石和几捆鞭子，就这些东西。这条粗汉将一大口唾沫吐到一块木板上，那木板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赊账——无望中的一点希望吧，然后他用自己那只宽大的手将唾沫搓掉，擦净了用粉笔记下来的这一年里的所有赊账，顿时，就像是那外面的浓雾，完全从水里升起来的浓雾，使得他的鼻子发酸，于是鼻涕眼泪一下子弄湿了这块木板，接着只见一只鞋子飞了出去，那木板被踢了一个底朝天，只见背面写着：

杂货铺

两打蜡烛，几包磨刀石，几捆鞭子……

突然一种恐惧向我袭来，我把一个克郎紧紧地攥在手里，放进口袋的深处，转身向门口走去。

当我们感到十分尴尬、极为可怕的时候，列金卡来了。

我真觉得，她是来搭救我们的，是来把我们从一种令人不快、可说是某种狂乱的、被浓雾深深地罩住的境地里解救出来。小小的列金卡，鼻涕还未擦干净呢，头上扎着她妈妈的头巾，显得特别活泼愉快，就像是刚参加过一个春光明媚的花园舞会才回到家里来似的。

“你们带我去吗？”她问，圆瞪着双眼。

倘若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这样发问，我想，你一定会闭上眼睛，定一定神，然后会说出一个“不”字来的。而当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如此信任地来问你，我看你一点也不会含糊、躲躲闪闪；更不会把帽子拉下来将脸盖住，或用手捂住耳朵。列金卡只有八岁。

“我们带你去，”我说，“你知道我们会带你去的。那你想上哪儿去呀？”

“到城里去。”

“那我们就带你上城里去吧。你想到城里去干什么呢?”

“买东西,”她说。她这句话把所有在这个空荡荡的店堂里的人都逗乐了。

“好呀,把整个百货大楼都给搬来吧。”

连那个有点奇怪的大汉也都笑自己小女儿的天真。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用手擦了擦十字架。

列金卡要去买东西。列金卡她有钱。列金卡她还是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旦她稍大些,她就会知道当前的情景有多可怕。打今年春天起,她就梦想着谁能给她一点钱,她就把这个空空荡荡的店堂布置一番,好好地过一个圣诞节。从春天起她就做着这个梦。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一旦得到一个铜板,也会立刻拿去买块糕饼或一根棒棒糖的。而列金卡偶尔也能得到一个铜板,可她并不为不能去糖果铺而觉着遗憾、不快,相反,她一有了点钱,立刻径直地朝那个早已无人去捡蛋的鸡窝奔去,那儿有她用自己最后的雪花膏瓶盛着的宝藏,也就是她的保险柜。

“打春天起就开始了,列金卡,那你的钱一定攒得不少喽!”

大约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她对我们还有所怀疑。可我们却大饱了眼福,我们大伙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看个究竟。列金卡十分严肃地抽出了她的左手,只见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被紧紧地攥在她手里。当她打开这个小包的时候,还环视了一番,看我们中有否见钱就眼红的人,而后她将钱摆在柜台上,叠成一垛一垛的。二十、三十、六十个赫勒[①],一个、两个、三个、八个、三十八个克郎。

“全部财产! 列金卡,买什么?”

买核桃、买糖果,给父亲买双袜子,项目开了一大串,差不多比二十个赫勒排成一排还要长。

二十个赫勒为一垛地摆在柜台上,然后这几垛用来买袜子,那

---

① 1个赫勒等于1分钱,100个赫勒为1个克郎。

一个克郎买糖果。硬币碰着柜台的硬木面发出当啷声，这时杂货铺的铃铛声响了。

一位身着一件毛都快掉光了、显得十分寒碜的皮大衣的人来访。

哟，这位先生我们不早就认识了吗。我们进村不久，他就像条忠实的狗总跟在我们的后面，他喜欢我们，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六十个都是带枪带刀的军人，他还跟我们玩假兵的游戏。等我们驻下后，他还挨家挨户去吩咐、关照一些事情，看还剩下一些什么问题没解决。

我们认识他。

是个好的刑吏。我虽然不曾见过他的眼睛，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双蓝色的。

很快我们就熟悉热闹了起来。这简直有点滑稽可笑——他还能从这铺子里弄到什么呢。很可能他是来为我们找面包的。也许不，他是来要这些蜡烛或鞭子？我们敢打赌，他是来拿这些鞭子的——等一支蜡烛烧尽了，你才去找它上面曾贴过什么样的商标。

刑吏阴沉不快地环视了一下店堂。

“什么也没有，是吗？”

“是的，什么也没有！”

他拽住了鞭子的一端——你瞧，我们猜对了吧，他想拽一些质地优异一点的，也就是编得紧一些的，以便抽打起来能发出更好听的“啪啪”声——他重又把它放下了。连鞭子都不怎么带劲。年轻人，这是什么世道啊，简直令人不解，这还是个什么杂货铺呢，这岂不是对那块板上写着“杂货铺”三个字的一种讽刺嘲笑吗？

“什么也没有，喏，那我们就走吧。”

列金卡站在一个角落，她把自己的宝藏赶紧用手绢包起来。

“那我们走吧。看你这身打扮，列金卡，你是要上哪儿去呀？”

“到城里去，刑吏先生，去买东西。”

老好的刑吏说得十分缓慢且和善：

“好啊，好啊！去买东西！有哪个地方你没有钱去能买到东西的？那我也到那里去。”

列金卡遭到奚落。没有钱！谁说她没有钱！列金卡重又打开了她的小包袱，柜台上重又响起了硬币的当啷声。列金卡已经使我们相信了，我看，这位先生也会同我们一样相信她的。当守本分的刑吏看到了这些钱，听到了列金卡如何一点一滴地攒起来的，如何把谁给她买糖块、买果子的钱省下来，又从谁那儿得到了采摘樱桃的钱后——倘若真有天国，我就把他们直接送到那边去，何必活受罪呢——他抚摸着列金卡的头，说她真乖，真听话，要永远像这样听话，随即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本子，在本上写了点什么，之后把纸撕下来，交给了那位粗野的杂货铺老板，说道：

“我入到了去年的账上，”他说，“还剩一百八十个克郎没给，我还没包括手续费，不过那将是很便宜的。再会！”

他要走。

路经柜台时，他把列金卡的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呆呆地望着他，死死地盯着他，我的头在发晕。他会回来的，他不能这样做，他这是在闹着玩的，他是个好人呀。

杂货铺的铃铛响了。就响了一次。没有响第二次。

刑吏站在门中间，他又回来了。我们就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这会儿，他把手伸进口袋里——你赶快伸呀——他掏出来钱——你赶紧掏呀——他把钱给列金卡——给呀，他给她五个赫勒，并且说：

“你真乖，愿你总是这样听话，让你双亲都高兴快乐。”

铃铛声第二次响起，响得那么可怕、强烈，整个心都在猛烈地敲响，像突然拉起了警报似的，整个村子都能听到，而我们已在村中广场上站好了队，扛起了枪，准备出发了。

当我们开走的时候，从水里升起来的浓雾仍然弥漫着大地，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当然也就瞧不见那条忠实的狗。

而列金卡呢？

明摆着的，她哭了。

发生在本世纪的经济竞争这一不利形势中的这个一九三二年的军队圣诞节的故事并非臆造、杜撰，连那浓雾，那两打蜡烛，那个列金卡以及那个守本分的刑吏都是真的。它紧紧围绕和紧扣住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个士兵所曾见到的真实情景。所以说不可能杜撰出来一个结尾——它也不会有结尾的。

它还是没有结尾。

致古斯塔·伏契科娃

我的果实系晚熟之列，
从地狱污水升起的浓雾中汲汁、甘甜，
当雾气弥漫忧郁的草原，
当初雪覆盖蜿蜒的山峦。

弗·克·沙尔达[①]

我亲爱的！

我俩要再像孩子似的在一个阳光普照、和风吹拂的临河的斜坡上携手漫步是没什么希望了。我想再有那么一天，重新生活在和平、宁静、舒适与满足中，在书籍友爱的怀抱里，写下我们曾共同谈论过的、二十五年来在我脑海里构思和成熟起来的一切是没什么希望了。当他们捣毁了我珍藏的书籍的同时，他们也就把我生命的一部分埋葬了。但我决不屈服，决不让步，坚决不让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在这间二六七号白色牢笼里不留丝毫痕迹地完全毁掉。因此，我现在正从死神那儿窃取来的一点时间，抓紧写一些捷克文学的札记。请你永远记住将要把我的手稿转交给你的那个人，正是他使我不至于完全、彻底地从人世间消失。他给我的笔和纸，唤起了我一种只在初恋时才会有的感情，引发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绪。当然眼下没任何文献资料，更无从引经据典，要写出一点东西来是不容易的，即或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些活生生的，我似乎可以触摸到的一些东西，然而对我的读者来说却会是些模糊和不现实的。因此，我得首先给你，我亲爱的，给我的助手和第一个读者写信，因为你最能

① 弗·克·沙尔达(1867—1937)：捷克现代文艺批评的奠基人。

猜透我的心思，而且你还可以和拉扎以及我那位白发苍苍的出版家一起做些必要的补充。我的心和脑子可说是装得满满的，但这儿的四壁却空空如也。你要写有关文学评论、札记一类的东西，而手头上却连一本哪怕只让你瞟上一眼的参考书都没有，这岂非咄咄怪事！

命运原本就是那么荒诞不经。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那广袤的旷野、阳光和风。多么愿意成为生活在它们之中宇宙万物的一分子：像只小鸟或一簇灌木，一片云或一个流浪汉。然而多年来，我就像树根一样地注定要生活在地下。这些树根或许长得歪歪扭扭很是难看、发黄的，它们被黑暗与腐烂物包围着，然而它们却使地面上的生命之树昂首挺立。无论有多大的风暴也休想将那根深蒂固的生命之树吹倒。这就是树根骄傲之所在。我也以此感到骄傲。我从不后悔我成了树根。我没什么可悔恨的。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并且乐意去做。但是那光明，我钟爱的光明，我多么愿意破土而出，在它的光照下茁壮成长，长得挺拔高大；我多么希望也能开花，也能结出可供食用的果实来呀。

喏，有什么法子呢？

在由我们这些树根支撑着的树上，一代新人正在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他们是社会主义一代的工人、诗人以及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纵令迟一些，但他们将会更加出色地去评论我已无法评论了的一切。这样，我的果实方能变得甘甜和丰硕起来，虽然已永不会再有白雪飘落到我的山头。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于二六七号牢房

致戈培尔部长的一封公开信

——捷克知识分子的回答

国社党的宣传部长、宫廷小丑戈培尔，从所谓的捷克知识分子中挑选了几名代表，邀他们去德国，聆听他的演说，并大肆渲染此行之重大意义。他那充满恬不知耻的收买和威逼利诱的演说不仅是对被邀者而言，而且也是对捷克整个知识界而发的。按戈培尔所说，捷克民族还来得及表明其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参加到德国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来呢，还是在其中进行反抗”。言下之意，是跟德国友好呢还是与它作对。这位部长还进一步强调说，捷克民族想走哪条路这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引导，因为人民的想法总是与他们思想的领导阶层的想法是一样的。这就是戈培尔演说的精神实质。

纳粹分子们曾力图用尽各种手段来分化瓦解捷克民族的英勇反抗。但他们从来也没得逞过。他们曾力图引诱捷克青年。这也是白费力。他们努力讨好捷克工人阶级，其结果是他们的一些走狗连从工厂、车间逃走都来不及。如今他们想利用捷克知识分子来钻进民族的心灵这或许会奏效的。“请到我们这儿来服务吧，”戈培尔露骨地说，“这对你们有利，好处是大大的。”他活像个准备要签订一个一本万利的合同的商人：你们上我们这儿来服务，一旦我们拥有了你们，那么整个捷克民族就将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了，要知道，人民的想法总是与他们的思想的领导阶层的想法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要是你们叛变了，那么整个民族也就会被出卖！这样说虽不太含蓄，但却更准确些。

捷克知识分子面对这般卑鄙的建议，如此下流的侮辱，是不能不作出回答的。我们有为自己本身、自己的荣誉、为自己的民族以及民族中的一切进步力量、民族解放斗争行列中和我们携手并肩的

一切人们发出回答声音的义务。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回答。我们，捷克的音乐家、演员、作家、工程师；我们，被你们的恐怖政策所捆绑着双手的我们；我们，自己成千上万个同志在你们的牢狱和集中营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的人们。

我们，捷克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就来回答您。

戈培尔部长！

永远不会，您听到没有，我们永远不会背叛捷克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永远不会去为你们服务；我们将永远不会为黑暗和奴役服务！

您期望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在捷克人民中间帮助扩散您那字字句句都浸透了谎言的欺诈宣传吗；让我们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在我国文化界赢得的名声去为这种欺诈宣传涂脂抹粉吗；让我们把自己的声音和笔杆奉献给您，为您的谎言所支配吗；让我们滥用自己人民的信任，并劝他们走上必将导致毁灭的道路吗？不，我们决不这样做！

您期望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合伙干你们那些血腥的暗杀吗；让我们与你们的盖世太保为伍，像你们一样的穷凶极恶吗；让我们像盖世太保屠杀捷克人民的身体那样地去毒害他们的灵魂吗；让我们帮助你们的所有暴徒来镇压你们制服不了的捷克人民的骄傲和壮丽的反抗吗？不，我们决不这样做！

您究竟期望我们什么呢？让我们自戕？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做！

我们，正如您所称谓的那样是“民族思想上的领导阶层”，我们确实和自己国家的人民有着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民，而是说我们代表他们、表达他们的意愿。我们，我们这些文化人和自己民族的最进步的力量总是生死相联的，这我们是知道的。在捷克知识分子曾经确实是民族思想上的领导阶层的各个时期，在捷克文化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各个时期，捷克文化中所有著名人物都是和使得人类进步的最大胆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在它的伟大旗帜下，我国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虽受尽折磨、备

受熬煎，但并没有毁灭沦亡，因为他们从不放弃斗争。

为人类的自由——在我国曾经
鲜花怒放！
——今天的捷克人仍旧这样，
——一如往年：
这个信念把我们大批带进了坟茔，
却又把我们引上光荣之路
——前进，再前进！

这是一位捷克诗人[①]写的，戈培尔部长，这位捷克诗人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代表所有的人，代表我们和我国人民选定了一条能够把我们引向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唯一的道路。但它并非是你们压迫我们的叛变的道路，而是一条为反对奴役而斗争的道路，一条为争取我国、你们国家以及整个欧洲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道路！我们誓死不离开这条道路！

在捷克历史上，有过不少反动的捷克统治者、阔人进行政治叛卖的劣迹，这些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财产和特权的话，他们就心甘情愿地出卖捷克人民的自由，甚至整个民族的政治生命。但是，在捷克历史上，您决不会找到有捷克文化人政治背叛的一页——我们坚信，我们决不会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这样的一页！

我们在暴风雨中诞生，
一步一步在暴风雨的阴茔中前进，
傲然走向我们灿烂的目标，
只在自己的民族面前我们才肯折腰。

① 本文所引之诗均出自捷克诗人扬·聂鲁达(1834—1891)的名诗《再前进》。

这也是那位捷克诗人写的，戈培尔部长。而您却认为，我们，在经受了几世纪可怕的压迫，但却并未屈膝的捷克民族的知识分子们，您认为我们，与捷克人民血肉相联的我们，会在您的面前俯首帖耳吗？真是一个疯子！

您答应给我们一些“好处”。当真的？“一旦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也就是说一当捷克知识分子的叛变之事着手进行），那么在捷克的电影事业面前就会展开一个空前广阔的销售市场……捷克人就会有可能输出自己的电影、自己的文学和自己的音乐。”您是这样说的吗？是的，您确实是这样说的。什普勒河岸上可怜的跛足罗累莱[①]，你的那诱惑性、魅力藏到哪儿去了？我们捷克有这样一句谚语，“欲把鸟来捉，先诱之以好听的歌。”可您连一首好听的歌都不会唱嘛。您想拿什么东西来诱惑我们呢？输出捷克电影，这是您说的，然而窃去捷克电影工作者筹建起来的最完善的电影制片厂、扼杀处于萌芽时期的捷克电影艺术，使之不能充分发展的不正是你们吗？“输出”捷克文学，这是您说的，然而野蛮地横扫我国的整个文学，没收和销毁捷克作家们的最优秀的作品，把捷克文学作品从捷克的图书馆里扔出去；甚至毁损马哈[②]的《五月》，不仅清剿当代的诗集；连六百年前出版的查理四世[③]的自传也不放过，妄图毁灭全部捷克文学的不正是你们吗？

您想用输出捷克音乐来诱惑我们，这是您说的，然而用没完没了的禁演来破坏我们的音乐生活，妄图用恐怖、暗杀手段压制我们

① 什普勒河从柏林的郊外流过。此处乃象征德帝国首都柏林。罗累莱是传说中的一个魔女，她坐在莱茵河畔的一座巉岩顶上，用歌声引诱河上的船夫，诱惑的结果使船颠覆。此处即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之徒的象征。另外，戈培尔也是跛足。

② 卡雷尔·希内克·马哈（1810—1836）是捷克著名的浪漫派诗人。抒情叙事长诗《五月》（1836）是马哈艺术创作的顶峰。这部长诗的发表使他成了“捷克诗歌的施洗者和培育了整个现代诗歌的精神之父”。

③ 查理四世（1316—1378）是德意志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1346—1378 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55 年登基）。在他的统治下，布拉格变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他于 1348 年创办了中欧的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并在布拉格附近修建了著名的查理城堡和查理大桥。他使捷克成为 14 世纪中欧的强国。

伟大的作曲家的不正是你们吗？禁止我们歌唱的也是你们，不让我们儿童们唱捷克民歌的还是你们！你们封闭我们的大学[①]，使我们的小学德意志化，把我们的校舍、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变成了你们的军营，你们掠夺霸占我们的科学研究机关，使我们无法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你们想把记者们都变成头脑简单、刻板的自动机器，你们消灭成千上万的文化工作者赖以生存的基础；毁坏各种文化以及创造民族思想领导阶层的一切基础——而正是你们自己却想借着这一领导阶层的帮助来继续你们那令人难耐的疯狂行为。部长阁下，“这是要引起伤疤来回答的玩笑”[②]，我们可以用这位伟大的德国剧作家的这句话来回答。

是的，就连这位伟大的德国剧作家的作品都已经不准上演了。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幅极好的关于你们那些“好处”的说明图啊！它使我们注意到，在你们打算向捷克文化进军之前，你们早就阉割了自己的德国文化。你们扼杀伟大的德国人文科学，把当代最杰出的一些德国科学家从本国驱逐出境，一些著名的德国诗人和作家不是被赶出国境；就是被折磨致死，你们大量地烧毁了一些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的著作，你们荒废了德国的画室，践踏了德国戏剧的光荣，你们捏造德国的历史，从德国文学中删除了其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亨利希·海涅和其他名气较小的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你们还阉割歌德和席勒的创作思想，你们把自己国家的“文化领域”变成了一片荒漠，屠杀、歼灭或迫使自己本国的“思想领导阶层”缄默不语——而今你们又反倒来邀请捷克的思想领导阶层去“参加”你们的那个福利事业。怎么参加？也就是作为你们下一个牺牲品而已。因为你们是不可能给捷克知识分子以任何好处的。您想砍掉捷克

---

① 1939年10月28日，在布拉格举行捷克独立日的反德示威游行中，一名大学生扬·奥普协塔尔遭枪杀。11月15日举行的死者的葬礼变成了自发的学生示威游行。占领者用恐怖手段对付了这次游行。11月17日，盖世太保袭击了学生宿舍，杀害了几名学生，且将许多学生送进了集中营。同一天所有捷克高等学校全部遭到封闭。对捷克学生的迫害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激情。现在全世界把11月17日作为“国际学生节”以资纪念。

② 这是戈·埃·莱辛（1729—1781）说的一句话。他是德国著名的剧作家、艺术理论家。

知识分子的脑袋,但要他们自己引颈就屠。谢谢您的邀请。对不起,我们不参加!

我们见识了您的那些“好处”。我们鄙视您的那些威胁。从您冗长的演说中,我们能接受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您自认无法摧毁捷克民族。一年半以来,你们的铁蹄踏遍了我们的国土,无处不遭殃、不受罪,监狱里塞满了我们的男人、女子,甚至儿童都不放过;屠杀我们最优秀的人们。一年半以来,你们一直在窒息我们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一年半以来,你们力图用恐怖手段迫使人们在“卐”字前屈膝就范。而经过了这般狂暴的一年半之后,就连您——一个惯于说谎的纳粹的宣传部长也不得不承认,你们一无所获,我们仍在抗拒;而且要抗拒到底。是的,这一点我们是同意接受的,并对自己顽强的抵抗引以为豪。但是,假若您,一个卑劣的诽谤者认为,我们捷克知识分子的自豪感和气节比不上培育我们成长的捷克人民的话;假若您认为我们会听任您的诱惑和吓唬,从而使我们背弃自己的人民而与你们一道去反对他们——那就请您再听一次我们的回答:

不,不,永远也不!

假若您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建设新的欧洲,我们的回答是:

是,是,是的,而且是尽快地建设!

不过这将是完全另一个欧洲,决非为您所说的那个欧洲。你们的那个“新秩序”实际上是个旧的无秩序,那是靠屠杀牺牲在你们手下的千百万人的生命来维持的。所以您才如此迫不及待地催促我们!所以您才希望我们快,快,快;尽快地成为你们新的、一头丰满的羔羊,“心甘情愿”的牺牲品,“赶早不赶晚”。否则就要来不及了,谁来不及了?你们!

本来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您是在什么样的时间里给我们提出了那个厚颜无耻的号召的。你们发动了战争——强盗式的战争,你们在战争中暂时告捷,你们正在向前推进、占领、枪杀、轰炸、放水淹没,但是,这一切的结果如何呢?目标越来越落空,你们曾为此而发

动了一场战争，你们的目标一步一步离开你们越来越远，已相距十万八千里了，就是你们自己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你们曾经占领了一些国家，它们当然成了你们进攻苏联的基地，但是你们的宣传、倒行逆施，使被你们奴役的千百万人睁开了双眼，在他们的思想和心中充满了对你们和他们本国的反动派；对于隐藏在各种假面具下的法西斯主义的强烈的憎恨。然而也是你们使这些人满怀一个统一的、要求真正自由的坚强意志——如今这就是你们妄想建立"新的"法西斯欧洲的结果。你们还可以在各个方面继续给予疯狂的打击，然而除了你们自我毁灭之外，你们什么也组织不起来了。所以，无论是你们，或是你们往昔的伙伴，如今的敌对者英国，都不能结束这次战争。你们在欧洲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你们发动了海陆空全面的战争，然而，结束这次战争的却是在地下，在你们残酷地把捷克人民、法国人民、比利时人民、荷兰人民、丹麦人民、挪威人民、西班牙人民、意大利人民以及你们本国人民驱赶到的那个地下。

不是你们，我们再向您说一遍，这一点您自己现在也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发动了这次战争的你们，而是被你们卷入战争的各国人民，是你们徒劳地妄图将他们变成奴隶的各国人民，是以革命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依靠苏联的强大威力——随着你们的每一个"成就"而日益壮大的威力——的各国人民，是这些民族、人民来亲自结束这次战争，亲自来粉碎你们的计划，并亲自来建立他们现在还只能是理想的新欧洲——纳粹匪徒绝迹的欧洲，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绝迹的欧洲，中饱私囊的下贱坯绝迹的欧洲，自由劳动的欧洲，自由的各国人民的欧洲，真正的新欧洲，社会主义的欧洲！

捷克知识分子的代表们

（尤利乌斯·伏契克撰写的秘密传单，一九四〇年秋）

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

如果说我们是一群乞丐，那么世界对我们说来也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鲍日娜·聂姆曹娃

一八四七年，当斯塔涅克博士告知住在霍兹科的鲍日娜·聂姆曹娃，说布拉格的一些朋友想印制她的石版肖像时，立即遭到聂姆曹娃的断然拒绝。她在给切拉科夫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在我为数不多的挚友中，没有哪个需要先去看一看我那像煤炭样乌黑的肖像才能将我记起来。既然不会是这样，那又为何要如此地破费呢？此外，还可能招致话柄，很多人或许会这样想：'你呀，你还不配有这份荣幸，趁早还是把那买像框的钱省下来吧。'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她反倒提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最好还是印制玛格达琳娜·列蒂戈娃的肖像吧。"

这绝非故作谦虚。聂姆曹娃早在她初次，也是很幸福的一次居住在列托米什尔市时就亲自认识了列蒂戈娃，并且看重她所从事的工作和她的谨慎、明达，但聂姆曹娃却从来也没有打算去追随和效法她。她认为，列蒂戈娃理应得到那个社会的尊重，她是她们的代表，一个"三月前"[①] 的女性的代表人物——难道不是这样吗？正是这样。她的建议倒使我们产生了把这两位女性来作一番比较的想法。当然不是作为有才华的两位文学家，而是作为捷克文学以及整个捷克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两位典型的代表人物来加以比较。

---

① 指 1848 年 3 月即民主主义革命以前的封建君主政体。

玛格达琳娜·多布罗米拉·列蒂戈娃是一位高级官员、伯爵的女儿,是里赫诺瓦和列托米什尔市参议会考试委员会委员、一位极富事业心的企业家的妻子,她的确是鲍日娜·聂姆曹娃之前捷克文学中颇为著名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一位女性。但那些署名玛丽耶·恰茨卡、弗拉什基米拉·鲁惹奇科娃写给勤劳的女佣们的爱国主义诗歌早已被人忘得一干二净;即使那位具有菩萨心肠的、带有点伤感的玛丽耶·安托涅、修道院的女厨以及劝人为善的短篇《六翼天使》和《迷送香》的作者也不被人记起。也只有一些文学史家才能回忆起点什么来,比如关于那位有天才的女诗人——塞拉涅克、索菲·扬多娃的梦是怎样破灭的;还有以弗朗基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他一直扶持捷克妇女文学——的面目用假名出现的一些评论文章。这个时期里只有唯一的一个女人的名字,至今都还颇有名气,并且远比那男子圈子里许多具有才华、十分显赫的名字还要驰名得多的那便是玛格达琳娜·多布罗米拉·列蒂戈娃的名字了。她的名字之所以流传下来,倒不是作为写给故土的那些姑娘们的朴实无华的短诗或关于阿尔诺什塔、别琳卡以及玛惹奇纳的小篮子之类的令人落泪的短篇小说的作者;而是作为多卷本《家庭主妇》的卷头页上那醒目的作者的名字。

当爆发过革命的法国的德·斯塔尔夫人[①] 正在写作《柯丽娜》以及一位伟大的叛逆者乔治·桑也已经出现的时候,而在捷克的列蒂戈娃夫人却正在给自己的文学巨著列章节的标题目录:烩脑面疙瘩、小肉丸子、甜薄饼加肝泥丸子、茴香勺药花汤、论羊肉、该如何烘蘑菇……

这并非挖苦和讽刺。她恰恰在这方面显示出具有生命力并非偶然。列蒂戈娃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捷克文学中少有的清心寡欲和

---

①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她提倡宽恕、怜悯和正义。她的沙龙成为当时不满政权者的活动中心;拿破仑对此耿耿于怀。她的小说《黛菲妮》(1802)、《柯丽娜》(1807)中带有自由主义和反教会的倾向。

洁白无瑕的典型。这一时期必须完成被中断了的发展；这一迅速发展的结果，几乎导致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能兼有多种思想和艺术主张："狂飙突进运动"[①] 和比德迈尔[②]、浪漫主义以及古典主义、麦克菲森[③] 和海涅[④]。但是，你在玛格达琳娜·多布罗米拉·列蒂戈娃的身上找不出与上述激进的思想、艺术原则有丝毫近似之处，找不到任何复杂性以及任何暗示内心深处的矛盾的东西来。这位端庄的女市民是个地地道道的比德迈尔分子，一个鲜活的比德迈尔的典型；而她的文学创作，她的那些主妇手册，比起当时捷克文学中的任何其他作品来，在反映当时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上，那的确可说是一种比较真实、直接、有说服力的证据。

你只要翻阅一下她的《家庭主妇》或看一看她的一些有关家务的论文，那么，你就会在那里找到对当时捷克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许多真实的描写，但这一切不是用赞美诗或理论的形式，而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描写。从她的这些著述中，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捷克市民的整个精神面貌，而那些被萨宾纳[⑤] 称之为出类拔萃的"意中人"——从 30 年代起，这些人就"预感到进步的精神在迅速有力地发展"，而当这些人所直接给予的影响范围越发狭小的时候，他们的想象也就燃烧得越发炽烈——他们要来塑造、感化这种捷克市民，也就是你在她的书里能很好地认识到那种捷克的庸夫俗子的典型。尽管这种认识是不愉快、不情愿的，但它

---

① "狂飙突进运动"是 18 世纪 70 年代在德国发生的一场文学运动。表现为急迫、迅猛，要冲破旧的樊篱，摆脱旧的习尚，是一批青年人对衰老的陈腐的一切的反叛。

② 比德迈尔是指的那种心满意足，循规蹈矩的老实人对秩序、安全、舒适当作生活理想的心态和精神。指的是一种冷淡政治、疏远时代、宁静安适的文学。比德迈尔文学家笔下的人物多是些清心寡欲、有着克制本性的力量和心中的愿望。

③ 詹姆斯·麦克菲森(1736—1796)是苏格兰作家、翻译家。代表作是古史诗《莪相作品集》(1765)。

④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他向往法国的自由，长住巴黎。代表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创作而成的。

⑤ 卡雷尔·萨宾纳(1813—1877)，捷克文学批评家和歌剧的词作者。

却说明了许多问题：首先，为什么要极力否定马哈[1]的诗歌的伟大的思想内容；其次，为什么丧失了1848年革命的良机；为什么说鲍日娜·聂姆曹娃的出现成为一种根本的转变。

比德迈尔主义者不可能理解——首先他不情愿去理解这种根本的转变。比德迈尔流行的风格是描写琐碎、细小的事情。这是那些尚未成为富豪，但却满怀信心地向自己目标迈进的小市民的主张。保持宁静、满足于事业上的点滴成就、什么东西也不应来惊扰的生活日益变得舒适、安逸，这一切对小资产阶级说来是无上的明智和公民的美德。在捷克，在连瓦茨拉夫·马捷伊·克拉麦利乌斯[2]捷克第一个也是非常优秀的新闻记者——都根本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对它作吹毛求疵的报道的捷克；甚至在最动荡不安、最适宜于行动起来的时刻，却表现出来如何与征服者和平解决争端、需求的捷克；当外面已响起《马赛曲》，而这里的一些诗人还在一个劲地讴歌那风花雪月，颂扬爱情和生活乐趣的捷克——在这样的捷克，比德迈尔所受到的赞颂肯定不会比产生但已逐渐消失了它的国家少。

捷克的小市民感激涕零地将它接受过来，并当作自己审美的法则，当作他们早已遵循的生活指南。小市民寡情少欲，不喜欢激烈的感情，从而在生活与艺术中很少有深入的思考，出现伟大的思想；他只崇拜一成不变的准则、中庸之道和故步自封的人——这种人从不会在任何新鲜事物面前表现出一种冲动、忘乎所以，也从不会去打搅自己周围的人。一切伟大的事物于他来说都是一种妨碍，这事

---

① 卡雷尔·希内克·马哈(1810—1836)被称为"捷克诗歌的施洗者和培育了整个现代诗歌的精神之父"。他的代表作、抒情叙事长诗《五月》(1836)被誉为捷克诗歌中的珍珠。他以浪漫主义的笔调，描绘捷克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反对专制暴政的斗争，讴歌自由理想，思考着生活的意义，抨击那些带着假面具的虚伪、懦弱的人，反对小市民平静的牧歌式的生活并动摇了社会制度所依靠的教会信条。当时一些著名的批评家都不理解马哈和他的《五月》，把他看成一个"浪漫主义的精神失常者"、"一个有失常态的诗人"。

② 瓦·马·克拉麦利乌斯(1753—1808)是捷克启蒙记者，是群众文化工作者的榜样，他通过自己从事的新闻、文学创作与组织工作，懂得人民最需要什么。为提高捷克人民的民族与社会觉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物如果对他有所激怒，他就呼吁上司加以干涉，如果令他肃然起敬，那他也就开始削足适履，化大为小。这个比德迈尔倒真是为他天造地设的。

请看一下比德迈尔的杰作：怎样用安姆比尔[①] 来创造自己"住宅的"文明啊！安姆比尔的富丽堂皇令他羡慕不已，但又却使他有一种望尘莫及之感，这种豪华并非他的财力所及，也显得很不相称。怎么办，于是他就缩小规模，将其雄伟壮观的样式变成一个小模型，满足于用镀金来代替纯金，赤铜代替青铜，橡木代替红木以及窗前用来装饰倒挂金钟的竹竿代替柱子。就那么一小点（你可要知道：这东西虽小，却是属于他的呀），可比德迈尔的这一杰作确使安姆比尔的富丽堂皇荡然无存，但却是那般的温馨、舒适、实用、合理。

正是这种实用性，在住宅方面体现出的合理性才是比德迈尔精神积极的、最完备的表现。在其他各方面，这种恶劣的仿效不仅带来有害的，而且简直就是毁灭性的后果：它不仅将细腻之处缩小，而且变得卑微、琐屑，把轻快变成轻浮，把美好感情变成多愁善感，把理想变成与理念和真理毫不相容的牧歌般的梦幻。

所以在当时的捷克文学里，甚至在捷克所谓的"来自生活的图画"中你都找不到真实的生活。一切都必须是经过梳理、润色，变得甜蜜、伤感、舒适；好好先生之外的任何言论不仅会引起惊奇和误解，甚至会遭到反击。就连以玛格达琳娜·多布罗米拉·列蒂戈娃的主妇手册为代表的这类完全可说是一种实用性的文学里也得格外注意这些方面：一切是否都变得那么小巧玲珑、温文尔雅、甜甜蜜蜜了；一切有伤比德迈尔小市民的听觉和风化的字眼是否剔净了。列蒂戈娃为捷克的姑娘们写书，但她们可不能被直呼成姑娘、少女；而只能是些"亲爱的小姑娘"或"可爱的、媚人的少女们"；她给她们出主意，怎样地出嫁，不是成为一位太太，而是一位"小夫人"；她用了十来页的篇幅描述如何筹办猪肉筵席和她们应该怎样来准备那种

---

① 法兰西第一帝国时的建筑装饰样式。

高康大[1] 和名目繁多的食物，就怎样哺育猪这方面她都能够提供给你一大堆资料来的。在列蒂戈娃那儿，那头圣洁的“猪”被描写成了小心肝似的，把这个小心肝剁成碎肉或肉末，然后将它同白面包揉在一起制出可口的小肝香肠。她把这头“猪”缩小得不能再缩小、稀薄得不能再稀薄，这就使比德迈尔小市民那纤细的肠胃易于消化了。

这真有点滑稽可笑，但你却笑不出来。这或许是一幅讽刺画，但却是那样地忠实于事物的特性，不差分毫，没有夸大。的确如此，19世纪上半叶整个捷克文坛都处于这样的氛围里，每一个创作者也深受其害，都生活在各种被扭曲了的、变态的概念的重压之下。假如今天我们来浏览一下当时的许多著名作品，总感觉它们不太富有生命力的话，那都是受其违反生活规律和自然法则的比德迈尔的深刻影响的结果。这些创作者并非缺少才华，而是那愚蠢又落后的小市民意识将诗一般的思想搅成了一团浆糊，从而使大部分作品变成了仅仅是煮熟了的、平淡无味、引不起食欲的东西。那些什么“小溪流——小脚儿，小星星——小手儿”的语词向你铺天盖地而来，你甚至可以在当时一些最优秀的诗人的作品里遇到它们的！你会怎样地精神抖擞，舒心愉快；你会怎样地感激这样的诗人，如果他敢于明晰有力地说出：手、泉源、星星！然而这样的诗人毕竟太少。对此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力量；需要新生的、能震撼现实世界的力量。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到马哈在那矫揉造作、置若罔闻、冷落的寂静中响起了一些不习惯的、不许说出的话语来所引起的惊恐、误解甚至反抗。

既然连男子要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地打破小市民以平庸、琐屑所编织起来的根深蒂固的限制网都不允许，那么，在个人生活，乃至公开活动中受社会道德规范约束得更紧上千万倍的女人又该怎么办呢！

---

①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角。

鲍日娜·聂姆曹娃有勇气来打破小市民“道德”上的以及文学中的俗套子。然而她遇到的不仅是不理解，而且还有仇根。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同她这个热忱、实在的人形成了一种鲜活的对比，反差极大；她就像一个根本不懂得这一概念的含义的小孩子似的，怀着一种轻快的心情置这种仇恨于不顾，直到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种仇恨的全部意义。但是鲍日娜·聂姆曹娃的痛苦命运——姑且就让我们这样说吧——也正根源于此。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她的《来自多马日利采城近郊的图画》吧！这是第一部捷克现代散文，虽然它还没具备短篇小说那种完美的形态。但已经不仅仅是一部通常所说的那种民族志的论述。这里，聂姆曹娃完全被那充满魅力的丰富情节——描述一位贫困母亲的一生——所激发鼓舞，字字句句都铿锵有力；她不仅以民俗学的搜集家的眼光，并且以一个艺术家永远清晰、新颖、并越加深刻尖锐的眼光来观察一切。她把她所观察到的各个类型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常常用诗一般浓缩、概括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她抓住现实生活中各个插曲、场面，组成叙事来描写，这些描写充满了如此多的事件和对话，以致这些插曲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成为独立的短篇小说（的确从中产生了聂姆曹娃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乡村小景》，它描写一个农妇的悲惨命运）。从《来自多马日利采城近郊的图画》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女作家那颗亲切的、诗人般的心灵，她热爱生活，充满爱心；她不满足于只观察生活，而且她要参加到沸腾的生活中去；她也不只满足于叙述美好的事物，而且也从中感到愉悦；她不满足于仅仅对丑恶加以揭示披露，而且要力图改变它们。

今天我们对此一目了然。

可是一八四六年的捷克小市民却怎么也理解不了。多马日利采的显贵们对她的那些“图画”大动肝火，认为聂姆曹娃是对该城风俗习惯、道德情操的蔑视，是因为她憎恨广场拐角处那座房子里的一位姣好、迷人的贵夫人所致。此时此处他们竟然忘记了自己确定的那些温文尔雅、“牧歌式”的社会生活道德行为的准则，竟对一位

女子大叫大嚷，说他们恨死她了。“除了去乡下外，我哪儿也不去；至于这里的显贵们我根本不屑一顾，都是些小市民！”聂姆曹娃在给自己的女友切拉科夫斯卡夫人信中谈了这些体验。但是那些显贵却不放过她。一天晚上，他们在聂姆曹娃的窗下（窗后面正躺着她那重病的女儿）导演了一场鞭打一只发怒的、大声惨叫的公猫，以此来威胁聂姆曹娃和她的丈夫；他们还写了一封充满仇恨的信给发表了她的《图画》（先在《花朵》杂志发表）的《捷克蜜蜂》杂志的编辑哈夫利切克；他们甚至不惜掏自己的腰包，向编辑先生呈献公火鸡一只，为的是能将他们的信公诸世人，好使聂姆曹娃不仅在多马日利采城，而且是在整个捷克丢尽脸面。

你在《图画》中还真难找到那些会令人大动肝火、暴跳如雷的东西。有的倒是充满了对人的热爱和对其做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和更加完美的人的渴望。也许聂姆曹娃在用多马日利采那些庸人所不理解的另一种语言来写作的吧！

她的的确确是在用另外一种语言来写作！她的作品中的这种叙事语言至今都还令我们喜欢，非常合我们的口味，可对当时的那些比德迈尔的显贵说来却充满了轻蔑的声调。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那种矫揉造作、别别扭扭、变形扭歪了的语言；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明快直爽的语言，不重述旧事物，很能表达出直至那时都还不曾被哪位作家表达过的人和事。

也只有当你真正地意识到比德迈尔派是如何阉割了书面语言使丧失其精髓以及它怎样风靡于前三月时期的捷克市民文学中，那你才能了解，为什么我们常说鲍日娜·聂姆曹娃的那些优美的散文是如此令人难以忘怀的：聂姆曹娃是语言的革命家，她领导了一场文学革命，她比在她之后进行创作的许多人都更为关注文学的斗争性。这一点就足以使她成为现代捷克散文的奠基者。

显然，她在语言方面所完成的变革并非是她的目的本身，就像说话不是目的一样。我们说话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思想。因此，作为表达实用意识的语言是具有社会性的，而且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

展而发展，也就是说它随着人的解放过程一同发展，不断革命化，从而也就不断被丰富起来。你勿需对社会进行多么深入的研究，你可从语言发展的情况里看出任何一个民族社会里自由与不自由的力量的对比关系来。民族语言必然死亡，一旦当它不能直接面对某种显而易见的压迫的时候。只要语言在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停滞下来，那么语言就会变得僵硬，日益衰老，渐趋死亡。新的意识；那种被人们之间新的、逐渐改变的关系所决定的那种新的意识，必须是体现在新的词汇中、新的句子中和新的音调中。这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是需要。

既然是需要，那聂姆曹娃就得寻找新的用语。没有这些新的词汇，她就无法体现出自己新的思想意识来，不能表达出自己新的生活观来。她寻找它们，她在她所紧紧依靠的民间语言中寻找这些新的语汇，因为她的那些新的思想意识就植根于人民生活中。实际上她在继续做着捷克民族复兴时期许多启蒙家的工作，他们曾经在民间语言中寻求捷克语言的复兴，不过聂姆曹娃是更自觉、更高一层地做着这个工作罢了。这完全是另一种语汇。是一种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听从命运安排的、而且也是苦涩的、还十分恭顺但也是很自豪的语汇。若是聂姆曹娃说："谁都不理睬穷人的美德"，那这句话就是直截了当的抗议，就是对常说的那另一句陈旧的、贵族式的宽容的"贫非罪"的一种强有力的挑战。

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全面细致地理解她在语言方面完成的革命，因为那些语汇早已融会贯通于我们的思想意识中了。然而四五十年代的凡夫俗子们却深感不自在：那就是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认为贫非罪，认为贫穷是一种不幸，并且把那些劳苦大众当人看，推崇他们的人品；更主要的是采用了他们的语言——直截了当，少矫揉造作、少圆滑的、且不容许双重解释的——来表现大众思想的，这就更加惹怒了市侩们。他们把聂姆曹娃的一切努力视为一种恶行；一种打扰了小市民逍遥自在的恶行；一种旨在破坏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田园般舒适安逸生活的恶行。



……她在她所紧紧依靠的民间语言中寻找这些新的词汇，因为她的那些新的思想意识就植根于人民生活中。

什么还能比这更令人厌恶憎恨呢？那就是引起这场愤怒的不是一个男人，竟是一个女子，男人的各种古怪行为或许倒还可以被宽恕的。

倾心于牧歌式的生活是每一个小市民的特点。舒适安逸的生活被视为“节日般的生活”——这就是比德迈尔生活的定理。怎么个舒适安逸呢，那就是在午睡用的枕头上绣一对雌鸠。你可得仔细地瞧一瞧这种安逸的生活：供丈夫在幽闲的时光里使用的枕头就是妻子在那些“幽闲的时光”里一针一线、针针线线、仔仔细细地绣起来的。

你只有在比德迈尔的礼拜天里才能见到夫妇俩并排走着。丈夫戴着大礼帽，穿上齐颈高领的衣服，木然地昂着头，这样就可能达到所要求的那种绅士派头吧。妻子穿着下部用硬环撑开的裙子，为的是抑制一下你的步履，好让你显得端庄。两个都同样显得庄严和同样的高尚，因为同样地被捆绑了起来，使其就范似的。你看他们双双对对于礼拜天走在去教堂的路上或者去散步，那是因为他有义务在邻居面前展示他的堂堂仪表。

你在这个社会的平常日子里是绝对看不到异性的两个平等的人走在一起的。你认识一个男人——一家之主、发号施令的种；一个女人——“家神”，忠实的奴仆，家里最值得她留念的就只有那两件东西了：炉子和床铺。这就是她的天地，她的眼界就这么宽。什么其他的、更多的想法都将是有害无益的。做妻子的就是怎么想方设法使丈夫开心了还要再开心。这个社会里的妻子只求知道自己的身子、心灵、道德伦理方面应尽的义务，而不得要求拥有这方面的权利。她是无权的。

显然你在当时的一些抒情诗和言情小说里是读不到的。在那里你可以发现对女性足够多的殷勤、赞美、恭维，这都只不过是种客套、惯礼。被赞美的女情人通常都是作为比德迈尔分子取乐的小美人、彩饰图画、鸽子、玫瑰花或者小天使出现的，丝毫没有实际意义。

但你可以在玛格达琳娜·多布罗米拉·列蒂戈娃那儿找到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可不是在她那些多愁善感、虚无缥缈的短篇小说中，而是在她的那些具有实用价值的家务指南；特别是一些手册的前言中可以读到的。捷克的一些报纸十分赞赏这些手册和前言，说它们充满爱国主义的觉悟、智慧和深谋远虑。这位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妇女界里一位可爱的、值得尊敬的代表人物常常是害羞地说出一条猪的名字来，因为她深怕自己的语气对它是否会显得粗野或伤害，可谈起那被奴役和备受侮辱的女人来，她就显得像在整理什么东西似的，毫不动情，也毫不拘礼节。

“女人是人吗?”瓦伦丁·阿齐达利乌斯在他一五四五年于弗拉底斯拉维出版的《珍奇动物》一书中这样问道。算他走运，他正好在这年死去了，那他就避免了走在大街上被一群坚决捍卫自己人性的女人的包抄、袭击。然而一八三九年一位捷克女作家完全站在消极方面来回答他的问题却没遭到任何反击。玛格达琳娜·多布罗米拉·列蒂戈娃笔下的女人并非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人，就整个人类而言她也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只是一个“不完善的男人”——丈夫的补充；没有自己本身生活的那么一个无权的“附属”。

“每一位年轻的家庭主妇要特别而且可说是首要关注的一件事，”列蒂戈娃在《怎样敬夫君》一章里这样劝解道，“那就是弃其夫君之所憎，存其夫君之所爱。”

请注意一下作品发表的时间，那正是法国革命后的四十年[①] 和汉姆巴什城堡举行大型的五月集会[②]，庄严宣告“妇女的春天”来临后的七年。自由了吗？平等了吗？“您得处处提防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玛格达琳娜·多布罗米拉·列蒂戈娃十分明确地宣称，“即便确确实实是您对了，那您也最好拣些好听的话儿来说……尽量与邪念远一些，千万不可存有违反夫君的念头。”

---

① 似乎应该是1789—1839年即50年。但原文如此。

② 1832年5月27日在莱茵－法尔茨科的汉姆巴什城堡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

妇女的精神教育？无疑的："当她是个女人，她的闲散度日就毋需什么精神，毋需思考，也就毋需在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以及劳动中来完善自己；她只需挖空心思地来使自己的丈夫愉悦……她的日子就像一架催命的时钟，嘀——嗒——嘀——嗒，走向死亡。"

妇女的人类自豪感？列蒂戈娃根本就谈不上她在关心爱护年轻的女友们。她连比德迈尔那块遮羞布都不要了，竟恬不知耻地劝告那些做妻子的，"当您那气度高贵的丈夫"开始不学好，"骄狂自大、虚荣浮华、阿谀奉承，甚至被卑贱下流的荡妇所勾引的时候"，您还要表现得"和颜悦色、细声细气、很有点耐性的小夫人的样子来。如果说您失去了至福安乐的天堂，但至少您还有个宁静的避风港呀，如果说已没有了爱情，那至少也得看在夫妻一场，维持好这个家庭呀。"被叫做畜类的女人是不应该过问自己主人的那些事儿，而她只该力图证实自己有本领，能使丈夫回心转意，能使他找回家来；回到自己曾在别处去追寻而未找到的那个家来。如果这个妻子没有了这点本领的话，那她算活该，那她就得沉默不语，就该努力关怀、照顾好丈夫的那个身子，敬重、赞美、颂扬好自己那"气度高贵的丈夫"——一个追逐荡妇们的丈夫——的那颗心灵。

这就是当时许多"规矩家庭"中的安逸生活。列蒂戈娃也正是为这些家庭写下了她自己的教范。正如她自己所回忆的一种不加粉饰、没有说教、毫无偏见的安逸生活；也是她所力图保持的一种安逸生活。而当时正在为妇女解放作斗争的"青年德意志"在自己许多充满战斗气息的小说和条文里对处于贫困深渊的被奴役的妇女也做过大量的披露与报道，但远没有像这位好心肠的、宽大为怀的妇女领袖人物给女人们出点子、想办法更能吸引读者。

在这里你可以读到一些比较详尽地描写凋零花朵的短篇小说；这是一些无以面对阳光、没有香味、褪了颜色的甚至不会有果实的花朵；是一些忧郁的、个性遭禁锢的女性人物。在此你能见到一幅幅悲惨的画面：她们心不在焉或双手抱膝地坐在刺绣、滚边机旁，梦想着别的什么事情，梦想着人类的、自己的命运。或许在呐

喊，肯定是激愤万状，怒火中烧；或许是嘟囔着一些反抗的话语，肯定会嘟囔的。但是贤惠的列蒂戈娃会对你说："想嘟囔什么您就嘟囔什么好啦，只是您要听听我的话语，我的劝告是最好不过的了，并且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屈服、认输、丢开自己的面子、放弃自己的一切希望、承认自己微不足道，"牺牲自己"。

在她的书里这样一些美丽的词汇比比皆是。当妇女的个性就要从那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龟甲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她要你"牺牲自己"，自我牺牲。这简直是在无耻地滥用"牺牲"这个崇高的概念。强迫妇女牺牲就是牺牲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哪里妇女没有自由，哪里就不是自由的。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个反动的、野蛮的、强盗式的民族运动都是首先侵犯妇女的权利，否定妇女的价值和她们的创造力，把妇女赶出社会生活，打回厨房去，使她们仍处于从属于丈夫、主人的地位。当人类社会约一半被排除于人类社会的创造力之外，这对人类的发展该是多么可怕的障碍啊！当这些女人不得不巧妙地摊开自己的剪裁，为的是在处于须臾的惊讶时就能够在剪裁之下很快地掩盖起自己的罪孽来：那就是她们在偷读狄尔[1]、古茨科[2] 甚至马哈的作品，这对民族的智慧又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当这些妇女的梦想和希望被压制的时候，当不能满足她们渴望参加社交活动的结果而只好在咖啡沙龙里去发泄自己的愤怒的时候，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又该是多么大的扭曲啊！

妻子的理想就是做丈夫舒服的鞋垫子——这并非只是小城市参议员他那日渐衰老了的妻子的一种臆见。这不只是一种心胸狭窄、精神低下的表现。可怕的是，列蒂戈娃在自己许多著述的序言

---

① 狄尔(1808—1856)，捷克剧作家。主要剧作有揭露社会矛盾的《纵火犯的女儿》、《扬·胡斯》、《斯特拉考尼采的风笛手》等。

② 古茨科(1811—1878)，德国作家。以写带有批判色彩和自由倾向的文学作品而受人注目。1836 年，由于他写了长篇小说《多疑的女人瓦莉》(1835)，以"亵渎宗教"、"有伤风化"罪名被判监禁 4 个月。

里活灵活现地推崇这种理想，它真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扬·普拉沃斯拉夫·库贝克是位诗人、布拉格查理大学的教授，也是自己所处时代的先进人物之一，他一直和来自利托米什尔市市民中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观点作针锋相对、毫不含糊的斗争，不只在私下，而且在公共场合，在自己的讲课中、文章以及诗歌里。为了自由，甚至在五十年代那样严酷的反动时刻他也不惧怕表达出自己热爱自由的观点；他以优秀的颂诗盛赞奴隶买卖的消灭，他预言，"我们的世纪对未来做出了保证"，他宣称要砸碎奴隶的枷锁。"强权必将失败，它不能再用陈旧的王笏来振奋正在觉醒的人民"，他满腔热情地谈论着捷克民族应肩负起的"伟大使命——不断地前进，以便抛弃卑鄙的成见……"但是，对妇女的卑鄙成见于他来说却是法律，违反此项法律的事都能触怒他，激起他发表尖锐的言论。他强烈抗议奴役黑人，但同时却也能歌颂奴役妇女。他还喜欢写点什么"丈夫的福气"、"享福的丈夫"、"美梦变成真……"之类的打油诗。

厌倦了荡来荡去的光棍生活
讨个忠实的女伴、多产的母亲做老婆，
她只靠丈夫和她的一大群孩子活着，
像一只小蜜蜂靠着花朵采集自己用的蜜，
是个好仆婢似的女主人，
全是爱、全是孜孜不倦
围着家务活团团转——
就像在教堂里为上帝服务的仆人样，
恭顺、虔诚的好女伴。

的确，她正是许多享福丈夫梦寐以求的好女伴。除了韵律外，他对妇女作如此的赞扬，这与列蒂戈娃的那些忠告有什么区别呢？在这里妇女仍只是丈夫的一种不值钱的附属、补充，仍只可以乖乖

地考虑丈夫的那些无尽的需要，仍只可以围着锅台转以及心甘情愿、殷勤周到的上床去像服务上帝样虔诚地为丈夫服务，她仍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仍然是一个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精灵，她没有自己的意愿，连她的身子也不属于自己，甚至由她生出来的一个个孩子也都不属于她而全都是"他"的。这却是一位先进的男子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其事地在一首反对世界倒退的、十分尖锐的讽刺诗中所说的，这首诗写于一八四七年，即革命的一八四八[①]年的前夜！

但是，就在这样的革命年代——革命气势动摇了王位，也废除了在我国历经了几个世纪的农奴制——却不能改变捷克市民阶层中对妇女仍属奴隶、不是自由人这么一种落后、反动的妇女观。在革命的一八四八年里，妇女们在政治舞台上只有过两次亮相。一次是在这年的三月，那是想用一种温和的手段作用于皇上，求他释放一批政治犯；第二次则是在八月，表示愿意助男人们一臂之力抗议温迪施格伦茨[②]。在这样地表现了之后，她们则立即对自由思想提出了申辩，表现出对它的怀疑情绪来，并明确地指出，她们压根就不愿聚集在一起——这或许是上帝的旨意——"竭力设法为自身的解放而努力"。

这对库贝克来说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喽，他以那个家妇的"理想"的名义，拿起最后的一个小市民的武器向一切具有独立自主和创造性的女子发起攻击：

谁相中了这样的妻子，
而他还去热恋斯塔尔夫人，

① 写在《到地狱去的诗人之路》的诗里，刊登在《跛》上。顺便说说：拉底斯拉夫·克玮斯——《路》出版社的一位勤勉、谨慎的发行者——虽早在1842年就提出创办《跛》了，但那时它多是些具有迫切现实性的一些警句、名言。但这首诗发表的时间决不会早于1847年。——作者原注

② 阿尔弗特·温迪施格伦茨（1787—1862），公爵、将军，曾任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总指挥。1848年6月曾在布拉格残酷镇压革命的起义。

要知道她在作诗，写散文，
还在家里招引一大群友人，
这难道是些有价值的事情？
正经的丈夫吸引循规蹈矩的妻子，
绝不讨任何一个女作家作伴侣。
要知道他喜欢、疼爱的是会干家务，
温顺、勤劳、忠贞像灰姑娘样的老婆，
那游移不定、轻浮无常，
后面还跟着雄性一大群迁徙的鹌鹑似的妻子，
他根本就需要不着……

坚强而充满活力、对世界有足够的了解、博学多才、又因自己进步的观点而为青年所热爱的这么一位捷克文学的教授，对待鲍日娜·聂姆曹娃正在走进那个时代的“妇女问题”的观点竟然与十九世纪上半叶捷克早期的妇女文学的代表——散发着闺房中薰衣草的芳香、手里只紧握祈祷书的小城市的尊夫人如出一辙。

聂姆曹娃的出现像是扔进死海里的第一把火。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妇女的统治观点进行顽强的斗争；抗议妇女的无权地位，决心与一切歧视妇女、把妇女不当人看的观点、行为作殊死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使她成为了第一个真正的现代捷克妇女；但是她却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她进入捷克文坛的最初几步并未遇到什么绊脚石。那是因为她写了一些陈腐的、老调重弹的爱国主义诗歌，当然比起当时刊登出来的许多其他的诗歌要好得多，但仍旧是些模仿、平庸、俗套、缺乏独创性的诗歌，就是最憎恨女人的人也不可能对她的《向捷克妇女发出号召》(是聂姆曹娃写的第一首诗，刊登在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的《花朵》杂志上)提出什么异议来的，因为在那里尽是些快感、愉悦：“教育我们的孩子们，为这个光荣而亲爱的祖国。”在她的《光辉的一瞬间》一诗中提到我国古老的传说中的两个人物“莉布谢和弗

拉斯塔"①,这对那些彻头彻尾的庸夫俗子来说也不会有所妨碍。《我的祖国》一诗也总是带着传统的精神重复道:"我的心献给了一个捷克人/我有一个爱国者的丈夫/我教育捷克的儿童/为祖国献身的儿子们。"

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被允许的。假如聂姆曹娃把自己的热情灌入到去熟识一些爱国团体,同一些先进的作家交朋友的话,假如她就老老实实地去秉承与自己还有点亲戚关系的切拉科夫斯基——"是聂姆曹娃的第一个缪斯"、"他以自己大量优秀的作品来装饰我国的文学"——的文学观的话,假如她迷恋着能使自己迅速得以成名的诗歌这种形式的话,那么在她的生活中就不会遇到如此多的磨难——那也就不会有伟大的鲍日娜·聂姆曹娃了。那她也仅仅是个一般的、平常的诗人,或者会成为捷克文学中的一种有趣的彩饰,但决不会是它的建筑的基石。

但是,就在当时你也已经能看得出她拥有一颗倔强的心灵,充满独立自主性和鲍日娜·聂姆曹娃特性,这已奠定了作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的坚实基础。但这位年轻而姣好的、已经受到人们仰慕的女士并不曾被最初的一道爱恋的光芒照花了眼。在她早期的作品中你也只能找到九首长短不一、韵律不齐的诗。之后她也就很快地放弃了写诗,而且再也没回过头来进行这一体裁的创作了。

如果你将她早期的、远不是具有独创性的一些散文同她的一些诗作加以比较的话,那你就不难发现她为何要弃绝于诗这一创作形式了。诗歌捆住了她的手脚,很难脱俗、创新,她深刻理智地感觉到,自己无力把握好这一文学形式,使之把充满于她整个心灵的东西都表现出来。她认为,诗歌于自己来说像是个斜坡,她会沿着它

---

① 在捷克古老传说中,莉布谢是一位仪态端庄、美丽非凡、聪明睿智的女大公,她按照神灵的启示,把一直由她管理各个部族的统治权交给了一个男人——她的丈夫普热米斯尔,从此他的儿孙们就永远统治了这个国家和所有的部落。弗拉斯塔曾是莉布谢的主要侍从。她是"姑娘之战"的指挥。她号召所有的妇女,丢下家务,迅速组织起来,同男人作战,好让女人仍像莉布谢那样来治理国家,让男子俯首听命,扶犁耕地。

不断地滚向旧事物。因为沿着斜坡滑本来就是一种比较舒服，而且可说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事，但这决非她的初衷。她决不满足于廉价的文学成就，因为文学于她来说决不是一种装饰、点缀，而是生活的需要。所以她也就走上了创作能使自己在其中自由地、舒心地谈话的新的散文的道路。

很快地在她的第一批散文——第一批童话故事集，也就是对新道路的探寻——里就包含了你在她的诗歌中无从找到的东西：想象力，新鲜的、充满感情的表达以及并非那些飘飘然而是扎下深根的词句。这时可说你才刚刚开始认识了人们所谈论的那个女子。这个女子开始了走自己的路，——但也就立即遭到了反抗。

第一批童话集出版了。评论它们的文章并不多。只有捷克文学中的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亚库布·马利对它们倒是给予了足够的关注，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否定这些童话的价值、意义，批评它们缺少童话本身的那种魅力和色彩，并把它归罪于童话的作者为了渴求妇女的解放所为。

当一位反动学术权威担惊受怕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之敏感。他就像摄影用的胶片似的：立即感光。假如没有亚库布·马利的这种感光性，或许我们不会全面意识到，在这第一批童话集中那"富有魅力的理想主义"里，在那变幻莫测的惊险故事的情节中和那神奇而绮丽多彩的描写中，妇女的那颗对自由的强烈渴望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流露，在这些童话里妇女被表现得是那么的积极和富有创造力；在这些童话里，除了爱情牵制着男女之间的关系外，你很难找到别的什么准则来。这些思想是含蓄的，包藏在童话那五光十色的外衣之下的，还是些不定型和不成熟的，但是你在这里瞧见了未来的种子，它将开出鲍日娜·聂姆曹娃的妇女观这么一朵英雄之花来的：一个有进取心的女子、一个摆脱了服侍丈夫的、女仆式羁绊的女子、一个作为真正的人的女子。

十二年后，她在给自己的丈夫的信中赤裸裸地、真诚到有些粗鲁地解释在那些童话里、在那些天真幼稚的想法中埋藏着的那种思

想的发展与成长：

“在我青春年少时，我的心灵就一直渴望受教育，渴望在我周围——在庸俗、粗暴面前那种丑恶里的、看不到的那种较为崇高、较为美好的东西。这是我的幸福，但也是我们破裂的原因，也是我的不幸……很少有哪个女人像我曾经以及现在那样保持着夫妻之间的那种相敬如宾的状态，但是生活的漩涡早已将它荡然无存。何处能寻觅到它呢？——全是些谎言、欺骗、特权、受奴役、强制性的义务——一句话，全是庸俗。——我的心灵渴求成为一颗非常被人爱的心灵，我需要爱情就像花朵需要露珠一样——但是我徒劳地寻求我自己感受到的那种爱情……您拥有我的身子、做爱的义务、我的诚意，而我的渴望却带着我继续往前追寻，但走向何方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独立自主的人的生活意义。她在宗教里寻找。她没找到它。她在为民族服务中寻找它：“我曾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里，我以为这样就能满足我的渴望，然而并非如此。”自觉的民族的属性于她来说只是为努力争取更高的东西的前提。她曾在自己个人感情的历程中寻找过生活的意义，她也曾真心真意地谈论起自己的一些心上人，但是，她的那种渴望不曾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得到回响。

“这渴望留存在我的心灵中，它像露珠一样，既不会干涸，也不会流走，而是永远像钻石般闪烁；这就是对真、善、美的无尽的渴望：这就是把一个人从尘埃中拔救出来的渴望……这渴望同爱情连在一起；同真正的爱恋连在一起的，这种爱不仅对某一个具体的人而言，而是对每一个人，对整个人类的爱，这是一种毋需回报的爱，是一种完全有赖于自己本身的付出，努力地去使一切变得更加美好以及真正地彼此变得亲近起来的爱，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人间乐园，我的幸福，我的目的。它给我力量，它给我幸福，而没有了这样的爱，那我岂不枉为生灵了吗？”

这确实不应是一个卑恭的女仆式的妻子对其主人式的丈夫所说的一些话语。

在聂姆曹娃那儿很少存有那些妇道人家的爱情观,或者对爱情充满一种神秘感以及追求一种想入非非;甚至是十分荒谬的男女平等观。聂姆曹娃所渴望的东西是远为伟大得多的:那就是妇女要直接参加建设世界的权利。也就是参加到男人为自己保留的那个最为伟大的创造性的事业中去。

她不想贬低男人的作用,不想接过他们的职务或与他们分享之。她也不是想把阴性变成阳性,相反的,她要大力发展女性事业。她不愿自己像是个男人。她只想与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

首先她的要求不是盲目、狂妄的,她不只是为了改善妇女们的生存状况,而是为了全人类,包括男人们都能更好地生存。她表现出高度自觉的、真正革命的观点,她认为,只有男人和女人们共同的努力才能使世界这个大家庭日趋完美起来;她认为,一个不理解妇女解放的意义的男人所说的自由完全是在那儿侈谈、多余的话。

关于"妇女的不觉悟"——请你读一读她的中篇小说《山村》吧:"还是同一个涅墨西斯,她可以一步不离地跟着丈夫一块在田里耕种,她不停地冲刷丈夫脚下粘上的泥;她也可以毁掉他的住宅,把他的粮食烧成灰烬。妇女如不觉悟就是丈夫自作自受的鞭子! 只要还没有出现有觉悟的妇女——她了解自己崇高的地位和使命的时候,那上帝就赏给她一条鞭子,将丈夫在松软的沙滩上建立起来的幸福毁灭殆尽。因此丈夫必须争取妻子成为自己事业的合作者,如果他想这座建筑坚固、完美的话……"

这样如此明确的观点在我国,在聂姆曹娃之前是不曾有过的,更何况她是用一种征服者的、具有某种进攻性的语言来反对所有以前的妇女观。正确的妇女观不可能产生于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而是在她死后不久,即九十年代才出现了社会主义,这才有可能产生正确的妇女观。然而聂姆曹娃的那些思想是坚定的、明确的、有根底的。在《山村》出版的七年前,她在给克拉采尔的许多书信中以及她在自己的文章、作品和信札中都有过明显的流露。

对聂姆曹娃来说她不只停留在美丽的幻想中,她是一个具体

的、实实在在的人。她不仅幻想,而且也追寻。她不仅热切希望,而且也实践。因此在她的生活里就充满了太多太多的事件,而她的作品就是这样地与她那丰富多彩的生活密不可分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地成长成熟起来了。

她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对妇女权利的一般认识,同时她也寻找男女平等的现实生活基础。然而她却未找到问题的根源:比如能使妇女从苦难不堪的境地里解救出来;使其自身生活比较自由的前提仍是一个经济独立的问题。另外,平等的权利必须有平等的前提条件。她知道,在平等权利上妇女如果没有像男人那样做好思想准备的话,那么,关于男女双方平等权利的一些最激进的言论那都只不过是一种嘲笑、奚落而已。所以对她来说妇女教育是妇女解放的关键。

就说教育吧——作为有觉悟和人类解放的前提的教育(请注意,在这方面她是怎样与萨宾纳亲近起来以及怎样直接关注他的《精神的共产主义》一书的)——特别是妇女教育,成了女作家在其作品里经常反复表现的主题:在《来自多马日利采城近郊的图画》、《外祖母》、《山村》以及在许多书简和来自斯洛伐克的一些文章里,在芭鲁什卡[①] 这一形象的塑造中……无处不在探讨这一主题。《教师先生》这整个短篇就是表现这个主题的。聂姆曹娃自身就存在着受教育的问题。"假如我们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是某种别样的人了。"她在给堂妹弗·菲尔比科娃信中这样说道。"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能系统地受教育",她在给切拉科夫斯卡娅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亲爱的伊万,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否则我能写出比现在更加优秀得多的作品来。"她向赫尔采特写道。"我知道的这一切都是我如此努力、艰辛地达到的,对于这一切我只感谢我自己本人。"当她补充这几句时,她的话语中响彻着骄傲的、同时也是控诉的声调。

如果你将聂姆曹娃给自己提出的各种伟大任务同她为这些任务

---

① 芭鲁什卡是《外祖母》一书中外祖母的长外孙女,也就是聂姆曹娃本人。

作准备而接受的学校教育——她只上过小学和缝纫训练班——作个比较的话，你会明白她为何如此不倦地、顽强地反复强调作为妇女真正独立自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对受教育的要求：在客观地阐述这一要求中注入了自己那丰富多彩却又是万般艰辛的个人经历。

所以她毫不妥协地要求受教育。她从来就不是指的任何一种教育或任何一种学校。她想象的学校应该是一座精神的武器库，在那儿孩子们和青年人都能学会认识世界，武装起自己为"无限美好"——全是些自觉的、优秀的人物生活的世界而斗争。她希望的这种学校能是真正进步的、能启发教育人的、开放的学校，而不是那种确立、加深成见以及无权和不自由是天经地义无可更改的学校。她几乎可说是这种口号的作者了，那就是说捷克孩子属于捷克学校，但她同时也毫不犹豫地说了："当他的灵魂有疵，不管他成了捷克人或德国人，那都无关紧要的……"她憎恨耶稣会的教育制度：培养"上流社会"的千金们成为一个个的花瓶、为教育而教育的荒谬思想、"脱离实践"即学校与生活脱节现象[①]。她总是为能够给新的人类培育新的人的教育思想魂牵梦萦。

在此聂姆曹娃不仅热心追求生活的实践，而且要努力改变包围着她的社会。这又是一种战斗，就像要使妇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样也要使孩子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一种战斗。她与此紧紧相连。她不承认丈夫对孩子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是他的私有财产，就像她不承认妻子是丈夫的私有财产的一部分一样。这意味着向"统帅、司令、主人"发起正面的进攻，要把妻子、孩子从他的手中解放出来。

鲍日娜·聂姆曹娃的叛逆精神在这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和彻底了。这种叛逆精神具有很深的生活基础，但也给她带来了最大的不幸。

"危险的妖妇，恶劣的母亲"，一八五七年在警察署的报告中就

---

① 她对理科学校的看法很独特，她认为理科学校的意义在我国没有被充分的理解，普遍地低估了它的存在，被认为只是个"蠢驴们的藏身之处"，连古捷克语都不学习。相反，聂姆曹娃却非常欢迎它的存在，认为应发挥它的"活力"。——原注

是这样来描绘她的特点的。虽然巴赫反动当局的警察署与捷克资产阶级以及他的一些文学代表人物的政治观可说是大相径庭的，但上述那个警察署对聂姆曹娃的描绘却使他们双方的观点一致起来了。当时几乎整个捷克上层社会，从咖啡沙龙里那些遗老遗少、娇女艳妇到那个进步的库贝克诗人、教授就是这样来看聂姆曹娃的。聂姆曹娃成了咖啡晚会上那些诽谤者不可多得的、可以放肆加以中伤的对象。库贝克则很明显地是由于自己那愚笨的关于对贤妻良母的歌颂和唐璜式的女作家们的痛骂才要与聂姆曹娃针锋相对的。由此可知，那些富有的爱国主义者对聂姆曹娃变得一贫如洗的遭遇持令人吃惊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就比较能理解了，他们对聂姆曹娃的那种“自由的品行”表示出道义上的气愤也是“比较能解释得通的”。

这里留存下来了这么一些材料：关于一位叫什图列茨的神父表示愿意给聂姆曹娃以基督的帮助，如若她弃绝自己那些罪孽的观点的话；关于聂姆曹娃同卡罗琳拉·斯维耶特娜[1] 分手，那是因为卡罗琳拉对聂姆曹娃与本德尔[2] 的一般交往表示看不惯、气愤；关于那六把精致的咖啡匙的事，那是库妮佐娃伯爵夫人为聂姆曹娃赠送给她《外祖母》一书而回赠给聂姆曹娃的礼物，据说伯爵夫人还对聂姆曹娃进行了一番道德说教，并让她收到这六把小匙后，应立即将它们带回到自己家去，不要将它们放在自己那些男友处超过一夜的时间；关于那大量的谰言：捷克爱国主义者协会对那些诽言很感兴趣，常常用它们来开心、消遣，但同时他们又请求她的宽恕、原谅，说他们未能接济她，当她生活贫困到极点的时候；关于聂姆曹娃“把一个富有的俄罗斯人诱入到自己的网里”而后将他榨干了[3]；关于她依靠

---

① 卡罗琳拉·斯维耶特娜(1830—1899)，捷克女作家。

② 瓦茨拉夫·切列德·本德尔(1832—1870)，捷克作家、诗人，普希金诗歌的译者。他教聂姆曹娃俄文。

③ 约·瓦·弗里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杜撰的俄罗斯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那位善良、亲切，时而拥有大把大把的钞票，时而又寄人篱下的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空想主义者——学生和编辑的本德尔，他教聂姆曹娃俄文时就只请喝一杯茶或午餐后的一点残渣剩饭。——原注

一些土生土长的爱国主义者，把他们尊崇为学术和文化的寨主、权威；关于伴随她的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的那些谰言是怎样地消灭了她最后的创作的希望——这些以及另一些被保存下来的材料表明了，鲍日娜·聂姆曹娃周围的人是怎样来看待和理解她关于自由妇女的努力。

"在我的头上仿佛笼罩了一大块云，像夜一般漆黑而又沉重，它仿佛越来越向我重压过来，直到将我压得粉碎。"捷克国土上最乐观、正直的灵魂之一的她在自己凄凉的当儿曾发出过这样的抱怨。

聚在她头上的云是那样的乌黑而沉重……这不是"命运"，这是仇恨。这是市侩社会有意和无意的仇恨，因为聂姆曹娃打碎了这个社会里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剥削被压迫的妇女。她在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这方面的积极性是不曾被当时的那些先进人物所理解。她的那些精神上的至亲以及她认为是些崇高的人——其实高贵也是相对而言的，是根据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对她也表示出了愤慨。（理由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为什么卡·雅·爱尔本[①] 也开始回避、疏远聂姆曹娃。爱尔本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好人，他尊重聂姆曹娃的艺术。他力图向申贝尔解释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小心，但他却是自作自受、自己玷污了自己。他不是一个胆小鬼；他既然不怕去看望从布里克森归来的有病的哈夫利切克[②]，那就不会怕去看聂姆曹娃的。更有意思的是，一些文学史，甚至还有某些蹩脚的小说对此就是这样来描写的：常常就把鲍日娜·聂姆曹

---

① 卡雷尔·雅洛米尔·爱尔本(1811—1870)，捷克诗人。毕生从事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歌曲、歌谣、神话和传说故事。编有《捷克民歌集》以及斯拉夫各民族神话和传说故事等。他的代表作民间故事诗《花束集》(1853)反映了捷克人民的生活和风俗习尚，描绘祖国的锦绣河山。由于他的诗作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朴素，音调优美，《花束集》成了捷克诗歌的典范，对捷克诗歌的发展影响很大。

② 卡雷尔·哈夫利切克·波罗弗斯基(1821—1856)，捷克讽刺诗人、新闻记者。捷克各种报刊杂志的编辑、主编。曾因积极参加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而遭迫害。他被誉为勇敢的民族战士。当他去世时，聂姆曹娃不顾警察的禁令，向诗人献上荆棘花冠。他的主要诗作有政治讽刺诗集《蒂罗尔的挽歌》、《拉弗拉国王》以及《圣弗拉基米尔的洗礼》和许多政治短诗。他的诗针砭时弊，笔调辛辣，诗语朴素、生动，受捷克民歌影响尤深。

娃的丈夫约瑟夫·聂麦茨描写成是她悲惨命运总的根源，而且责难他，说他不理解聂姆曹娃，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他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一位极其平常、普通的男子，他比起自己那一代人，精神境界似乎还比他高一些的人来，他还算是比较理解聂姆曹娃的。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聂姆曹娃的确不是一个“理想”的妻子，他的夫妻生活是不幸的。与其说他比较耐心和勇敢地容忍了这种夫妻生活，不如说更多别的人也都在容忍嘛。把不理解的“罪责”推给他，这意味着甚至今天都还没理解鲍日娜·聂姆曹娃这个人物的根本意义所在。——原注）

他们从不像她那样善于思考和感觉。

他们对她物质上的贫困常常抱以诽谤的目光去看的；幸灾乐祸多于同情。一些人不帮助她是因为她是他们的敌人，而另一些人则是因为他们要把她的生活极力往类似一部爱情小说上引；往一部轻率、鲁莽、不假思考、即景生情、太多责难的一部小说上引。他们努力设法使她的一生变成一个人的一部命途多舛的悲剧，就像聂鲁达《小城故事》中的那篇《她给一个乞丐带来了毁灭》① 中那种风格的人的悲惨命运一样。

然而这都只是些次要的现象。鲍日娜·聂姆曹娃悲惨的命运的实质根由是一位叛逆者和落后的捷克小市民社会的矛盾冲突。

聂姆曹娃本人也了解这一点。她知道对她的敌意及其原因。但她距投降却相去十万八千里。在上述引用的给丈夫的那封信的末尾她表达了自己要争做一个女人——人的强烈愿望：

“但世道对此是不会称赞你的；我知道这世道是要非难一个人心中那最美丽的东西；他们视自然天性为罪孽。谁要不和那社会畜

---

① 扬·聂鲁达（1834—1891）是19世纪下半叶捷克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诗人、小说家。他最著名的是一本由13个篇幅不等的、以回忆往事特别是他的出生地——布拉格的小城区的林林总总的基础上写成的《小城故事》（1878）。《她给一个乞丐带来了毁灭》是其中的一篇。一位女乞丐在追求一位男乞丐未果的情况下，恶意散布了许多谣言，不管多么荒唐和无稽，但在那庸俗、狭隘、保守和愚昧的小市民居住的小城区也很容易找到市场。这个男乞丐就是被那些谣言逼上绝路，冻死在街头的。

群一起只向食槽冲去，那他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每一个这样的人都要成为殉道者。但是做一个这样的殉道者却远比做一个好吃懒做、不知究竟为什么而活着的废物强。”

警察对鲍日娜·聂姆曹娃的暗地监视，她丈夫在职务上的失意，她在把荆棘花冠摆在哈夫利切克的灵柩上时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她那被解释为大大咧咧但又小心翼翼的人的那种有骨气——这一切成了小市民社会谨防与这个被糟踏到如此地步的女人发生任何牵连的有利借口。你只要稍加仔细地看一看，你就不难看出，鲍日娜·聂姆曹娃实际上是被从这个社会排斥出去了。

但不管怎么说，你从不会瞧见她仅只孤身一人。假如你要在19世纪上半叶的捷克文学中去查找一下社会主义的源流的话——遗憾的是一股很小且常处于断流的窘境——你一定会在离鲍日娜·聂姆曹娃不远处找到它。她本人具有一种吸引力，她对那些思考过、幻想过更完善的人类社会制度——没有侮辱、没有人上人、没有劳苦大众的贫困——的人充满吸引力。社会正义的乐章时而强烈时而低沉地在他们心中响起的那些男人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女友，不管这些男人们他们彼此在年龄上或生活方式上有多大的差异。比尔森的一位僧侣约瑟夫·弗朗基谢克·斯麦塔拉，他是劳苦大众的一位好心肠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对世俗不公的刻薄的抨击者；卡雷尔·萨宾纳是马哈的朋友，是一八四八年的工人们的代言人，捷克地区工人运动的先进分子之一；来自布尔诺修道院的一位富于幻想的弗朗基谢克·马杜什·克拉采尔是出版第一本捷克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书的人；年轻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约瑟夫·弗利茨，他有着异乎寻常的革命思想，愤怒地拒绝做捷克官方的政客整整达十年之久；还有那被遗忘了的扬·奥赫拉尔，一个文学批评家、民族工商业者，是我国最优秀的、最早熟悉外国的有关社会主义这方面理论的人；沃伊达·纳波斯特克是美国西北部地区社会主义工人联盟的奠基人——上述这些人你都能在鲍日娜·聂姆曹娃那儿遇到的。

在一八五三年警察署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到："约瑟夫·聂麦茨他那个好想入非非的夫人鲍日娜"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那次悲伤的纪念会和激进的学生们在赫列比举行的"喧闹的游行"。尼姆布尔克的太太、夫人们之所以排斥鲍日娜·聂姆曹娃，那是因为她同女仆们平等交往，把她们当人看待。多马日利采的抗议者们反对聂姆曹娃，他们极力向哈夫利切克进言，说她是一位"不体面的女人"，因为她交往的都是些粗俗的女工和下等的农妇。在到处都在列举她的罪过之时，你就会看出她的社会属性来；她把自己列入其中的那个社会属性。这个属性确立了她在捷克文学中的地位。

青春就是她的社会属性。真正的、有见解的青春；还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及其使命的那个社会阶级的青春；蔑视那一切卑鄙、落后、倒退的战斗的青春；直向希望的未来奔去的勇敢的青春。老一代作家中只有聂姆曹娃一个人参加了弗里奇[1] 主持的《拉达·尼奥拉》文艺丛书的工作，这是五十年代文学与政治上采取的最为大胆的措施之一。以哈列克和聂鲁达为首的年青的一代——出版了自己纲领性的《五月》丛刊——立即宣布加入这一行列。这一代所进行的反对寄生性反动文学的坚决斗争表现为捍卫聂姆曹娃早在十年前所坚持的思想：充满生活气息的诗歌和诗歌应与生活紧密相连。这也就确立了聂姆曹娃在捷克文学中的地位。

一八四八年这个年头使捷克知识界和捷克文学里截然地划分出两类人来，一类人了解到或者至少感觉到必须利用这种革命的形势；另一类人是不理解这一革命的形势或者在工人阶级面前惊恐万状，惧怕革命斗争。当伟大的革命运动遭到镇压从而进入到十分压抑的一八五〇年的时候，这个年头又把捷克文学界的代表人物更加彻底地划分开来了：一类人是见风转舵，他们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

---

① 约瑟夫·瓦茨拉夫·弗里奇(1829—1890)，捷克诗人、文艺工作者、政治活动家。19岁就成了1848年革命事件的领导人之一。他曾被捕，在监狱里呆了18年。他的作品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的理想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拉达·尼奥拉》(1855)是一部文艺作品选集，当时许多著名的诗人、作家、文艺批评家，包括聂姆曹娃都给它撰稿。

的自由主义思想或者甚至是非常激进的青年德意志的进步性，这一来他们不仅丧失了创作路线而且整个的创作能力也都丧失了——比如瓦·博·内贝斯基①。另一类就是后来被流放到奥洛穆茨或者是科马尔诺的人。尽管五十年代出现了捷克文学的停滞，但很快就被弗里奇的文艺丛书《拉达·尼奥拉》和鲍日娜·聂姆曹娃的长篇小说《外祖母》所打破。前者可说是一个年轻的暴动者暂时从监禁中释放出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准备了这部具有抗议性质的文艺作品选；后者却是一个妇女的成熟的作品，这个妇女的整个一生可说都在竭尽全力捍卫那些从来都不曾被描写过的人们的思想。捷克的小市民好像生来就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儿子的，他们常常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手段来阻止事物的发展，他们产生不出伟大的作品来，于是他们便把庸俗的印记盖在他们把持出版的一切东西之上。然而战斗的精神，为新世界而战斗的精神，尽管处于革命失败后受压抑的氛围中，但它仍然表现出不退让、不顺从，完全不会丧失其创造力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在聂姆曹娃的作品里有深刻的体现，从而确定了她在捷克文学中的地位。

这样一来，我们已经超出了将鲍日娜·聂姆曹娃这个特殊人物与玛格达琳娜·多布罗米拉·列蒂戈娃作为那个时代的妇女代表人物去进行比较的范围了。她们之间的区别已不是说这两个先进的典型谁个最先进、最优秀的问题，而是伯爵——长官的女儿和长官的马车夫的女儿、那个最清楚自己地位的、世代为纺织女工的长外孙女之间的区别。

住在列托米什尔市那幢房子里的夫人的确是一位受人尊崇、虔诚而明达的人，她也确实知道一些有关劳苦大众、有关贫穷并非丢人或者贫穷就会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这类许多充满智慧的谚语。然而她确要常常提醒自己的一些读者，要怎样地“在那些卑贱的、衣

① 瓦茨拉夫·博列米尔·内贝斯基（1818—1882），三月前时代的一位浪漫派诗人、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西班牙以及现代希腊诗歌的翻译家。

着褴褛的织布工的缝制品面前来监督好那些纱线"。可她就从不出这样的点子，比如怎样来避免那一把把精美的银制的小匙不会被出没于咖啡沙龙的她的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的女友们中那些"窃癖"者面前丢失呢！聂姆曹娃对待穷人的态度与列蒂戈娃是根本不同的。聂姆曹娃认为"他们那颗在粗布罩衣里跳动的心比起许多裹在华丽服装里的不知要高贵多少倍！"她对高尚与否有着与当时流行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观点。聂姆曹娃和穷人的关系并不是绸缎与破布片的关系，而是一个衣着褴褛的人和与她相似的人们的关系。她不仅感觉到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而且她也和他们一样。在她的《外祖母》一书中的公爵夫人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她就博得了作为该书作者的影子的芭鲁什卡很大的尊敬。然而从山区来的纺纱工的外婆却以无比高尚的道德精神力量压倒了现实生活中的主人公爵夫人；公爵夫人的生活常识、民众的智慧远比外婆要差，如果说她做出了什么好的事情来，那都是由于外婆的干预。因为"这位夫人压根就不知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她要独自地来办一件好事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知道，同谁去商量，她也不知道，劳动的外婆所知道的一切：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创造生活的价值，什么地方比如怎样着手工作。公爵夫人与外祖母之间的这种对比、区别，对什么是高尚、贫穷就会犯罪这类问题就非常地具有说服力了。

在这位女作家的世界观的基础中有着她所处的社会的各种矛盾。她从来没有仅只看到贫穷，而她总是也发现和贫穷相反的一些东西，并且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说聂姆曹娃瞧见了"父母带着衣不蔽体、冻得颤抖、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们，他们狼吞虎咽地喝着毫无油水的糠皮汤——任何一个老爷宠爱的狗都不会吃这些穷人不得不吃的东西——而同时父母却还得恳求上帝第二天能再赐给哪怕微不足道的一点儿收入，好让他们能再有一点这样的汤喝"，那她就会立刻想到"那些把乡村抢劫一空的高利贷者"、"在无聊的娱乐上肆意挥霍的财主"、"从摇篮时候起就在奢侈与高贵中教养起来的名门贵族"(《来自多马日利采，Ⅲ》)。她说得再清楚不过

了："一部分人靠提高物价成了暴发户而越来越富，那另一部分则肯定越来越穷，陷入绝境。"（《庄园内外》）

这一主题在致卡罗琳娜·斯塔尼科娃的信中（一八四八年三月3日）表现得最为鲜明，这封信不仅是一个证据，证明鲍日娜·聂姆曹娃以对比的方法来理解世界的原则，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你根本就想象不出劳苦大众是多么的贫困啊。请相信我，任何一个老爷宠爱的小狗都不会吃这些穷人不得不吃的东西。但就是这样的食物他们有的也不多。有多少金钱浪费在各种愚蠢无聊的事上，有多少金钱在打牌时输掉，又有多少金钱挥霍在漂亮的装束打扮上，而有的人却在饿死！——啊，正义！啊，基督的爱！——看到了吧，这就是要改善人类生活的进步业绩！——每当我思考着这一切是怎么安排的，而这一切又应该是怎么来安排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欲望攫住了我，到那些不幸的人中间去，给他们指出需要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正义。当狗被锁链缚着，扒手就喜洋洋，一旦狗挣断了锁链，扒手也就该完蛋！"

这封信是聂姆曹娃于一八四八年三月初寄自弗谢鲁勃的。但是这声音是在这年的降灵节，是在布拉格的工人们正在修筑防御工事的情景下响起的，像是对巴黎的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种回响。这就不是打某个地方抄来的、或从某个远处听来的口号，这口号早已在她的心中升起，并引导她沿着防御工事的捍卫者所走的思想道路前进，这口号对那些捍卫者以及对她来说都是一种社会意识升起的表现。

这种充满阶级的觉悟和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在她的心中更高的升起了。当布拉格的一些诗人在朗诵热情洋溢的颂诗或者在"自由"的猛烈冲击下表现得惊魂失魄、灰心丧气的时候，而聂姆曹娃却给萨宾纳办的《捷克蜜蜂》杂志寄去了《农村政治》一文：

"我该怎样来描写舒马瓦地区是如何亮起来以庆祝地方立宪制的诞生的呢？——各个城市狂喜欢跃，教堂的仪式更是庄重，全副行头装戴的士兵组成仪仗队神气十足，一个个颈上结着彩巾，胸前

别上红花，唱呀，跳呀，各个城市都得张灯结彩。就连那最穷的一位房客也必须张灯结彩，每户窗前至少要点四支蜡烛——必须这样做——要知道这是警察局局长大人的命令，否则就砸了你的窗子。——'是呀，我必须买四支蜡烛'，一个脸色苍白的工人对另一个工人说道，'但是我整个财产还不到九个克雷伊察尔[①]，假如我就买一个克雷伊察尔一支的那种小蜡烛的话，就得花去四个克雷伊察尔，那我也就只剩下五个了，而我今天还得用这几个小钱给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买吃的充饥呀，而明天也许我还是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老爷们不给穷人们买蜡烛的钱呢，当他们想要张灯结彩来庆祝？——这自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它既不给我们带来面包，也不给我们找到工作。'——'我想，它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这另一个工人反驳道，'据说粮食税将减去一些，那价格很快就下来了，之后关于穷人们如何获得物质生活保障和工作的问题也就提上日程了。你瞧，自由这玩艺不是已经派上用场了吗，你不必惧怕开口说话了，现在你就能够表示出点什么来，当你受到冤枉的时候。'——'上帝是听不到狗吠的，这点请你好好记住。至于说到那工作嘛，那你也只好等着，等到老爷们想来关怀我们的时候。你说，我们到底获得了什么。粮食税是减少了一些，很多是不会的，少得你都感觉不出来。我们倒可能会有很好的感觉，如果把那些靠穷人们手上的老茧发财的放高利贷者监视起来……到底有谁在关心穷人呢？没有谁；让他饿死好了。'——在这些交谈中所包含的苦痛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尽管这两个工人是如此这般地交谈着，但其中的一个还是买了几支蜡烛，把它们放在了窗外，为的是不至于让警察老爷将玻璃砸碎呀！——可到了晚上，当一些行人打他的窗前走过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笑话这几支小得可怜的蜡烛，然而却不曾有哪个去想一想那个摆放蜡烛的人，去思考思考在那窗子后面的那间潮湿、阴暗的屋子里还坐着五个忍饥挨饿的人这类事……"

---

① 奥匈帝国时最小的钱币。

从这段意味深长且又典型的摘录中可以看出：对聂姆曹娃来说，这部伴随着穷人的苦痛的宪法究竟是些什么？她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捷克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按理说，聂姆曹娃她那颗激动的、渴求自由的心灵似乎应该为宪法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呀；但是她却看见了贫穷；看到了宪法所不曾触及、压根就不想解决的贫穷问题。这在当时，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捷克作家中还不曾有谁像聂姆曹娃这样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一个普通工人对贵族老爷式的自由的看法。这在我国实属真正划时代的见解：来自彼岸的见解。

聂姆曹娃虽然不是一贯地，但却是经常地意识到，她是以另一种眼光——和她同时代的文学家们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同时她也了解为什么会如此呢：

“如果说我们是一群乞丐，那么世界对我们说来也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这在我国也是实属罕见、前所未闻的见解了。这也可说是下述认识的一种诗一般的诠释：社会存在决定一个人的意识，而存在完全是生活的现实的、物质的过程。世界对所有的人来说并非都是一个样子，之所以如此，并非人们对世界有各种不同的想法，而是由于人们的看法是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再现中的各个发展阶段。

她的那种壮丽的直观也已经将她引导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极限。而要继续奔向那彼岸，那只有靠认识；靠对社会更深层次的认识来指引了。

而现在是应当来看一看鲍日娜·聂姆曹娃身上悲剧性东西的时候了。

聂姆曹娃所获得的那些知识应归功于她自己的直觉。她反映一切只要自己能感觉到的东西。她体验到一种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没有人能够对她讲的，也是没有哪个地方能使她读到的——这倒不是由于尚未有人表述过这些思想，而是不允许她去接近这种思想。她拥有神奇般的直观这种像是天赐的礼物，但是只用它或靠自

己本身所拥有的那种素质是不能达到目的的。现在我们得回过头来谈谈她的一些抱怨和对受教育的渴望。而问题就在这里，那就是她的知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之间的距离，这也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她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知道，我认识了解的东西是那么的少，在知识如此贫乏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有所作为"，当一八五六年《外祖母》出版后，她在给赫尔采列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每当脑子里出现各种伟大的计划，比如写些个大部头的东西，但立刻就会受到来自知识不足这种致命的伤害和打击。"

当时我国没有一个作家不是中学毕业的。正规的、古典的教育是从事文学活动的先决条件。仅受过小学教育，但被公认为是最有才华的人，如弗朗基谢克·赫拉德克，一个织布工人、木刻匠——要在诗歌界崭露头角也都是困难重重的。而聂姆曹娃是个自学者，你要记住，她只上过小学和缝纫培训班，但她却成了捷克近代散文文学的奠基者。

这是一种战斗的精神、英勇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她冲破重重困难向前迈进。当她已经成为一位捷克的女作家的时候，她这才开始学习捷克文正字法。她一方面学习捷克文正字法，同时她去了解黑格尔的哲学。她研究黑格尔这个人，同时也着手调查、研究一些新的社会组织机构的实际情况和法则……然而在当时的捷克有谁能在这方面给她以帮助或告诉她一些什么呢？

她的这些热切的、充满激奋的思想引起了布尔诺市的捷克摩拉维亚兄弟会的成员弗·马·克拉采尔的关注，他在论文集《与一女友谈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起源的通讯》（一八四一）中，为聂姆曹娃写作了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导性的文章——捷克第一篇篇幅较大的有关这类的文章。但是这个克拉采尔岂能同聂姆曹娃相比呢，克拉采尔只知道法国的社会主义，而压根就不知道英国的、特别是德国的社会主义；另一点也不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克拉采尔以其自已那"不着边际"的唯心主义去面对聂姆曹娃却要把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自由具体地加以区别开来的鲜明的阶级观。

年轻的卡雷尔·希米德克是一个有学问而富于思考的人，但很早就受到教会的遏止，聂姆曹娃引起了他无比的好奇心，于是给摩拉维亚州报写去了一篇论文《论家庭生活在社会上的作用与发展》，写的倒颇有意思，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丝毫的新观点，仍旧是老调重弹。可他在这里以自己的那种基督教的理想——妇女只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开展一些慈善活动——来反对聂姆曹娃那种妇女要直接参与建设世界的强烈愿望。

在当时的捷克，她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知道许多事情，别人是无法帮助她的，因为人们不比她知道得更多些。她走在她一向在他们那儿寻求帮助的任何一个有学识、教养的朋友前面。她似乎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但目标毕竟没有达到："被七个无知的门闩闩住了"——教育程度不够。聂姆曹娃会按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说是一种崭新的、基本上可说是正确地解释世界，但她却不知道如何来改变这个世界。

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几乎都留有明显的败笔：笔锋突然急转，在体裁上这个缺点表现为"幸福的结局"。

几乎可说聂姆曹娃的全部中篇都是以"幸福的结局"结尾的，但是"幸福的结局"在短篇小说《庄园内外》是完全不切题的。在这篇小说中它完全没有被证明是正确的。给人感觉到它是个虚构的东西，特别是在聂姆曹娃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你都不会像在这个短篇中遇到被这样强调的社会差别。书名本身就极其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庄园外的是裁缝、寡妇和瓦匠死后留下的一群孤儿，庄园内的则是那位奸商暴发户；庄园内的那种冷酷无情、铁石心肠与庄园外的那种浓烈的人情味形成鲜明的对比；地主老爷的那条至福安乐的狗与受苦受难的工人的一群孩子；富人们的自私、中饱私囊、剥削与穷人们的团结一致、劳动；庄园内那一片歌舞升平、快乐愉悦和庄园外那与霍乱疾病作斗争的那种充满惊吓的场面真令人揪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用钱买了个贵族称号的贵夫人把一个找到了她心肝、宝贝的狗的一个可怜的孩子收留为自己的侍童，她却为自己的这一善

举沾沾自喜，平衡顿时在她的心中升起，小说里的确充满了聂姆曹娃对富人们的蛮横、无礼的愤怒和抗议。然而她的笔锋突然一转，用具有魔力的小树枝驱赶疾病；庄园里的那位贵夫人竟然感觉到她内心拥有了一种她不曾感觉过的东西：心，一颗真正人的心。这个女主人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帮助他人的人了。“她有了一颗健康的心灵，也有美好的意愿”。一篇充满矛盾的短篇却是以“幸福的结局”收场的。这样一来，一个揭露性的短篇小说则变成了一个神话。

这种情况你还会在长篇小说《外祖母》——这里当然比较完善和有准备的——以及聂姆曹娃其他文学作品中碰到的。在她许多充满现实意义的作品里总会出现一些不现实的描写，经常是奇迹在紧要关头就在人的心里出现了，聂姆曹娃站立在那儿，站在坚实的土地上，而后却意料不到地从云端处放下来了一根银丝线，那根银丝线就将你带进了天堂。这就是她给贫困寻找的出路。但是这是迫不得已的出路。你可以发现，这条出路总是在聂姆曹娃不能找到另一条比较现实、具体——我不如说——比较具有人间味一点的出路的地方出现的，她不知道。(她知道海涅，能将他的全部作品倒背如流。然而多么可惜，她未能去认识、了解一下海涅的朋友们！[①])

然而对你响起的这支天堂的乐曲绝不是虚假的。如果说你感觉到在短篇小说《庄园内外》中这个贫穷的出路就像是一瑕疵，这可说是一种例外。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某种伤害。其实你不会被受到伤害的，因为谎言才伤害人、侮辱人，而聂姆曹娃的这个败笔——笔锋急转并不带给你一种虚假的感觉，因为它不是谎言，她的作品大都出自自己的直觉、心灵的感受，与内心有着紧密的联系。

你静静地听一听！你听到了什么吗？

一个孩童的声音。

---

① 尤·伏契克在此首先想到的海涅的朋友是指卡尔·马克思。(原出版者注)

战斗的思想在这里与孩童的思想交融在一起了。她想把生活的过程从所有的复杂中解脱出来，她想跳越那于她来说是真的不认识的那整个漫长的发展与斗争的阶段，她想把这个阶段简单化为一个好人的干预的最为普通的一幕。但她认为即便在这里人们也必须有所改变，变得更为美好。她认为像外祖母、大夫、工人这样的好人干预就足够了，他们似乎已经达到她所说的"有所改变"了，他们已经找到了自我，已经成为了那种最高级的、最完美的那个人物形象；在今天来说，那也只是生活在孩子心灵中的那个人物形象。

在这一改变过程中你或许能找到甚至可说是一种象征的东西，但这只能说是一种十分幼稚和充满太多想象的象征。这种比较单纯、质朴的东西常常是十分有力的：对一切美好的以及那最终是不可战胜的东西持有一种孩童般的轻信。当一个人处于他的童年时代——人类社会也跟人一样——总是把人们之间的关系看得很美好、晶莹、清澈。这是一种生气勃勃的美丽，这美丽而后可能会忧郁地死去，因为它被窒息，或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被扭曲。但它从来不会被完全地泯灭。为了这种美丽，为这种人类的美丽，聂姆曹娃总是回到童年去，"以慰藉自己悲伤的灵魂。"因此，她的童年回忆，成了她的作品素材的主要来源。

童年造就了她那特有的多神教的虔敬；童年赋予她一种天真、笃挚的特性，它们不仅动人、可爱，而且有时是强有力到能移山倒海似的。但她自己是很少明白这一点的。她的乐观主义的特性在童年时就有所表现。童年给她铸浇出了一个乐观主义的坯子。她的那许多天翻地覆的思想和行为都可说是渊源于此的。

如果说她有时是盲目地利用自己的一些特性来达到她要追求的目标的话，那这个唯一的乐观主义的坯子却是真实的。所以你不会感觉到她在欺骗、说谎。她不是说谎的人。

不仅如此，你还会更深一层地认识到：聂姆曹娃回到童年这点是她前进道路的有机的继续。因为纯洁；晶莹般纯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只是原始的，而且应该说是人类社会最终的一种状

态——这就是一个新型的人所要努力达到的那种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

这一天，当你开始关注、了解生活的真谛，开始重新学习历史的时候；当你不再见到生活在一种真空里或者在一种派生出来的现实中的人们，而是瞧见了一群肩并肩走着的、朝气勃勃的人，在现实存在的过程中你要不与他们为伍，或者反对他们，但是他们那固有不变的精神面貌会将你改变的时候，那你也就会看到，鲍日娜·聂姆曹娃不只具有一个可亲可敬的、极富魅力的灵魂，她不只是一位姣美的女人，一位有着一颗永远充满热望的心灵；但却遭到难以理解的残酷命运的打击的女人；同时她也不只是一位需要过时与无用的怜惜的殉道者，而且是一位有着一颗勇敢的心灵，一位新的女性，一位有着叛逆者最美好、最人道的心灵和具有战士命运的女人。

一九四〇年二月写于多马
日利采的霍蒂米耶什

译者后记

“千百万人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英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发出的心声。这些闪烁着崇高的理想光芒、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语句，被一代一代的革命者广为传颂！

伏契克一九〇三年出生在布拉格斯米霍夫工人区的一个工人家庭。少年时的伏契克就十分努力学习，如饥似渴地读书，最喜欢跑旧书店。他的夫人在《忆伏契克》一书中就写道：布拉格的所有旧书店都留下了伏契克的足迹，他同许多店员交上了朋友。有时他全月的工资几乎都拿去买了书，连第二天的午饭钱都没有了。他从大量的阅读中发现有的书在讲真话，有的却谎话连篇，还有的书什么也不说。他认为，“不论对什么，都不要缄默不言，缄默就是撒谎。要讲个一清二楚，以便使谎言连篇的书和什么也不说的书完全绝迹。”

一九一八年他第一次参加五一节游行时，写了一首诗：

上层：
“平民在下面号叫什么？”
“他们说在全国笼罩着饥饿、哭泣。”
“嘿！要知道对付这些的工具是有的——监
狱或刽子手。”
下层：
“也许老爷们说得对。

但我们感到笑声比哭泣可爱，

请相信：

只有刽子手把你们处死了，

我们才会过更好的日子。”

这时的伏契克还只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少年，却这般勇敢地反对社会的不公正，反对统治阶级的“老爷们”！

伏契克十八岁时就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捷克共产党，一九二八年起任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编辑。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捷克。捷共被迫转入地下，伏契克毅然留在布拉格坚持斗争，一九四一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一九四二年四月因叛徒出卖，被德国法西斯逮捕，次年九月八日被害于柏林的勃洛琛斯狱中。

伏契克从被捕那天起，就受到极其残酷的拷问和毒打，濒临死亡的边缘，难友们都为他做了临终祈祷。但他却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从死亡的床上醒来了。生命不息，斗争不止，活一天就同敌人斗一天。他清楚地知道，当他一旦落到秘密警察的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他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他组织并领导“狱中集体”同纳粹匪徒作斗争。“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他用笔做刀枪，在狱中坚持写作。他得到了一位好心肠的捷克看守——科林斯基的帮助：给伏契克铅笔头，一张张碎纸片，为他放哨，并把写好的小纸卷送出狱外，分藏在许多不同人的手里。捷克解放后，伏契克的夫人和他的至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找到了这位看守，并耐心地寻找到了这些小纸条，经过整理于一九四五年出版。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报告》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用鲜血凝成的壮丽诗篇。伏契克在《报告》里向全世界人民控诉了德国法西斯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请求那些活过了法西斯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们，记住那些在决定性的关头做着一切需要做的事情的默默无闻的人们：工

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叶林涅克夫妇，参加革命工作时还带有点少女任性、顽皮劲的丽达……这些都是伏契克在《报告》里雕塑的一座座高大的英雄形象。伏契克认为“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每一个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带着金色的肩章，他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伏契克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伟大与渺小——雕像与木偶，从而向人们指出生活中应该选择的道路。

伏契克可谓尘世上最纯洁、最真诚和最朴实的凡人。他对妻子的爱简直是洁白无瑕、忠贞无私。在《报告》中专门有一节是写他妻子的。他总是怀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回忆、赞美她。“她品德高尚，诚挚热情，她是那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斗争和经常离别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止一次而是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那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悲哀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融合在一起。”他渴望同他妻子重逢，他在《报告》中详尽地描述了他想见到她的心情。但是他清楚地知道：“我俩要再像孩子似的在一个阳光普照、和风吹拂的临河的斜坡上携手漫步是没什么希望了。”他情不自禁地喊出：“别了，我的亲爱的！”他希望他的妻子永远坚定和勇敢地活下去。他并且写信给他的妹妹，要她在适当的时候转告他妻子：“我一直希望着她能幸福。愿她即使没有我也能幸福地生活。她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可能的。在工作中，在别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被代替。”多么高尚、无私的人啊！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伏契克此时正当壮年，他渴望爱情，热爱生活，他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但是决不以玷污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作为代价去换取生命。他在《报告》里痛斥了那些不配做捷克人的刽子手。这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会变得比魔鬼更可恨。他们都是些极为阴险、狡猾、凶残的木偶，受法西斯和各种反动势力牵动的木偶。正是这些木偶，构成了纳粹反动统治的支柱，是黑暗时代的灾星。伏契

克用他的鲜血和生命发出了谆谆嘱咐:“人们,我们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是的,一切为人类进步事业献身的人们,都无不感谢伏契克真诚的提醒: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警惕那些公开的和隐藏的、残忍的和阴险的、形形色色的木偶!

伏契克死了,一个伟大的生命熄灭了!但他那伟大的精神却与世长存,代代相传。他的《报告》不仅是捷克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也是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从一九四五年在捷克出版以来,《报告》已被译成八十多种文字。在我国,早在五十年代,就先后发行过根据俄文、法文转译的两个版本。这部光照千秋的著作,将继续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前进!

蒋承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绞刑架下的报告　彩色插图本
作者＝（捷克）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页数＝１５９
ＳＳ号＝１１７７１２５４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年０３月第１版